

中国社会评论

赵京

安那祺/自由社会主义文库 C-2



中日美
日米中 比较政策研究所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Publisher 出版印刷社：Lulu Enterprises

860 Aviation Parkway, Morriville, NC 27560, USA

发行：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中日
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zhao.cpri@gmail.com, 262 Altadena Cir. Bay
Point, CA 94565 USA

版本：第四版

字数：11 万字

日期：2015 年 12 月 21 日

ISBN 国际书号：978-0-557-04006-3



目录

前言

1. 知识分子精神认同的透视
2. 《雁鸣》编辑部告读者
3. 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的几个片断浮想
4. 民主运动与独立人格
5. 回忆 1980 年的清华学生会选举
6. 回顾“未来与发展协会”的人与事
7. 滔滔浊流的透视--从清华大学看中国社会的政治理性
8. 陈独秀的思想变迁略考
9. 现实的历史中包含着合理的必然
- 10.北京掠影—之一
- 11.北京掠影—之二
- 12.东京“六四天安门事件”六周年纪念集会
- 13.中国的民主化前景对东亚政治格局的影响
- 14.在中国的民族主义中树立民主主义的认同
15. 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与台湾前景
- 16.社会改进党人对中国民主化前景的展望
- 17.从天安门到热诺亚
- 18.毛泽东主义
- 19.「八九六四」之后的我
- 20.回顾与林希翎大姐的短暂交往
- 21.台港澳掠影
- 22.《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方法论局限
- 23.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

- 24.回忆与吴方城的点滴交谊
- 25.访陈独秀旧居随感
- 26.京沪渝掠影片断
- 27.正在摸索新的社会规范与秩序的中国
- 28.关于政治秩序正当性的断想
- 29.天津之行的意外收获：两件天安门事件物品
30. 尊师敬友，更爱真理与自由-清华大学毕业三十周年随感-

前言

我整理自己二十多年来在日本和美国从事社会政治等研究的文稿，先出版了《安那祺主义：理论与实践》（ISBN 978-0-557-01635-8）等十余册中日英文书籍，基本上形成一定的思想体系，互为补充，围绕“社会秩序”这个终极关怀展开。

本论集收入从1986年到2014年我写于中国、日本和美国的不太容易单独成册的关于中国社会的评论，内容多样，观点也有变化。例如，“知识分子精神认同的透视”有太多不成熟的称不上观点的感受，不过，其中包含有许多后来展开的思想的萌芽。本书的题材与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Review（ISBN 978-0-557-04635-5）和《日米中：研究と評論》（ISBN 978-0-557-04475-7）类似，请一并参阅。

以此感谢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和协助。

赵京，2011年8月1日第一版，2014年12月12日第三版，2015年12月21日第四版

1. 知识分子精神认同的透视

本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英国的汤因比在分析比较了不同的文明史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某个文明具有足够的容量迎接新的文化的挑战时，它就吸收外来文明到自身的内涵中去、促进了自身的发展；而不能迎接挑战的民族则会被外部的力量所征服、摧毁。¹虽然文明的完全消失一般是不太可能的，²但我们确实从玛雅文明这样的文化中继承不了多少在现代生活中仍有活力的内涵。最伟大的四大文明中的三个已经不可能成为任何民族的核心文化了；而唯一残存的中华文明也在新的文明的冲击下迅速瓦解，虽然他们的传统在现代生活中潜在地发挥着影响、他们的精华已经化为不同形式扩散、渗透到各世界文明中去了。

近代史上中国的传统文明所经历的震荡兴许是文明史上最壮观的一幕了。在古旧文明的形式和内容都被一遍一遍地遗弃（一次运动是不够的，必须有新的运动来冲击）的时候，传统意识的复兴又不断地被唤起、而且呼声越来越高。³最近几年对外开放政策，在本来似乎平静了三十年的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和人民精神生活中掀起波澜，触发了过去一直没有争论清楚、由政治生活压抑了的全部文化生活的冲突。

明治维新时开国的日本所面临的文化的冲突深远地影响了后来的日本社会生活，也产生了象福泽谕吉这样的走向世界、立于日本的思想家，为日本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大致的蓝图。今天的由外来文化推动的中国文化的变革将远远超出日本的革新而对世界文明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把握住这种变革不仅依赖于对科技落后、管理落后的认识，也必须全面地审视所有精神生活的变迁，特别是对这种变迁体会得最敏感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认同的状态。否则，我们也会像许多别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高度的工

¹笔者提笔之处没有可查的资料，所有援引都无法核对原来的文献，而只能凭记忆保持其基本含义。

²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在施密特的发现之前，我们都不相信荷马史诗的真实，也不会相信有克里特文明的存在。但在现代，这种现象是完全不可能的。

³现在在中国哲学界活跃的杜维明教授被描绘成“儒家的第三次复兴”而鼓吹的学者。这虽然另有用意，但他在中国各大学哲学系受到的热烈反响确实表明了人们对真实传统的重新省视。

业化只是西方国家的翻版和附庸，工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本国的文化传统的裂痕越演越烈，⁴从而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1. 历史的回顾

简略地回顾一下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动荡、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主体认同的变迁，有助于我们对当今社会意识的认识。我们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阶段来考察。

1.1. 外来文明的不断冲击和旧文明的逐渐衰落

当发源于欧洲的文明向世界扩张和膨胀的时候，中国却远离了这种进步。只是当整个国家迅速衰落的时候，中国人才意识到旧观念中缺少了什么。⁵清王朝感到缺乏国力，知识分子感受到两种文明的冲突。历代中国社会中朝代的更替都必须有知识分子的介入，但在以往的变迁中，知识分子的主体认同早已由孔孟等人确立了，知识分子所作的只是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去实现这种认同而已。⁶同时，与这种认同相符的一方一定会胜利。例如，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的态度也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容闳在曾国藩（其本人就代表着那个时代儒家的正统）而不是洪秀全那里得到了回答。

但这一次，传统的认同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不具备迎接挑战的能力，知识分子必须到外部去寻求新的认同，它激起了从林则徐开始的“放眼世界”的两种文明的冲突。无论是什么样的思潮，虽然没有被准确地介绍到中国来，但都激起知识分子心灵的动荡。⁷社会政治的激烈更替使许多刚

⁴如巴列维国王在伊朗的工业化政策被宗教的文化传统所不能接受。

⁵随便提一个相近的例子。纪树立先生在谈到逻辑经验主义的琐碎细节时说：“这种论争，中国的读者早已厌倦了吧！但我之所以从事这种技术性的工作，是因为我感到这是我们民族思维的一种空缺而不是学术研究的空白”。学术空白是具有普通逻辑思维能力强的人可以弥补的，思维空缺则不能从学术的环境中培养出来。或许，这也是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既不是学园里培养的、也与哲学传统联系较少的原因。

⁶知识分子的团体总是与王朝部分重迭，当王朝的政策符合知识分子的精神认同同时，知识分子就支持和维系王朝。这是一般的情况，甚至在外族（如清朝）统治时也是如此。当王朝无道时就弃之伐之，如陈余、张耳参加推翻秦朝的起义。

⁷这种动荡对于最熟悉并热衷传统的人冲击最大，如严复、王国维。

翻印出版的学说成为废纸空谈。民族存亡的威胁压在每个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中，所有的学说都必须回答这种挑战。丁文江说：“没有统一完整的国家重建，就不可能全面地论辩意识形态的优劣”。

正是从这一准则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认同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转变。当日本的侵略威胁到整个民族的存亡时，知识分子的主体认同由原来的分离达到了统一。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蒋介石是民族利益的代表，在国际上则对美国抱有幻想，希望中国也能独立富强地走上英美式的发展道路上；但同时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共产党作为民族利益的坚定拥护者取得的胜利和影响远远超过了抗战之前作为工农利益的代表者的时期，在知识分子中也逐渐分裂成两种意识选择。抗战胜利后面临着中国前途的两大决战，知识分子也从一系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动荡中改变了原有的认同。国民党统治区中的学生运动，教授的抗议等都表明了知识分子阶层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美国渗透的愤怒，它表达了整个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心愿。国内战争如此迅速地结束，正是这多方面变迁的结果。所以国民党的崩溃并没有带来知识分子的解体，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留了下来，迎接新社会的到来，虽然在震撼和欢欣中带有某种不安。

回顾建国前的社会变革，知识分子切身感受到自身的软弱和缺陷，他们发自内心地审视自己的旧意识，自觉自愿地改造自我、清算自我。在意识形态的观点上，虽然有些老学者不能接受新的观念，⁸但整个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终于顺利完成。到反右运动为止，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认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达到了新的统一。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思想意志如此一致的统一，这种统一靠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而达到，也必将随着社会的倒退而演变。

伴随着精神认同中社会历史观的转变，也包括道德的进步。正如任何革新都带有的道德和人性的变革一样，比接受什么观点更有意义的是体现在知识分子意识深处的否定自我、服务于人民和社会的精神。知识分子不再是小心眼地为自我牟利的迂儒，而是与工农一同建设新国家的主人。这是被遗弃的封闭式旧文明一直要求却不可能做到的。

⁸如社会学家孙本立在对美国居住的朋友的信中谈到自己“不合时代”。

1.2. 毛泽东时代⁹

把从反右运动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划为一个阶段主要是顺从政治局面的发展而作出的。¹⁰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嘲笑和知识分子意识的麻木停滞都是因为他们没有独立的主体认同。我们现在的一般大学生很难理解费孝通那样的老社会学家在讲出“三反时，我作了一次检讨，大家很满意，还把文字典型推广。其实那是一篇假检讨，说明共产党搞这一套是失败的”时所具有的社会环境的政治气氛。但这句话却表明了反右之前知识分子的“童心”，它对共产党的某些政策提出怀疑但从内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同。

可悲的是，现实是罗马式的而不是雅典式的。¹¹在连接不断的冲击中，谁都明白社会的复杂性了，关键不在于错创了多少右派(1%或 5%)，而在于有多少人(其余的 99%或 95%)因为害怕被扣上帽子而抛弃信念屈从于现实。由共产党几十年的奋斗造就的、焕发了上千年道德传统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认同的知识分子最终沉沦下去了。

政治运动对于共产主义认同感的侵蚀开始于反右运动的旧知识分子，到文革后期已经啄空了整个民族各阶层人民的信念。文革后期的知识分子的意识体现了“士为君而亡”的旧观念。大家明明都不满现实也不敢在公共场合发表自己的内心观念，靠偶像维系着原状。政治划分上背着“小资产阶级”包袱的知识分子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完全丧失了它的指导社会意识的职能、而降为一种职业和谋生的手段。远离了传统的“兼济天下”的使命感，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沉浸于近代历史变迁的威慑下的知识分子面对新的运动无法从过去的意识中寻找理论说明。除了文革早期以宗教似的激情参与的运动外(这种人付出的代价最悲痛)，维系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只有对偶像的依托，

⁹这种说法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的意识心理。

¹⁰这个划分并不一定准确，因为文革前的十几年里知识分子并没有后来的那种意识空虚中的偶像托附，而知识分子的反叛早在“四五”运动、西单墙和魏京生等事件中就表露出来了。

¹¹我们可以在希腊的智慧中找到现代社会思想成果的萌芽，也可以在罗马历史中看到当今政治状态的雏形。

他们无法解释自己所体验的现实社会环境，不相信现实的合理与必然性。但却确信最高层的英明和伟大，¹²期待最终的解救。¹³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结症，一种强烈的盼望好皇帝的农民意识，从“牧马人”，蒋筑英等人身上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苏武、岳飞的形象。

难道历史总是会出现救星吗？不会的，历史不一定非要沿着多数人的意愿进行。即使在今天我们能对过去的历史清算的时候，它也无法弥补已经过去的剧痛。兴许，政治家可以靠“恢复政治名誉”、“补发工资”得到宽慰，也可以靠历史学家来记载，整个社会的动荡带给人民的灾难靠什么来偿还呢？中华民族的忍辱负重的品质保证了知识分子在十年动荡中的安定，也保证中国社会没有进一步崩溃下去，但这种只靠偶像来维系意识带来的摧残太惨重了。所以，当巨星陨落时，笼罩在人们心上的空虚和迷茫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无论政治对新的领袖是如何地宣传，人们心目中再也无法建立新的偶像了。这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功的心理基础——当然它还必须有新的进展来说明和巩固。

1.3. 实用主义的时代

表面看来，知识分子的正统信念是以政治的发展为导线的。在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分析中，党对所犯错误的承认，党的主席因“犯错误而辞职”等都成了青年中消失共产主义信仰的原因。这种分析的根本特点是对旧的形而上学的沿用。¹⁴能促使个人心理变化的因素虽然是多种多样的，但能影响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意识的只能是社会现实。

对于这种意识的变化，只能从人性所固有的两个方面去认识：¹⁵人都是有缺陷的，只要社会条件提供了哪一方面发展的可能，人性就容易朝那一方面膨胀。每一个人任何时候，由于心理的原因，总是首先为自己的生

¹²当时的文艺作品中，党的最高干部总是正确，坏人也窃据第二或第三“把手”，以反映我们所处的现实社会。

¹³父辈们对自己的经历的解释往往是：基层干部水平太低，不懂马列主义。

¹⁴更不用说，由于学校对某种类型的思想汇报的偏爱和奖励暗示学生们怎样编写他们的信念和入党志愿。

¹⁵这种方式的讨论只是一种方便而已，因为人性的变迁缓慢，以常数分析变数比较容易说明问题。

活着想。当这种生活以一种高尚而现实的意识为指导时就显示出人性的善和美，但当现实失去了支持那种信仰的基础时，人就会赤裸裸地、内心毫无反省地追求个人的满足。这就是罗马式的现实。在历次运动冲击中生活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舍弃曾经有过的幻想和理想而堕入利己的追求中。¹⁶

无论用“存在主义”还是用“马克思主义”去概括当代的大学生，只是一种倾向越来越强的体现出来：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自我，一切都打上了实用主义的印迹。在最能满足自我、最容易获得功利的地方聚集的人才最多。从生活上看，衣着服饰等生活方式的变迁是令人可喜的；从职业学科的选择上看，学理工、管理、法律、经济学的激增也同时适应了国家发展的需求。精神生活的实用主义化不可避免的意义远远超过它外表的变化。

现实的大学生活中，能给予学生功名最大的是“三好生”、“党员”这样的虚荣，¹⁷每一个想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有所作为的学生都明白，不入党就没有“政治生命”，可悲的是许多人把自己作为人的存在价值也系于这种虚荣之中。这些形式给予学生的金钱和地位的奖励使得我们今天没法找到一个学生的德行判断标准。如果一个人有“党员”、“三好生”这样的牌子，人们的反应就是“嘿，混得不错嘛！”。另外的一个例子更带来了意识形态发展的障碍：越小的学校、越基层的单位，实用主义越盛行、经典的教条越被大量地援引；而在正统的哲学系里，却没有人从现实出发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给学生的哲学越来越通俗、浅薄。

2. 精神形态的透视

对社会意识的具体分析很难在当代的学术文论中找到。在指责西方学者只实用主义地研究具体科学的时候，中国的学者更实用地不涉及这些问题而宁愿长篇大论已被现实政治认可的教条。对于社会意识的认识只有两种态度：正式课堂中的照本宣科的高谈阔论和现实生活中不言而喻的心

¹⁶在所有文艺形式中，大家一致地鄙视政治、偏爱生活。在现实中，我们则一遍又一遍地看到青年同学的哀叹。

¹⁷当然，其中确实有真诚的信仰者；在我认识的所有学生中，也有使我敬佩的几个这样的同学。

领神会。当某一信条可以决定个人的升迁时，就无法希望学术的进展。

2.1. 哪里有不可逾越的法则和教条，那里就谈不上学术自由

在一篇纪念孙冶方的文章中说：“偌大的中国为什么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坚持马列主义呢？孙冶方同志说：因为别人在思考问题时容易带有私心”。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孙冶方当然不会体验到生活在下层、把教育作为职业的一般知识分子的心理。但他的确点出了问题的实质。当十九岁的谢林喊出“扫除一切陈腐教义！”的时候，他更多地表达了对普鲁士专制下学术界的庸俗和卑劣的愤怒。¹⁸无论是“学术自由”、“创作民主”还是“兼容并包”等力图繁荣学术的口号，其根本的障碍只有一个：利己的私心。

在自然科学的领域里，学术水平和成果有比较客观的标准；在人文科学中则掺入致命的党争，只有淡视个人名义的环境才可能有繁荣的学术。而学术繁荣的社会环境一定是雅典式的而不是罗马式的。在中国，引诱人们私心的是正统的教条，保证这种教条能对现实生活施加影响是绝对的权力。

阿克顿爵士说过：“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成为大家都接受的名言。可以广泛地讲：凡绝对必导致道德的腐败。正是这样的道德腐败，导致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各种怪事和“学术论争”。

首先，马克思的一个基本思想，即历史发展的思想，不为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运用，而且连许多基本常识也被弃置脑后。被引用了无数次的浅薄论证中有这样一句：“凡是人类思想过的，他都批判地考察过并吸收了精华”。以此来表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到马克思那里找到启示。

任何分析社会学说都离不开普通的常识。我们都能看到许多基本事实：马克思不可能掌握当时的所有科学和社会所能提供的全部主要知识，而他当时利用的知识和材料不一定使他都能得到正确的结论。例如，对于“南美解放者”玻利瓦尔的评价的不准确性。¹⁹其次，马克思在思维和方

¹⁸这种热情在他的后期就看不到了。

¹⁹这种不准确带来整个东方学术界对于玻利瓦尔的至今为止的误解，就是这种教条的专横造成的。

法上也存在着不足。例如，将心理学视之为唯心的学说。²⁰

除了知识上的明显的不足外，也要注意思想内容上的欠缺：个人生活的局限决定了每个人都只能处于一种生活体验中，单个的生活体验不可能说明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对社会和自然的正确认识必须在全部人类思考的不同体验中去寻求，从一个特定的体系出发绝不可能全面地评判别思想体系的面貌。正如自然中没有绝对的坐标一样，社会科学中也不能人为地为建树绝对的体系，而应该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用不同的体系。具体采用什么体系要看到哪个体系更符合现实。

如果把思想家的思想体系比喻成直线的发展，而复杂的现实是曲线的变化，我们选择某个时期与曲线相切的直线来说明那个时期的现实。全部的意识可以看成是无数小折线对曲线的近似。²¹面对新的社会，就一定会产生新的、比过去更能说明社会状况的思想家。这样才能谈得上历史的进步。社会比过去进步、历史也会造就出更伟大的思想家来。原子时代的今天怎么可能在飞机也没见过的思想家中找到社会实践的指南呢？

其次，哲学的教育葬送了整个哲学的思维。在宗教式的哲学教育中，²²教会了文科学生如何运用词藻去粉饰利己的动机，培养了理工学生对全部哲学的反感和蔑视：不但没有培养出对现实生活进行哲学思考的研究者，也没法培养有理论素养和训练的科学工作者。中国永远不可能产生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由康德和马赫等人启示的相对论在今天的中国物理系学生(包括笔者)中还没能得到深一层的理解，而仅被接受为由不可思议的光速不变的实验结果导出的洛仑茨变换方程式。

据说康德的精华已经被吸收到马克思的体系中，而马赫早已被列宁批驳过。但从来没有一个科学家用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科学上取得什么建

²⁰真奇怪今天那些编著《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等教科书的先生们的想象力是何等的丰富。

²¹具体选择那一段折线是有分歧的，但这种分歧总是在曲线附近的波动，绝不可能是直线式的教条。

²²在有远见的宗教哲学家(如马利坦)中体现出来的实用和科学的精神并不比今天哲学说教中掺入的新的佐料缺乏说服力。

树。²³看看令中国哲学与物理学界津津乐道的“层子理论”的命名：当时的理论物理学者认为原子的组成象尺子的分割一样，只是量的机械减少、不会有质的变化，而把新的分割单位叫“层子”。但现在人们宁愿用那个被列宁称为“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奥斯瓦尔德的“能”的观点来描述更微观的核物理现象。

贯穿于这种教条式贩运的整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是哲学界的庸俗。在讲台上靠报纸和政治风云兜售哲学商品的教育者没有体验过哲学的思考、也不敢进行哲学的思考。虽然今天的报纸上有“学术无禁区”的承诺，但人人都明白讲授“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下场。而所谓“马克思主义”无非就是某些握有行政权力、略知一些哲学名词的人的教条主义言词。在这种教义式的教育中，只要几年就可以彻底埋葬一个人的信仰，²⁴而要恢复人们对真理的信念、对理解并改善社会的信仰，则必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几年前，人们还渴望能理解萨特、弗洛伊德，今天的青年则抛弃了全部哲学。什么时候才能培养和恢复整个民族对理论思维的重视呢？²⁵

另一个现象就是比地理大发现还伟大的“学科”不断被生产出来。在一片马克思主义化的喧哗中，“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美学”、“马克思主义心理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大量的“学科”应运而生。幸好自然科学家比较诚实，否则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产品上市。所有这些产品没有提供一丝多于原有的“资产阶级人文科学”的知识。在书费不断上涨的情况下，这些产品无论怎样降价也卖不出去。

²³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出现在教科书中，说西方的科学者之所以取得了成就乃是因为他们不知不觉地在工作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那么，原教旨主义也可以说今天科学的全部进步也是由于人们不自觉地采用了宗教的认识。具有很深哲学素养的玻尔等人竟然不知道自己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信徒？！

²⁴要求入党的青年必须接受这种教育。当一个青年在争辩任何真理问题的时候，他起码相信现实社会会提供探索真理的条件，也相信有真理可以探索。但当现实功利迫使他选择一个先验的答案时，他已经从根本上抛弃了所有关于信仰的神话。趋附于政治生活中个人名利的御用文人是知识分子的最大败类。

²⁵西德比意大利强盛可以从这样一个简单的统计中看出：前者成年人每年平均读十本书，后者只读一本多。

杂交的花样不断翻新，也颇有特色。例如，原来还撰文批判托夫勒的“资产阶级本质”的钱学森一转眼又变成“新学科的创始人”，“领导建立了一批中国的新兴学科”。我们可以不断看到肉麻的吹捧：“在钱老的领导下，几个中年科学家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创建了中国的政治科学学”。他们难道不知道要学会玩魔方也需要几天时间吗？而学科的创立比它还很简单。钱老先生大概记忆率衰退、忘记了早年他本人在美国写一本工程控制论的普通教科书也用了两三年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热衷于交叉学科的术士们大多是既不懂A学、也不懂B学、却靠着“AB学”过活的人。本来，任何新学科的产生都必须有现实的要求，其确立则需要很长时间的²⁶研究，要综合这门学科的所有材料，如经典物理学从伽利略开始到牛顿的完成。考察社会学的发展也是如此：首先是孔德提出了建立这个学科的要求，其次有斯宾塞在理论上对社会的分析，然后有杜尔凯姆和韦伯对具体社会的研究，才初步确立了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的地位。现在，有人却可以靠着图书馆的学科目次的排列组合出新的学课。幸好在组合中这些人的想像力不够丰富。否则我们将面临多少新“学科”的产生！

2.2. 当代哲学的贫困

前面所涉及的现象都依赖于对当代哲学的认识。实际上，在现在的比较活跃的学科中所取得的进展都是围绕着对正统哲学的反叛而进行的。在许多人文学科停滞不前的地方反映了哲学的贫困。笔者有一次参加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研究生们对刘再复先生的“性格组合论”的讨论，立即感到分歧之处在于“偶然与必然”、“个别与一般”等的哲学论争。文学系的研究生们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足以继续进行讨论，他们不得不回到黑格尔的《小逻辑》去。²⁶

认识当代哲学首先必须回答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笔者的观点如下：至今为止的所有哲学论著中，没有一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书；今后的所有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企图都是不可能，不必要、不应该的。

²⁶当然，要避免开姜丕之式的为世俗政治服务的“大众化”黑格尔“研究”。

对现行的哲学教科书的分析是令人乏味的，这里只举几个典型的事例作一点说明。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都没有、也不可能对哲学的原理有深入的探讨。马克思一生的功绩被恩格斯概括为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的发现。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尽管马克思本人没有明确意识，也没有使用“社会学”一词）和国民经济分析学家，马克思倾注了四十年心血的《资本论》奠定了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基础。也正是由于这种分析从实践上深远地影响了全世界的社会生活。但马克思本人只熟悉欧洲的社会经济状况，不可能对欧洲以外的生产方式作出结论。

另一方面，马克思不是专职的历史学家，即使对欧洲历史的知识也不足以达到对欧洲历史社会形态的准确划分。只是在现实生活中马克思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历史社会的一种有效工具，²⁷但是他并没有着手运用这种工具去分析历史。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希望后来的学者沿着这条已经被开闢出来的道路走下去，这产生了许多有意义的探索工作，从拉法格、梅林到苏联、中国的学者。但其中最大的局限是对教条的引用越来越多，而史料只是被利用来作为陪衬的证明，这根本背离了科学的探索精神。

现在的教科书今天被考证出来源于三十年代日丹诺夫（斯大林的女婿），对比一看，果然在体系、结论和大多数说教方面都是照抄，唯一的区别是加入一点现代科学的常识和生硬的说明。中国出版了几百种雷同的教科书，却没有一个人对哲学原理有自己的思考。撇开宣教的特点不提，²⁸从内容上看，这些书是黑格尔哲学的倒装（如果没有歪曲的话），再加上一些马克思的语句。任何一个读过《小逻辑》的人都会明显地感到这一点的，书中的基本概念、体系和多数的论据都被机械地搬到“辩证唯物主义”中去。不同于黑格尔的、据称是引起哲学变革的地方只是形而上学式

²⁷这种从经济生活入手的方式是当时的欧洲学者缺乏的，但不是唯一的、可以取代别的方式的独占。例如布克哈特的书因为忽视了经济状况而受到指责，但他却提供了广阔的文艺复兴时意大利文化的画卷。

²⁸前言中总要说“马克思主义是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变革”，有何等重要的指导意义等等。

的“天平式唯物主义”观点。²⁹

例如，在批判人性论的时候，进行的是把对手的嘴巴塞起来的批判。没有任何思想家割裂出抽象、绝对的人性来分析社会现象。人性本来就是社会生活的全部历史造成的，但这样造就而成的人性在变幻的社会现实中变迁较少，所以我们可以用比较稳定的、基本上已经知道了的人性来分析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现象。这样的考察只是一种方便而已。

这种把对手绑起来的拳击“比赛”随处可见。例如，在真理观中批判实用主义所用的主要论点是詹姆士已经批驳过了的。在日丹洛夫通篇的章节中都透着俄罗斯的狭隘民族意识和对西方文明的排斥。这些对西方文明的批判表达了苏联三十年代作为仅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现实，以及从意识形态上摆脱附属命运的反抗。但今天，中国的文明应该有能力吸收所有人类的思想遗产，中国的政治也已经在顺应这种潮流。³⁰既然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实用主义有着生命力，为什么还要全盘否定它的呢？实用主义的精神就是行动的、机器的、工业主义化的、惠特曼式的对于个人心灵宗教的淡化，³¹和实在的、“就是这么一回事”的态度对社会生活中神话的认识。这就是美国勃兴中的值得所有走现代化道路国家借鉴的文化之一。现行教科书的封闭于十九世纪教条的体系不应该被认可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实质的体系，更不可能成为现实生活的指导。

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较多地符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因为他们本来就在这个领域里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这个体系和内容本身是否属于哲学还可以争论下去，但它的许多内容都很陈旧了。首先，对社会形态的五种划分中只有一半是比较准确的。对于原始社会形态至今还没有得到完整的认识，教科书所抄写的《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是恩格斯读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的心得。且不说摩尔根的观点在今天受到的非难，就连当时关于原始部落研究的名著《金枝》、《原始思维》等至今也没有

²⁹施本格勒举过一个很形象的例子：唯心主义把天平左端的下降作为右端上升的原因，唯物主义把天平右端的上昇作为左端下降的原因。这种庸俗的“唯物/唯心”之争就像大街上两个吵架的妇人，都认为自己的嗓门大而有道理。

³⁰例如最近胡耀邦出访西欧四国，强调不以意识形态做为对外政策的基础。

³¹实用主义创始人詹姆士和杜威都强调用心理学的事实解释心理的情感。

被引用到历史形态的研究中去。³²

对于奴隶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也有一大堆问题没有处理好。除了罗马外，很少有地区把奴隶作为主要的生产力。而马克思关于罗马的知识也不充分，在晚年的时候，他才作为消遣读到诸如阿庇安的《罗马史》，而这样的书提供的关于罗马生产方式的材料甚少。在分析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中，马克思比较偏向于政治斗争和国家意识，如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而关于广阔的实际生活中起作用的生产方式(如从磨坊主到工场主的转化)和社会生活观念的变革，我们可以从社会学家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等书中得到更详细的认识。另外，仅仅从经济危机方面也不能对资本主义的制度判处死刑。

讨论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必须注意到它的前提条件。在今天的原子时代，人类、互相敌对的几个人类集团拥有足以摧毁地球数百次力量，已经不可能谈论谁的灭亡、谁的胜利了。整个人类的前途将是各种制度的混合，如果趋于统一的话，将是文化上的统一和社会制度上的取长补短。实际上，威胁整个人类生存的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民族利益的冲突了。如果我们相信西方文明的进步、社会制度的民主化，西方国家也认识到东方文明的伟大和社会制度的完善，这种由人民管理的、不同称呼的集团之间的互惠大于冲突时，还会有战争的威胁吗？

所有这些问题，作为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都没有提及。

奇怪的是，过去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今天的有些人倒想创立这门学科作为现实生活的指导了。于是，列宁的《哲学笔记》似乎成了新学科的钥匙。但想建立新学科体系的人今天不可能象当年的日丹诺夫那样依靠斯大林，于是新体系被认为是多元化的。如果这种换汤不换药式的新的先验法则可以填充为凌驾一切哲学思想之上的基础，如果这门学科可以预先成为一切行动的指导思想，最浅薄不过的学者也会在这个上面钻营的。而真正对当代生活提出思考的萨特式的真正的哲学家就不可能在中国产生了。如果我们今天能创造出一百多年前生活在欧洲的马克思哲学的话，我们也可以合理地推想，能够替孔子、基督创造出他们的体系了。

³²当然，这些书有许多不正确的结论。但书中的丰富资料却是任何社会形态的研究者必须掌握的。

如果说不存在一个作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旗号下的社会实践又会取得胜利呢？实际上，这些胜利并没有靠哲学的指导，而是有现实的要求。马克思是作为一个战士而不是学者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影响的，导致这种影响的不是哲学而是现实条件所要求的政策和运动。这种政策随实际条件而变化，所以有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在贫穷落后的国家里的成功。曾经是欧洲霸主的沙俄连日本都战不过，怎能继续统治下去呢？推翻沙皇和临时政府的人民群众并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意识。再看东欧的胜利，则完全是外部军事带来的结果。

而这些靠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取胜的国家在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一旦把马克思的没有完成的具体教条搬到现实中去，所遇到的就是一系列的挫折。我们怎能将整个国家的命运立于一个固定的教条的指导之下呢？近年来国民经济的增长不打破教条能实现吗？“一国两制”这种提法能由马克思主义原理推导出来吗？中国的现代化能由马克思主义原理实现吗？

那么，新哲学应该有什么特征呢？首先是现实性，必须具有中国特色，越适合国情的东西越具有世界意义；其次是面向世界、面向历史，把所有的人类思想财富，特别是马克思之后的哲学的发展，都吸收进来。新哲学的另一个特征是集大成式的综合而不是创新，可以认为它的素材在全部哲学史中已经准备好了；另外，哲学还必须划清与其它多种学科的界限，特别不能搬用所谓“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可以在科学史中找到其哲学意义的“学科”的内容。最后，新哲学将马克思的思想作为人类思想发展的一个环节、而不是终极来理解。

2.3. 现实生活中的精神认同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现实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2.3.1. 精神生活的社会基础

从表面看来，政治生活支配着所有的社会生活(虽然这种现象正在减弱)。这种政治生活是文明不发达国家中容易出现的。圣西门早就设想政治远离个人权益而变成对社会管理和组织方式的学问。我们看到西、北欧的国家管理中，不论是政治家的学者来源还是公众对“法制国家”的惧怕和偏重“福利国家”的心理，都表明了这种倾向。在中国，来源于现实

基础的政治已经脱离了现实生活。这种脱离是以前几十年历史的变迁带来的。在那段历史中，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养育了几代知识分子。所以我们明明知道现实生活已经背离了这种准则和信念却无法从概念上摆脱它们。这些概念已经成为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被使用到各种场合。

在这种分离中我们看到“文化比较”的不可能性，在政治意识形态下的学术探讨只能从事一些技术性的工作，没有两种文化的实质性的交流，也不会产生对两种不同文化的真正理解。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对西方先进的社会思想的排斥，另一方面是对西方生活观念中非意识形态领域的奉行和模仿。³³中国文明不但不能对世界文明作出贡献，却越来越深地陷入文化附庸的地位。

苏联利用政治的支配手段实行了工业化，付出了今天这样的代价：意识形态完全成为对外霸权、对内规范个人谋利的教义，显示出国家政权的压力和其民族本身的文化短暂背景。³⁴我们今天面临的是和平的国际环境和悠久的历史文化，我们可以、也应该造就出适合于现实社会生活的政治方式。

现实生活中逐渐削弱的政治对别的领域的侵权正反映了这种要求。从心理上我们可以把毛主席、周总理那一代人作为神来爱戴，但对邓小平，我们则因为他的实用主义的人性而感到他的可亲。³⁵而一个正直的学者也有勇气批判赵紫阳总理的不足。³⁶而知识分子的大量渗入行政部门也改变了过去的对领导阶层的异化感而实用主义地认识到那不过是一种获利较多的分工罢了。也正因是在这样的意识基础上存在着一种真正的心理平等：既然都是同样的知识分子，就不该存在行政干涉思想、谁改造谁的条件了。它形成这样的呼声：正如工程要由专业人员来组织一样，上升到抽象水平的意识形态的思考也是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学者来完成，这个完成的

³³例如，广州、深圳成为内地的香港、台湾。本来，从历史渊源来看，整个东南亚的文明多得益于福广地区。

³⁴尼克松在与赫鲁晓夫、周恩来的接触中明显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³⁵国庆游行中的“小平您好！”代替“万岁”的口号，是一个说明。

³⁶虽然，很遗憾地，打动人心不是方励之教授的言论的正确与深刻，而是他的勇气（但还没有提及邓小平）。

正误该由实践来检验，而不是由行政管理者的好恶来决定。

2.3.2. 知识分子精神认同的发展趋势

有精神认同的知识分子只是少数，多数人都把自己作为一种职业的分工来看待。少数有精神认同的知识分子中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有现实寄托的，他们内心的信念可以用不太准确的“共产主义”来判别（许多人因为别人的启示而意识到这一点），这种人是保持社会稳定运行的骨干。除极少数人是政治的附庸（或叫“宠儿”）外，多数人都是为现实生活而奔波的，许多人往往因为不能入党、不能提职而抛弃“信念”。

另一种人则从现实生活中把精神建立在内心深处（包括其中少数的党员），有许多人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也有极少数有明确的认同，他们能坦然面对社会变化和个人的沉浮，正是这种风骨避免了社会朝“众意”的方向漂移。他们的努力，如几十年不改初衷的梁漱冥先生，代表了卢梭所称的“公意”的方向。

文革前，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意识都把个人服从于组织。这样的前提是组织（即行政管理者）合理地关心个人利益和个人的主人公献身精神。这样的合理的设计方案本来可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只是并不符合现实，忽视了人性的两重性，造成了知识分子把自己的认同託附于外部因素。在留学生的选择中我们痛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个别人不回国可能有各种原因，但这么多人都不回国就可以看出支配他们选择的心理意识。作为从来没有出过国、在海外举目无亲的青年人，为什么离开自己从中成长起来的文化环境、生活习惯和社会关系呢？不用说，有物质差距，也有发挥专业条件限制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对全部社会制度的选择。一个人对未来实际生活的选择只可能是由过去的实际生活体验来决定的，不是精神託附的政治教条而是工作单位中的人事关系、管理制度等因素加重了这种选择的决心。

今天面临的大学生分配中的困难最广泛而尖锐地提示人们：知识分子的主体认同越来越突出自我。自愿到艰苦地方去工作的极少数人中几乎找不到一个普通的学生了。学生干部和党员中有一些属于有精神认同的人，他们牺牲某些形式的物质享受却在精神生活方面没有什么缺欠。因为他们的精神生活正是从现实生活中的精神和物质奖励中培养起来的。他们是幸

福的，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生活投入到自己选择的事业中去了——如果这种选择足够坚定的话。但我们遇到五、六十年代到边远地区工作的老一辈知识分子都劝告青年人不要冲动：那时留校的人现在当上教授、副教授，而分出去的人则为子女的教育、内迁而四处活动。

如果每个到边远地区工作的大学生都入了党、受到校方的信任、当过学生干部、上过报纸、受到上层的接见等等，³⁷那么他当然自愿乐意（他还可以设想将来的工作单位也会像原来的学校一样地给予他“应该得到”的东西）。但一般同学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呢？信仰的事实就是现实名利的一种比较合理的分配，社会运用这个东西把原来并不显著的人们之间的物质精神差距拉大了。必须建立一个排除政治喧哗和现实功利的主体认同，这种主体认同为了自我的真正实现而舍弃（物质的和虚荣的）自我享受。³⁸即使在现实中沉重地感受到行政管理的落后、管理人员素质不够却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³⁹聆听自己内心培养起来的、为祖国为人民献身的召唤，毫无怨言地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这才是真正知识分子的风骨！

此风去也！

与这种精神认同联系最密切的是共产主义的政治教育。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从人们刚接触外界时就注入我们的心灵，在共产主义品德教育中具有的人类优秀品德曾经一次又一次地鼓舞我们的信念，它的历史和内容本身就带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但一个事实破坏、粉碎我们的心灵中培养起来的幻想：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造成的信仰中的功利主义因素。这是现实中最深刻的矛盾之一，共产主义的教育本身要求信仰者“先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但治理国家的统治形式必然要求人类具有不能摆脱的等级带来的不平等。在政治占据社会生活中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权力成为满足个人享受的最有利的工具，共产主义的信仰者最终具有最先、最多享受的可能，而所谓法律、党纪和道德都不可能在广泛的社

³⁷实际的信仰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它的基础不过是一种心理的感恩罢了。所谓的思想教育正是对这种感恩心理的研究。

³⁸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³⁹子曰：“君子群而不党”。当信仰变为现实功利的一种手段时，知识分子就该舍弃之。

会生活的每个方面限制人性恶的方面的发展。所以，入党既是真诚信仰者的精神寄托，也是功利主义者的必由之阶。⁴⁰

在现实中，由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执行，在知识分子中对信仰（不仅是共产主义）淡薄的时候，却有大量人加入党内。信仰的功能早就消退了，一个能入党的学生不是靠思想的修养达到信仰的选择，而主要是靠与书记的关系的好坏来实现的。当然，由这样的基础组织起来的政党仍然具有许多功能。例如，在分配时党员到艰苦地方去应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获得的多于普通同学。但它的功能也有丧失之处，一个无意进入政治生活的学者将远远避开以这些形式，这种趋向将越来越强，⁴¹在这样的学者中，有可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没有明确宣示出来的精神认同。

只要旧的认同消沉，就必然有新的认同被提出。这种新的认同不只是对现实政治的对抗或监督，不是要求“三权分立”那样的形式分割权力，而应该是民主社会中的一种正常职能。它将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有不同于西方学者的特征，致力于中国不至于在开国的情势下从经济、科技到意识形态都屈从于西方国家。

2.3.3. 知识分子精神认同的重建

重建新的独立认同的要求是迫切的。现在，“专家治国论”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而大量的知识分子拥进政务工作部门提供了道德转化政治的条件。但实际上我们却没有看到这种人员的更替带来心理意识上的创新，而只是朝着职业的效率化转变。这是因为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独立意识认同，所以他们很快被官僚化。而且，由于掌握着知识这个更有力的工具，这种人还可以强化和发展易于在官僚科层中出现的腐败。⁴²知识分子没有担负起改造民族的道德风尚的功能。

重建新的独立认同是可能的吗？

⁴⁰我们不可能从“此人是党员”中得到任何价值判断。

⁴¹虽然党组织对有成绩的学者会主动暗示入党问题的。

⁴²近来，我们常听到“知识分子也在压制别人”的话了。不要忘了，现在掌权的知识分子都是五、六十年代培养或成长起来的理想的一代。再过几年，由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熏陶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掌权后，情况会更加复杂。

现代生活越来越密切地把个人与社会结合起来。这种结合超越了小集团中“守望相助”的意义，而是一个体验上的超越自我的、整个社会的统一。培养出这种超越不需要宗教的解脱、也不一定需要神圣的信仰异华，只不过是个人生活中的道德观念而已。这种观念是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培养起来的。从历史上看，孔子的学说之所以成为中国文明的核心，对传统中国的伦理道德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它本身的内涵、他的周游列国和其三千弟子的生活实践，再加上后期统治阶层的推行。这种认同是现实生活中淡于名利、注重精神生活的自我实现的生活。即孟子所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贵富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今天，树立起主体认同的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生活和对社会的贡献就可以使人们认识到这种认同的意义。

让我们首先从突破个人局限的爱情生活来考察。爱情把最小的自我单位为扩展到两个人的“小我”世界。在这种小我中，自我给予的越多，所获得的越丰，因为自我与小我从精神认同到物质享受都完全融为一体了。⁴³从这种超越自我、为“非我”而毫无保留的献身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和进一步扩大的可能。但这种现实中认可和赞颂的爱情本身也就是自私的、是对爱情本身的一种否定，它要求给予的必须得到回报，所以我们既看到了动人的爱情悲剧，也看到小我在社会生活中的利己的表现。

今天的大学生一入学就谈恋爱，反映了这种利己、实利主义思想在同学们中的地位。⁴⁴虽然这种学生能够很现实地待物处事，但一个谈恋爱的学生毕竟以不同的心理去对待小我和社会、无法培养自我的更进一步的超越而达到社会的认同。这样的学生心中没法培养出为社会献身的责任。这样的不全面的爱情没有最终根本超越自我，必将反过来影响小我的生活。所以，我们一方面感觉到对经历过爱情的“也就是这么一回事”的失望，另一方面又看到社会的变迁、甚至是微小的物质利益冲突也冲淡了“海誓山盟”的感情。真的爱情应该是对自我的改造，是双方对社会献身的共同理解，婚姻是一个人完成其本质的结果。当把爱情作为一种没有归属感

⁴³柏拉图：诗比历史真实。

⁴⁴几年前，大学里低年级的女生谈恋爱会引起舆论哗然，但今天已经没有人大惊小怪了。

的追求的时候，可以改造自身、使自己达到一个理想的境地，通过爱情生活实践本来应该体现的人类之爱。

在当代青年的小群体意识中我们也可以理解那种超越自我的认同。在这种很盛行的小群体中，个人可以自觉地为小群体献出自我，因为每一个成员都意识到对群体的贡献最终是对个人的回报(尽管在现实中不一定实现这种回报)。把这种意识推广到整个社会中就导出对社会生活的全面的认同。这种认同把个人与社会连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确信自己是团体的一员，贡献于社会就是实现自我的认同，团体的收益也是自己的享受，达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操。

那种蚂蚁式的达到全体同一的、生物学意义的、以基因决定个别一生的活动的牺牲精神不可能实现于人类社会。⁴⁵自我意识与人的社会认同同时增强，两者的矛盾是全部历史进化的最深刻的动因。满足自我的生活必须与贡献社会相符才能在现实中得到顺利实现，贡献社会必须最终满足个人的需求才是现实的、有发展动力的进程，而这两者关系的具体状况决定于社会生活进化的程度。⁴⁶

海德格尔撕开了黑格尔、斯宾诺莎思想中对神的生存意识上的依托，而把人赤裸裸地置于现实的喧哗之中、置于陌生萧落的街道上。在我们今天的现实中，人们不能越出与他们利益相关的环境来认识社会。如此导出所有社会异化的现实。例如，那些对朋友、熟人很热情的人在柜台前、在办公室里的冷淡和利己，脱离了人民的行政官僚的腐化等等，这些每天都体验到的、渗透到我们意识深处的异化就是人类的不完全进化的表现。

重建知识分子认同的意义就在于教育和培养知识分子比较能从更广泛的意义去理解现实生活中的这种不合理、不现实性，并在社会生活中能

⁴⁵蚂蚁的个体生活违背了进化论的个体竞争的原则。但可以把一个蚂蚁群理解为一个基因支配下许多个体的复制。所以，其个体的牺牲相当于人类个体(一个人)的一部分(物质或精神)的舍弃。当个体之间的竞争导致整个群体的毁灭时，个体之间的竞争就被群体之间的竞争(以及个体之间的协作)所代替。在人类社会中我们可以预料到：核武器已经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协作会代替竞争中的某些部份。

⁴⁶生活理论的宗旨就是揭示出这种同时进化的关系，并在具体的关系中培养人的能力适应这种进化，而不是在现实的利益衝突中强调人们不愿实行的牺牲，或用更大的功利来奖励这种牺牲。

够舍弃自我的眼前利益而实现“真我”、大我的完成，用实际行动影响整个社会阶层，⁴⁷使整个社会阶层的人都意识到：只有这样的生活方式才更有意义、更符合社会发展与进步。

可惜，现在的社会教育没有体现出这种精神，而只是在现实利益矛盾中的无益说教。这在容易导致狭隘心理的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其实是政府主义)的教育中特别突出。例如，在“政治思想教育典型”(邓小平也称赞不已)的清华大学设计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三阶梯中，爱国主义成为一种点缀。那些没有强迫自己把信仰托附于“社会主义”以及更高级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同学的思想意识竟然落后于钻进党内的同学两个台阶。

现代社会生活中，个人利益必须在群体生活中才能实现，这在国家、民族的争端中体现得最激烈。爱国主义的教育本来不应该强调这种人性恶在群体关系中的体现，而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爱国主义的实质不在于排外而在于修己强内。从人的本性看，人不可能更理解非我，一个民族不可能从主客观上比别的民族更能完善别的民族的进化，而必须通过各民众之间的相互竞争(无论是战争还是经济活动)来促进自身民族的进化。集团的竞争比个人竞争更多地促进人类的进化，爱国主义只是由于在具体的国家、民族中实现了这种进化才具有世界意义。也只有具有世界意义的爱国主义才能使科学更多地用于和平进步而不是破坏和毁灭。培养出超越国家利益冲突的国际主义精神才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实际上这种教育也是存在的。例如，在罗马史中可以给予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道德的垂训是很动人的，比重复一遍本国的历史更能够培养出爱国主义的情操。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历史培养起来的对自己民族文化、历史的熟悉感和优越感，如果有适宜的国家状态，它可能转化为直接为国家(而不是政府)的工作当中。白桦的那部引起这么大喧哗的电影《苦恋》中描写的知识分子对政府、国家(明确地讲是对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的失望与爱国主义没有任何牵连。

⁴⁷中国的知识分子受现实生活态度和方式的影响与西方知识分子很不同。例如，生活上的失检对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带来心灵生活更大的不安，西方知识分子并不因此阻碍对真理的探索(如卢梭)。这反过来衬托出斯宾诺莎、尼采的特征。

3. 作为精神认同创造者的哲学家

每个人都只能体验一种思维，但我们相信共同的生活本质体现在不同的生活体验中（“性相近，习相远”）。而思想家的特点是他的全部生活也是他的全部事业，生活提供体验的素材，思考是对生活的认识。正是这一特征区别开思想家与非思想家的生活。不过，思想家在公众人心中，除了那些利用零星半点知识批判别人的形象外，就是不可思议的、脱离现实生活的空想怪人。人们对思想家的误解也来自于思想家之间的任性评判。例如对叔本华的评价最有力的论据是“连资产阶级哲学家罗素也···”，仿佛这个人可恶得连恶人都要咒骂了。⁴⁸把党性之争用于思想的评判也给公众带来了混乱。例如马克思对孔德、斯宾塞的攻击，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等。

“古之学者为己”，哲学本来就是为自己的生存抱有的质疑而开始的，那些认为社会理应如此、将来也会如此的人不可能理解哲学的含义。思想家在罗马式的现实中，具有普通人的情感、欲望和奋斗所产生的对自我否定的思考。⁴⁹这种思考的进一步深化必然导致对自我超越、对社会的考察、对非我的体现的理解。社会境遇丰富多彩，面对相同的“没有新东西”的太阳之下的社会，我们可以达到共同的领会。这种领会就使个人具有与社会同一的认同：凡是我体验到的，别人也体验到了；凡是我希求的，别人也会渴望，当现实的冲突发生的时候，我就应该不只是从利己的立场而从更广的心理认同去对待冲突。

真正的思想家淡于名利，这并不是“思想家”谓称换来的牺牲，而是这种由认同导出的合乎逻辑的选择、符合自己内心的信念。例如，多数思想家都没有结婚，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为了社会的思考而舍弃了个人的生活，而是他们把自己抵押给摩菲斯特、为了彻底实现自我而做出的选择。这种表面上看来抹杀了人性的生活不是哲学训练的结果，而是社会本身要求的现实。⁵⁰没有这种信念的人就不能自诩为思想家：无论个人内心

⁴⁸罗素对叔本华的肤浅评断从一个方面也显示出英国人思维比德国人浅显。

⁴⁹例如，海明威和川端康成的生命解脱(自尽)。

⁵⁰“作一个哲学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黑格尔)。

的动荡是何等的激烈，⁵¹也无论外界的喧哗是多么变幻无常。哲学家确信：所有的体验都是对社会的反射，是别人也体验得到的经历，我只不过是从另一种生活方式来完成人生。所以我们看到《西方的没落》产生于普通中学教师的头脑，也理会受到莱布尼茨的平庸苦心。当亚历山大在远征的沙漠中折服于衣不蔽体的智者，当他让开了挡住射到乞丐迪奥根尼身上的阳光的时候，也可能历史学家塑造了不一定真实的政治家的形象与哲学家对比。思想家诉诸于历史中的普遍因素，而政治家则立足于现实中的表面现象。⁵²

体验的理解也是对所有人类思想财富吸收的第一步。例如，要理解尼采，仅仅靠他的论述还远远不够。⁵³哲学的理解不是历史学家式的对资料的处理，⁵⁴一个人没有理想得不到满足、生活得不到解脱的体验就不能作出对生命和意志否定的思考。对于思想家来说，处于什么样的生活体验中远比他知道什么更重要。知道的是可以言传的，体验则是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创造。

这种体验的理解也符合了黑格尔的辩证扬弃的思想，对于思想家的判断不再是政治的归类和善恶的判断，也不再是天平式的正误争执，而是对他提供给人类生活的思考中的深刻性的分析。深刻性作为贡献的准则比别的线索更能揭示出哲学的发展。“唯物·唯心”之争虽然也可以作为一条有效的线索认识一个哲学家，却不能说明全面哲学的面貌（列宁也说过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好）。当然，就某一个思想家（例如孔子那样的集大成者）而言，他可以提供比别人更全面的思考，但他不可能替代整个哲学的思考，也不能成为全部哲学的指导。把某一个人的思想作为全

⁵¹这种受阻于瀑布关口的洋洋大河一落千丈迸发出来的激荡，就产生于平乏的现实生活中。这种暗海的波涛导致了叔本华终生的孤独和尼采的精神崩溃。

⁵²戴高乐很得意自己“为明天的报纸准备新闻”，尼采的父母也因为自己的儿子与皇太子同生日而感恩。

⁵³汝信说得好：“对于尼采不需要辩护。辩护是弱者的事情。在思想史上，尼采不是弱者，他需要的是理解”。这种理解必须是从生活体验出发的共鸣。

⁵⁴近来历史学界兴起的“精神形态史”的研究（如法国大革命史）也突破了这种限制。

部精神生活的准则的现象是政治的方便和人类的愚昧。⁵⁵

利用这种方式达到信仰目的的宗教的伟大意义只是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非现实性。基督教牧师的献身精神不是因为他信奉的教义的伟大才显示出来，而是因为他们传教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舍己向前的人性的牺牲精神。⁵⁶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道德也总是比教条更有效的准则。例如，人们对周总理的崇敬完全是建立在道德生活和工作伦理的判断上的。

在语义现象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内容高于形式的例子：意义最好的名词被引用的次数最多，但当“最高”、“最伟大”等词被引用得倦厌时，我们又感到“平易”、“小草”这些词更容易被接收和欢迎了。

思想家的生活归根结底是来源于生活的，没有现实的给予就不会产生出他的生存欲望来。孔子关于人生的论语，歌德对生活的欢唱，都成了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环境是如此地重要，例如，在政界中短期即可掌握比在厨房中一生还多的知识，这并不是因为智商的原因而为环境的不同。⁵⁷但培养思想家的环境也只是我们日常见到的：诗人的无病呻吟、冒险家的艰辛、锻工的繁重、拾禾农妇的单调和粉笔灰前的统计式生活，等等。正是在这样的生活中，思想家获得了思想的最大自由，完成了对人生决定律的反叛。⁵⁸无论是孤独、⁵⁹痛苦，还是歌唱、迸发，全部人性的光

⁵⁵这使人联想起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基督教式盲从的比喻。

⁵⁶奇怪的是，同样的舍己救人事迹，因为信仰的意识形态的不同(多半是由别人提示才意识到)，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比在资本主义国家伟大，而且据说还有“显著的不同”(见《北京日报》与《羊城晚报》的争论)。

⁵⁷今天的“让妇女回到厨房中去”提法是一个历史的倒退。

⁵⁸绝大多数人可以看作是一种高级的机器，他所经历的反复变化亦是基本上由基因和一直运转中的社会决定的。思想家对这种决定律的反叛，是对现实生活的不认可，由此影响他的全部精神生活。

⁵⁹孤独构成思想家生活中的不可缺少的方面，思想家象拥抱新娘那样拥抱它(爱默生)。这是一种终身摆脱不掉的对灵魂的洗涤。他的否定其自身的意义在于通过这种孤独，思想者认识到了笼罩于每一个人的心中的意识，超越了个人的狭隘生存。而最擅长交往的人往往是最没有普遍意义的。拿破仑成为每一个想突破个人生活限制的青年的榜样，也是因为他年轻时代的孤独奋斗中体现的“世界精神”。

辉，都可以体现在这个过程中。⁶⁰

进一步讲，中国哲学的复兴，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提高，都寄予在这样的生活所创造的认同中。

[1986年7月初写于大连外语学院阅览室。前两节(1.1.与1.2.)曾登载于大阪《雁鸣》1987年。2000年1月于美国圣何西简单修订。]

⁶⁰斯宾诺莎说过：“生活的意义不在于对德行的嘉奖，而在于追求当中”。所有的希腊英雄中，赫克托尔因为向命运之神的挑战使他名列榜首。

2. 《雁鸣》编辑部告读者

“我的悲哀是候鸟的悲哀，
季节不到我唱不出来……”

今年的初冬似乎比往年更猛更烈，曾因性急地扯动嗓子歌唱春天到来而喉头发炎的《雁鸣》经过半年的休整终于得以向读者献上这期最后的孤鸣和绝唱。有个历史学家在分析《共产党宣言》的两个作者的经历时着重指出是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培养了他们的思想与旧传统、旧制度的彻底决裂。而他们的一位正是因为其主编的《莱因通讯》被迫停刊才背离自己的祖国，至今他的骨灰还沉睡在大不列颠的国土上。

我们组织的这次统计调查表明有 29.2% 的人认为《雁鸣》办得较好，45.8% 的同学认为它有必要。我们编辑部已经竭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为这 75.0% 的同学服务，有许多担任打印文章的同学也正是把它作为为同学服务的一个机会而乐于承担工作的，我们这个有近二百名成员的学友会也由此得了不少称誉。但我们自己本身仍深感许多主客观条件限制了我们进一步满足广大同学的要求。

为了进一步提高文章的水平，我们克服了许多阻力，说服了许多担忧，终于成功地完成了这次统计调查活动。但也正是这种做法断送了《雁鸣》的生命。为了我们编辑部在读者中的信誉和我们每一个编辑工作人员的入格和尊严，我们全体一致决定把这些来自同学们的信息，以我们对同学们许下的诺言的方式，在《雁鸣》第七期——也就是我们这批编辑人员编辑的最后一期上公开发表。

“……冬天已经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1987 年 11 月 18 日，大阪千里印刷所印刷，发行部数：600 份]

3. 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的几个片断浮想

民主中国阵线于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在巴黎宣告成立。关于它的性质、意义、作用及组织运行的论述可以详见有关的文件和报道，本文只是捕捉几个会场的断面情节、简单地发放一点个人感受，把会议的气氛传感给广大同学，以尽到一个代表的微薄责任。

一、开幕式

开幕式会场的巴黎大学会议厅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见证人，许多吸引全球的消息就是从这里发出的。前不久访法的戈尔巴乔夫先生也刚在这里发表过演说。不过，让它容纳来自全球的 170 多名各地代表、200 多名来宾和观察员、加上 150 多家新闻机构的记者，却显得略为拥挤了一些。我好不容易坐定下来，发觉边上的人有些面熟，原来是王炳章先生。两年前，我被定罪为“干了王炳章想干都干不了的事”而被骗去了正要去欧洲的护照扣押到签证期满，吓得我由此再也不敢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阪总领事馆”能够“保护”我的范围，连中国都不敢回去。我眼看着这个人物，很不以为然，为什么当局这样恨他、怕他呢？他决不会比当年国民党宣传的共党厉害。不过我却深知与王炳章同座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制止了杨中美要拍照的企图，要是被他在《民主中国》上登上这样一张相片，我的罪行又要被升高一级了。

致词的来宾除了各界民间代表外，还有许多政治性组织的代表，例如波兰的团结工会和西欧的各国社会党，可惜匈牙利的社会党那时还没有成立，否则一定会参加的。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面对面地接触了国民党的代表，与我们头脑中被输灌了几十年的形象全然不同。李胜峰先生也意识到这是国民党代表四十年来首次面对真正的大陆民众的代表，出色地发挥了多党制下的竞选才能，怪不得继他发言的民进党代表康宁祥也恭维道：“我又回到了台湾李先生的选区了！”也不用说《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他，并把民阵判刑为“国民党的走狗”。作为大陆中国人的我则是第一次欣赏到执政党和反对党对民众的讨好（虽然这种讨好可能每年只有一次），在这样的竞争中，对手是反对党，听众和裁判却是国民。我体会到一丝“选民”的满足，理解了为什么美国人偏爱他们的弊端众多的总统

选举制度。唉，可惜没有听到共产党代表的演说，据说是向北京中共中央发了邀请信的。为什么又要在北京搞一个独自的新闻发布会，自立为孤家寡人呢？共产党过去也曾经在宣传方面与国民党竞争赢得了民心的，现在恐怕已经在此机能方面大为衰退，以后再宣传竞争起来输给国民党怎么办呢？后来听说共产党取消了原定于 22 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以示对民阵的轻蔑。

中国人民在选择了两个暴力竞争对手之一的四十年后的今天，应该有能力、有权力选择非暴力竞争对手作为“僕人”了。如果结束一党专制这一天到来了，我立即做一个“国家主人”，退出一切政治组织(包括民阵)，热心地行使公民的权力，津津有味地品析江泽民先生(如果他还坐得稳的话)、李登辉先生(希望他真能有胸怀全中国的气魄)和严家其先生等人物的竞选演说和施政纲领，投下庄严的一票。

二、达赖喇嘛的全权代表

第一天开幕式中的陈一咨宣布“达赖喇嘛的全权代表正在飞来途中”引起了我的好奇。第二天一早一进会场我就被这位与我想象截然不同的全权代表的英语演说吸引住了。这当然也是第一次听到西藏人为自己的民族利益辩护。他回顾了藏族的历史和文明以及共产党当局对它的破坏和摧残。共产党把特别是文革期间的暴行归于达赖的出逃，如果共产党坚持达赖不能代表西藏人民的话，为什么把达赖的“罪责”转嫁到人民头上呢？全权代表提到胡耀邦先生对于改善西藏问题所做的努力和谈判工作的进展，但赵紫阳下台后把一切可能性都失掉了。他又特别强调，西藏的自治不仅是藏人的自由，也是汉人的一种解放，起码可以稍微缓解一下李鹏政权带给中国人民的经济危机。

这还用你讲吗？本人当年就因为“边疆需要”差点被校方当局分配到新疆去了。共产党为什么要花费汉人的这么多财力物力人力去买藏人的仇恨呢？邓小平先生可以容忍同是汉族的台湾实行“一国两制”，为什么不允许在文化、社会上都完全不同的西藏实行自治呢？初一看到达赖获得和平奖的消息心中为共产党担忧，再仔细一想又为中国庆贺和哀叹：我很赞同达赖的非暴力原则和精神，同情理解他们为解决西藏问题所持的主张和所做的努力，今天，这个问题能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会推动它的

解决。但西藏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讲，与港台澳一样，都有赖于中国大陆民主制度的确立。民阵宣言中提到：“民主中国阵线深刻反省长期以来中国民主力量对于西藏人民争取民主、自由权利的忽略，认为西藏问题以及其他民族问题同样必须在人权、法治、自由、民主的基础上才能解决。”是一个很好的回顾。但如何开展工作则是一件我们都不熟悉的过程，当我们由北京戒严看清了李鹏政权的狰狞面目之后，我们才深刻地体会到早在此之前被李鹏宣布戒严之下的拉萨的苦斗。马克思先生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当一个民族还在压迫别的民族的时候，它也同时不能摆脱对自身民族的压迫。当然，共产党决不会用马克思的教义来分析自身的。

三、民主程序

在短短几个月的民主运动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民主不是一种所有物，好象共产党不要它，我们就自然地占有了它。民主是一种程序的过程。我们每一个投身于民主运动的人都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才逐步加深对民主的理解的。我想。严家其先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大学”的演讲和蒋中美代表提议在民阵中继续开展民主学习就是基于这种体会的。这一点。美国来的代表是得天独厚的、也值得我们学习。

大会进行到第二天下午，由全德学联主席李波主持会议修改章程。大家争论非常激烈，常常相持不下，美国来的留学生挟“芝加哥会议”余威、要撤换主持者。李波原是《莱茵通讯》编辑，与我们《雁鸣》曾有过往来，所以我不忍心换掉老朋友，坚决不肯举起已经被越南先生抬起来的手。更重要的是不对新选出的主持人抱更大的期待。几个来自美国的代表竟自吹精通什么 Robert Law 来主持会议的程序。我心里却要问：谁有权利要在我们这个会场施行大多数人都没听说过的这套程序呢？很显然，这种美国式的民主程序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且只适用于议会的，它与其说发挥代表的智慧，不如说更适于指责对手、防范自己的短处被对手攻击。实际上许多人的发言都没有什么意思，常常有人连问题都没有听懂就要求发言，被轰了下去不知害羞还要发言，搞得大会拖到深夜还不能结束。而且，绝大多数代表只是听众而已，幸好有人提醒主持人清点人数，果然不到半数，又去把那些溜掉的代表叫来出场，可谓民主不易。倒霉的是我们这些日本来的代表，几乎被这种程序本身剥掉了发言权，有许多好

的建议都只能“胎死腹中”，我只能趁休息时间上台抓起麦克风发一通火：“请你们为我们这些性格内向的人考虑一下！”引起了大家的同感。

在民主的具体运作上，中国人确实不适应这种美国模式。我们倒是到日本式的运作稍微熟悉一点，议会也只是表演预定好了的安排。但日本样式一般讲来不仅有效率，而且合理性强，这大概是日本胜过欧美的一个原因吧！不过，日本样式也有行不通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个负责实际运作的人就得为主子承担责任，例如我们常常见的政治家丑闻后秘书的自杀。比起游戏式的美国样式来，日本式的残忍又表明了它的“劣根性”。我留意到了这一点，决心把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活学活用一次，就自告奋勇地承担了第三天最艰巨的选举工作中亚太组的会议主持工作。结果还好，既充分满足了大家的竞选的欲望（例如为了满足“自我介绍”欲望的李梁先生也得以上台“老王卖瓜”了一番），又使大家能够严肃认真地挑选，在预定的十一点三十分整完成了理事和监事的选举工作，博得了包括台湾来的代表黄伟成先生的好评（黄先生被选为台湾地区的理事）。

民主是一个动听的字眼，共产党似乎也没有宣称放弃民主的意图（可以参见中共发言人袁木的宣言）。我想，如何在实际的运行中而不是在截然相反的“民主”争议中使共产党的组织整体也意识到民主制度是符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社会组织形态，是更有意义和更为艰巨的工作。我并没有对共产党本身能够改造自己的变化完全绝望，正如被毛泽东带入绝境的共产党组织会产生邓小平体制一样，被邓李杨葬送了的共产党现状也有摆脱困境的可能性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一大悲剧在于它宣称消灭阶级的时候没有提及如何消亡自身。如果社会的发展证明民阵错了没有存在的必要，这倒是中华民族的一大福音。

四、小小的担心

这次大会汇集了许多风流人物，一睹他们的风采，观察他们的言行，学习他们的过人之处，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此外，各种类型的人物的角色和表演，也是我乐于分析的专业本行。你看：民联主席胡平先生和蔼可亲，从四川老乡关系扯到八〇年北大清华的学生竞选，最后从怀中掏出文书拉我入盟；台湾来的教授、议员的深谋老算与三个小姑娘大学生认为民主是生来俱有之物的对比；“匪情分析专家”的冷酷目光；日本去的台

湾代表谢伟先生更为有趣，他发表了一通与监委选举无关的演说遭到哗然嘲笑和猛烈责问，以最少票数落选。会后他告诉我：“我只是故意这样做来考察大家的性格，美洲来的代表果然认真，按照程序追问不舍。一般人都反应激烈，唯有一个人很沉着，丝毫不为所动。”

这个人就是民阵的管家，人称“万总”的秘书长万润南先生。我一方面为自己的校友自豪，同时也为他担心，因为民阵的组织营运，在许多方面是与共产党既相对立又相似的，万先生乐意表明他的政治智商比李鹏高出不少，而整个民阵会议中也漂浮着这样的一种气氛，有一种“民阵精英”优越于共产党腐朽官僚的自我满足感，以至于大学一年级的吾尔开希同学还要郑重其事地声明：“我不是领袖”。

我记得在中国的农村里，村里的小孩子都有小名儿的。那名字要取得低贱，那孩子才能健康成长：什么毛毛、草草呀，二狗、小耗子的。可惜我父母受了共产主义教育不信这一套，弄得我从小体弱多病。我们看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兴衰史，也知道好大喜功的风云人物的命运本身多灾多难，也为组织带来了不少不必要的损失。“领袖”这个词也只是抗战胜利后的蒋中正先生和内战胜利后的毛泽东先生才当之无愧的。外界的报道决不能影响民阵的运作。说实话，大陆逃出来的许多学生、知识分子等各界人士，连在西方社会站得住脚的能力都还必须学习，如何谈得上展开有效的民主运动呢？我临分手时不客气地对高自联的小校友张锐说：“你能够逃出来，提供了绝对难得的机会，到了美国后，把以前的事情都忘掉、老老实实地念书吧！”

这也包含着我对民阵的小小的担心和忠告。我希望每一个民阵的成员（包括领导者）在完全脱离民主运动的假设状态下都能在西方社会中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这样的人参加民阵，可以对民主运动有所贡献而不需要索取，也不会为民阵内部产生一些极为无聊的权力、荣誉争夺。我坚持认为，民阵成员对于民主运动和民阵组织，绝不该抱什么索取的心态，否则会葬送民阵的前途的；那些“靠组织吃饭”而不是为组织增添砖瓦的念头是不能在民阵里站住脚的。

[首次发表于东京《民主中国》月刊 1989 年 11 月号]

4. 民主运动与独立人格

“每一个要成为哲学家的人，首先必须是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黑格尔

独立、平等的人格是近代社会中最重要概念——人权——的哲学基础，我们很难判定由上帝来管理人格，还是坚持人格不可转让这两者的道德孰优孰劣，但我们断然拒绝把人格交由异己（他人、政党、国家等）来支配。人权、以及基于人权而产生的自由的个体、民主的组织形态是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归结。斯宾诺莎本人的哲学贡献并不是最伟大的，有不少人超越了他。但他以自己的人生实践着自己的哲学，教会出高价收买他表达其思想的自由被他断然拒绝，二十四岁被逐出教门的斯宾诺莎靠研磨透镜度过了生命的另一半岁月。罗素说：“在哲学史上，达到斯宾诺莎的成就是不容易的，要达到斯宾诺莎的人格是不可能的。”

所谓民主，只不过是适应现代大规模组织形态的一种方式，是克服大规模组织形态的严密、复杂分工带来的官僚制弊端的一种手段而已。人类兴许可以找到更好的方式来适应现代的社会形态，不过现在还没有发现。民主作为一种手段和方式，只是社会形态的一个附属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当然这个附属现象也很有意义，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去争取，如天安门事件，但人格的独立却是永恒普遍的超越时代和地域的实质而不是形式，所以不存在“资产阶级人格”与“无产阶级人格”这样的概念。



八九中国民运的性质，从这种道德意义上的理解，其价值远远超出了政治意义的民主要求。可以把所谓“民运领袖”理解为“政治精英”，但这场运动的实质是以绝食静坐的学生、阻挡坦克的市民为代表的，社会各阶层的参与、

支持是基于人格的感召。可惜、可悲的是：几乎所有“民运领袖”都不具备这方面的共识和素养，根本不具备人格的力量。学生运动中拒绝共产党内部势力的“帮助”，从道德的意义上讲是绝对正确的，不要指责学生“幼稚”，请问共产党内部有可以共同合作的“势力”吗？没有！

当然，共产党的广大党员群众，大多数是有人格的，百万游行队伍中有多少共产党员啊，民主运动没有必要提“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也不现实）。但所谓“改革派”的“体制内官僚”以及那些想沿着此阶梯往上爬的“精英”，虽然其出身背景、经历使他们想往“民主”，因为“民主”可以使他们从邓小平那里多乞得一些权力和利益。其人格却丝毫没有与共产党特权阶层的有不同之处。

我印象中的“改革派”是这样的：在拥挤的火车上“无意”露出国务院体改委介绍信的有为青年；神秘地透露出“我与陈一咨就中国的前途进行了彻夜长谈”——我其时并不知道陈一咨是何许人也、他对中国前途有何高见，值得如此自豪；“严家其请我回国去主持一个新开的研究所”——严家其的人格如何我一无所知，翻过其“文革十年史”，虽有新意，远不能与马基雅维里的开近代史学先河的《佛罗伦萨史》相比；在运动高潮好不容易“舍身投入民运”，又非要当“领袖”不可，自己一旦成名就暗中开始安排后路……这些人大概就是人们所指的“新权威主义者”吧！与只身挡坦克的王维林那样的千千万万的“芸芸众生”学生、市民相比，他们的人格连粪土都不如！

所谓“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之争纯粹是无聊的文字游戏。从人格上看，从中共总书记、共产党的大学副校长、普通平民，到右派、“反革命”，这些人之间没有任何人格上的高低之分，各人以自己的地位、方式在推动民主化过程。

更进一步说，中华民族没有这些个人照样要进步，而他们没有通过为民族的献身，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而宣称“继承八九民运精神”的组织和个人是如何认识八九民运精神的呢？如果说民阵章程上列出“派别公开化”是公认的、无可奈何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前提的话，那么实际的运作可以说充分利用了“民主”能够提供的遮丑布。孙中山先生曾经要求国民党员，共产党在初期也要求其成员，要有高于普通国民的人格和献身精神。所有

从事民主运动的人，都应该扪心反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没有必要打着“民主运动”的招牌。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成立，远比今天的民主运动要崇高得多，而今天我们之所以站出来反对共产党的独裁、主要是因为独裁必然、而且已经带来社会的腐败、人格道德的低下。如果任何一种不同于民主的方式可以减少避免腐败的话，我们就没有兴趣为民主奋斗了。如果我们自身没有起码的献身精神，也就没有必要再重复历史的悲剧了。

中国的近代史有最辉煌的记录：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成立，反侵略斗争的第一次民族胜利，万众拥戴的共产主义的胜利，邓小平先生文革后刚出山时带给人民的期望。但我们今天终于意识到：在这个日新月异发展的时代，中国又回到了一百多年前的老路上去了，以“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杂交）又开始了新的“洋务运动”。这种停滞的根本就在于整个民族的独立人格意识没有确立起来。立志作“当代孔孟”的冯友兰老先生晚年所言“我是如何由尊孔到反孔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哲学的顶峰”的立场，就是这样的例子。

卢梭曾经对“公意”与“众意”进行过区分，公意是指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意志，但不一定是多数，如“政治现代化”就是公意；众意是指“多数可决原则”表达出来的意志，其形式从美国的总统选举到台湾国民党的“全体起立”推举候选人的方式，各有不同。中国由于没有个人的独立人格的基础，谈不上“公意”的形式。所以虽然每一个中国人，与外国人单独相比有时在智力上也占上风，却逃不脱整个文明的衰落命运。可悲的是民主运动也一直停留在“众意”层次的运作上（虽然还远远没有达到欧美的议会民主的水平），纠缠在人际关系、行动方式等的问题上。民主运动的目标就是把公意转化成众意。如果没有独立人格意识的形成，民主运动



只会重复国民党、共产党的历史：以道德的感召而成长，以道德的腐败而溃退，民运组织变成为自身集团利益、为上层人物谋私的机构。八九中国民运的精神是民族再兴的道德意识的觉醒和复苏，它再次呼唤中华民族的独立人格意识的形成来迎接近代社会

文明发展的挑战，为此，我要大声疾呼：

每一个从事民主运动的人，首先必须是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

[首次发表于东京《民主中国》月刊 1990 年 7 月号]

5. 回忆 1980 年的清华学生会选举

一九八〇年是中国大陆四十多年来唯一进行过学生会自由选举的一年，围绕着学生会选举在全国都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笔者这一年刚考进清华大学，有幸目睹了这一次选举中的各类表现和活动。从这一次大陆最充分的选举中可以认识到不少蕴藏于中国社会中的底流和暗礁，也可以窥视出一些后来中国政局的变迁来。

清华的学生会选举是在主楼后厅的雷贞孝的讲演会上拉开序幕的。雷贞孝可说是中国人才研究的开创者，其名声“如雷贯耳”，凡愿成才者无人不晓。那一天我第一个赶到后厅的正门等候，但由于人太拥挤，把我新戴上的手表也挤破了壳，等我们进去时发现座位已经被从前门来的学生会干部们占满了。雷贞孝的演讲是当时中国社会几十年来都没有听到过的，我们几乎是为他每一段话都喝采叫好一遍。讲完之后，大家余兴未尽都围着他发问、签名。这是清华校园中最精采的一次讲演，他走后校方极为恼怒他的影响，在校刊《新清华》上以雷锋精神对他展开批判，并再也没有允许他这样的人到校园中来。

这样一个同学汇集的大好时机当然不会被有心人放过。雷贞孝还没有进场时，后厅早已人满为患，突然，有一个彪形大汉登上讲台抓过麦克风请同学们安静，给他几分钟时间。他说，校方已经决定今年的学生会由全校同学选举产生，他愿意站出来“为人民服务”，并说他的目标是“建立独立的学生会”。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带有人的尊严、人的基本权利的宣言，我们使劲地鼓掌，我的钢笔也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紧接着，又有另一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同学也上台宣布了同样的决心。这两个人是工程物理系七七级的吴潮光和电机系七七级的赵国杰⁶¹。

⁶¹ 文章在网上转载后，有同学指出赵国杰是竞选人大代表。很有可能，他先竞选学生会主席，后转为竞选人大代表。（2014年12月12日）

接下来是由各班出一名代表组成全校的选举组织。班上的同学推我出去，其实我心中对于整个过程的程序和活动并不太感兴趣，但是目睹的一些现象却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

首先是每个系必须选出一个候选人来，我也是工程物理系的，我们系好象受到了格外的注意。吴潮光贴出了大字报，其口号是“决不把自己绑在别人的战车上！”不过我看没有人认真地去读其内容，他的书法倒不错，标准的柳体(我应该还有他的毛笔信件的)。但是，全校人才汇集，“群星灿烂”，人们很快地把焦点转到我们系另一个更有力的候选人身上了。

他是林炎志，其背景与外表一样，给人一种不同寻常的吸引力。通过演说，我们才知道我们身边果然有一位只有在报纸、小说中才能见到的英雄：林枫的儿子、“文革”期间因反对“四人帮”而坐牢、“四·五”运动时带领工人参加纪念活动、刚写过信要求华国锋不搞终身制、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等等，其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使我们向往和羡慕的了。但令我不解的是，在系里选举中，七七级的大部分同学都投了吴潮光的票。但林炎志还是首战告捷，因为低年级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投了他的票。我也不例外，而且还是全系的总监票人，对于一些不关心政治的同学我就为其推荐林炎志。在投票的时候，一个七七级的重庆老乡，掏出一个五分硬币抛在桌面上决定人选。这个“老油条”后来跑到德国去了。

在全校的决胜选举中，林炎志的战略仍然是争取低年级同学。他的秘书长康**有一次跑到我们寝室来游说，提到赵国杰，他说：“电机系的人都反对他，跑到工物系来支持我们。赵国杰哪配当我们堂堂清华的学生会主席，他经常偷吃同学的奶粉！”这番话使我们忘了赵国杰毕竟是经历了电机系的投票才能参加全校选举的了，有了“偷吃奶粉”的嫌疑，那当然绝不可能与学生会主席有缘了。

学生会主席选举的各路人马最终形成两套班子，一边以林炎志为首，另一边则以张克为首。张克穿着补丁衣服，给人感觉他是农村出身的。就在这白热化的时刻，传出流言，说林炎志被抓是因为与贺龙的儿子贺鹏飞等人抢劫汽车而犯罪的原因。我们都不太相信，林炎志还告诉我他性格温和，“文革”中被小孩吐唾沫也不敢还口什么的。而最关键的是，在最终的组阁人选选中，林炎志宣布张克愿意作他的副主席，这给同学们造成

了极大的困惑。你张克既然有意作别人的副手，为什么又要出头呢？张克慌了，声明退出，并解释说：“林阁”因为没有学生会工作的经验，所以请他这个“有经验”的人在当选后帮忙。不过，大势已定，最后结果张克以一千七百多票比三千多票而败北。点票结束时，我这个一年级的代表被校团委的负责人叫出来签字确认数字。

在学生会选举的后期，海淀区人民代表的选举也在进行，但它不象学生会主席的选举那样吸引我们（我们许多一年级的学生还不到 18 岁，没有选举权），当然也没有北大的胡平那样热闹了。有一个要求女性解放的北大女同学把大字报贴到清华校园来，仿佛“有伤大雅”似的，立即被撕掉了。北大的杨百揆在演说中说：“我不是共产党员，我爸爸不是共产党员，我祖宗三代都没有共产党员！”好不痛快！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但我们系有一个七七级的张*同学在落选后，却成为校方宣传的明星，因为他在演说中理直气壮地说：“我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我信仰共产主义！”我们都公认七七级是最特别的，十年的人才都放在同一届了！

选举结束时已经是严冬了，校方后来宣布以后清华不再进行学生会选举了，因为选举冲击了教学和冬季体育运动，而一些幕后的内容则没有多少人关心了。例如北京市高校候选人会议，校园外社会上的“复杂背景”，有的政工教师大骂学生不懂民主、不配民主，校方对林炎志的支持，北师大一个七九级女同学（走资派的后代）给党中央写信批判其党委软弱无力，等等。清华的学生会从此由校方任命，直到三年后才发生了一点风波。而那一次“选举”，笔者不幸成为出头鸟。

清华的一位党委副书记，在一次全校党员大会上列举了几个校友的优秀事迹后宣称：我们清华人要在全国的重要岗位上发挥影响！引起全场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与北大文科同学的慷慨激越、夸夸其谈的形象相比，清华工科同学的保守严谨、扎实肯干，是其在中国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实力所在。胡启立与姚依林、宋平多少体现了这种对比，一九八七年是清华的副校长滕滕取代管惟炎的科大校长职务的，一九八九年，由林炎志在熬过了团中央和北京市委的试验后，首次出任重要职务代替北大的党委书记王学珍。与此同时，北大七七级学生会主席张伟却被撤职了。因为在共产党的标准中，人文、社科不是科学，甚至算不上知识，但理工科却是“知识化”、“专业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外国的政治

家是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出身的，而中国新一代的政治家则是理工科出身的，清华就成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势力的重要供给源泉。

但从“体制外”改革的民主化运动来看，则是北大同学占明显优势，胡平是一个象征，他们失败了还可以再干，大不了去搞专业。而清华的同学，如赵国杰、吴潮光那样，政治上一旦失势，专业也拿不起来，既不为社会承认，也不为同学们接受，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悲剧。不过，如果我们要说，人生有一次痛快也就足够了的话，那么，大批考入清华的品学兼优的同学被校方赏识，当上“学生干部”，五年下来既没有普通同学那样的知识素养，又不可能有林炎志那样的前程，对于国家和个人，是多么大的一笔损失啊！

只要中国的教育制度仍然是为党、国服务的话，学生个人就逃不掉默默无闻的所谓“雷锋”钉子的命运，科学知识就不会发生其应有的社会效应。

[首次发表于东京《民主中国》月刊 1990 年 6 月号]

6. 回顾“未来与发展协会”的人与事

清华大学校园内的各种文体活动是极为丰富的，各种运动队、乐队、文学、诗歌、围棋、书法等社团组织多如牛毛，而且水平也不低。在北京高校的历届体育竞赛中，清华总是与北钢分享前两名的地位。清华的校乐队还可以组织“黄河大合唱”这样的“国家级”专业表演。

这些组织的基本特征都是调剂繁重的专业学习，与同学的精神生活没有多少联系。同学的精神生活是由政治思想工作的部门校学生部，校团委专职负责的，在每个班里，除了班主任，还有政治辅导员和团支部组织，每周星期五就是专门的政治学习时间。在校团委下成立了不少类似“学雷锋小组”、“马列原著学习小组”的预备党员组织。曾当过毛泽东秘书的党委书记在报告中常说：我年轻时冒着生命危险也要读毛主席著作，你们现在有这样好的条件，更应该珍惜利用才行。清华党委还发明了“由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进步三段论，据说很有成效，邓小平也推崇不已。

所有这些工作，特别由于一九八〇年的学生会主席和海淀区人民代表的选举之后加强起来，当然，选举被取消了，因为它冲击了学生的本份。即便有选举，也不能代表同学中的思想交流，没有了这个起码的形式，更促使一些同学突破专业班级和团支部的界限与外系的同学交流，这就是“未来与发展协会”形成的最根本动力吧！

协会没有正式组织

据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在酒吧与朋友的聊天中形成的，维纳的二进制思想也是在餐桌上的聚会中形成的，所以，协会也没有任何正式的组织成员，同时也不必对外界(校党委等)承担任何责任。它的“成立”可以以第一次的公开讲座来表示。首先是经济管理系七七级的，刚当上海淀区人民代表的顾立基讲九〇年代的中国经济分析；其次是由水利系七八级的顾北平用高考复杂的例子说明运筹学的意义，据说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撇开老师的指导而在十五岁时从甘肃考入清华的；最后是水利系八〇级的殷雅俊对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难。他说，相对论的前提：“光速在任何坐标系中都是相同的”，明显是违反人类常识的，所以，他设计了一种实验可

以验证爱因斯坦的错误，并请物理系的人去干。我因为是工程物理系的，深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惭愧。一个教授后来评论殷雅俊的错误，却没有说服他。殷雅俊感到自己的思想很伟大，就把其写成大字报贴到食堂门前，公开招请辩论。此事当然不了了之，我后来学到电动力学，读了马赫对爱因斯坦的批判，也不甚明了，只是意识到我们中国人的思维能力还停留在“机械唯物主义”的阶段。

由于协会没有正式组织，每人关心的领域也不同，但有一点是我们都共同意识到的：这个组织受到校方的格外关注。我隐约听说，这个名称是郭沫若的孙子取的，它的目的就是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不拘一格地研讨，校党委为此专门开过四次会，最终决定以疏导的形式来处理。我被班主任劝告：少管别的事，多搞专业研究。事也凑巧，我二年级期末的数理方程成绩是全班最低的，班主任以此为例写信到我家中，要家里促我专心学习。

协会的召集人是电机系七七级的李年昌，他由其电力系统的专业出发，大力提倡贝塔朗菲的系统论；顾北平则对控制论感兴趣；计算机系八〇级的张玉志则称要以信息论来统一协会的研讨。依这些人而言，“三论”是继进化论、相对论、量子论以后的科学革命，也是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自然成为协会关心的主要课题。尽管的确不断取得成果，同时也惹出麻烦。

先是化工系七九级的刘鸣在《体育日报》上发表了一整版的长文“用系统论的知识来重建国家足球队”，据他吹嘘国家队还请他去座谈，为万众所期的中国足球队起死回生。后来他毕业离校时沮丧地说：“系统论连一个足球队都救不了，还有甚么法力改变社会，我以后只搞专业工作了！”工程物理系七九级的修永骏用“三论”研究军事辩证法，请了一位军事科学院的教官来讲过一次，使我们又对瑞米尔、克劳赛维茨热心了一阵。不过，当工程物理系七九级的杨利亚受伽里略《两大系统的对话》的刺激，用系统论写了一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的对话》、对这两大体系各打五十大板时，系学生组的老师找上门来与他谈心。杨利亚脑袋很顽固，最后毕业时被分配到四川绵阳的深山里从事核物理研究去了。协会最大的胜利是通过学校自然辩证法教研室的魏洪森副教授与钱学森、宋健等人挂上钩。

当时，钱学森摇身一变，成为社会科学的“先驱”，以马列主义教条到处设立新学科，遇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于光远的阻挠。于先远利用北大和社科院的影响，在争夺“最高权威”的称号中略占上风，在人体特异功能问题上引用恩格斯的讽刺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你们还能跳多久！”钱学森哪甘认输，想法利用其“科学元老”的优势，掺加一些托失勤、贝尔的隻言片语，在中共上层和清华找帮手。这样，顾北平打先锋，协会有几个人也积极为钱学森摇旗呐喊，为其胜利立下汗马功劳。钱学森的传记《一传风流》出版了，宋健当上中央委员、国家科委主任，魏洪森也升为研究室主任，协会也出了名，还与美国的“国际学生联盟”挂上钩，对方送来了《第三次浪潮》、《大趋势》之类的读物。

协会的精神受挫折

也在这个时候，协会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挫折。原因是七七级的同学毕业离校，顾立基、郭锟(我也搞不清楚同名的中国南极远洋探险队队长是否就是他)、李年昌等人的离去，使协会缺乏组织上的召集人，留在学校的学生发生了不小的分化：顾北平沾沾自喜于魏洪森、钱学森的召见，签名赠书；张玉志则“代表”协会接受校方的招安，当上了新成立的“科学协会”的会长(校方想把我们的协会全纳入“科学”的领域内)，并与北大的学生会主席张伟等人组成“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日本，回来以后还眉飞色舞地要为我们作报告！

协会由此再也无法展开有效的活动了，杨利亚和我仍然力主思想的探索，在勉强维持的交流会上，学习黑格尔的《小逻辑》，有一些低年级的同学参加，刘国庆和胡玉清是比较热心的。刘国庆后来成为校学生会下“哲学小组”的负责人，专门攻读《小逻辑》。胡玉清是土木环境系八一级的，在我四年级时，校方喧染我“想当学生会主席”而组织全校的系团委书记与我“辩论”，对我进行“教育挽救”，当时只有他与黄虹帮助我应战，使我终身感谢他们。这次辩论对于我们三人而言，都明知毕业分配时的后果不堪设想，迫使我们认真对付研究生考试。黄虹和我都得以留学，胡玉清后来也考上了北大经济系的研究生，但其留在清华的女友与他断交，他杀回清华在女生宿舍动粗被校卫队抓获，轰动一时。

协会中有许多人和事，我都记不太清楚了，值得一提的还有与我同系同级的王云，毕业后留美，在八七年留美学生抗议中共中央倒退的公开信中有她的名字；电机系七九级的栗志刚毕业后进了中信公司，曾荣耀地返校见过一面；与我同班的刘云辉放弃物理学，专注于佛罗伊德，在福州家乡的工作单位结束了痛苦的生命。

协会活动的完全终止可以认为是我们八〇级的同学毕业时大家在清华学堂最后的合影，有十五个人左右。有一个低年级的同学问我有什么劝告，我说：“回到班上，把自己的专业学好。”

回顾起来，把我们这些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同学召集起来的动力就是科学探索的自由精神，我们每个人都程度不同地从协会的交流中受益匪浅。对我而言，它助长了我对历史学、哲学的关心，并最终告别了爱因斯坦，从事马克思留下的研究。

[首次发表于东京《民主中国》月刊 1991 年 3 月号]

7. 滔滔浊流的透视—从清华大学看中国社会的政治理性

一九七六年中旬，几乎在毛泽东去世的同时，《人民日报》以显赫位置登载了中国核试验成功的消息。在香港，这个窥视当时中国封闭社会的唯一窗口，敏锐的中国问题专家们就预言了务实派邓小平的复出。为什么呢？因为核物理，这个对外抗卫的“王牌”，是观测中国政治斗争的极为准确的晴雨表。

【保护核物理学家】

核物理，以及与此相关的卫星技术，是所有中国科学技术领域中，唯一没有受到文革的冲击、可以与苏、美相竞争的王牌，奠定了至今为止中共仍引为自傲的“三角格局”的基础，没有原子弹、氢弹的爆破成功，没有卫星上天，中共决不敢与苏共闹翻，毛泽东既不能把美、英、苏防止核扩散的“三家条约”嘲笑为“土豆加牛肉”，也营造不出“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好革命形势”来。

被封为“中国氢弹之父”的邓稼先去世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的纪念文章，详尽地记载了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实掌核工业部的聂荣臻，都严禁在这个领域内玩火。聂曾亲自下令不许在核工业部的大院内贴大字报，张爱萍这些将领亲自为核物理学家解决了老婆、子女的问题。在一本吹捧钱学森的题为《当代风流》的书中，甚至说他“一个人顶五个军”。文革后恢复高考、最热门的就是物理学，学生们多是受“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与原子核有关的科学家的刺激而来投考物理专业的。

【退学风波】

一九五八年，为了与美、苏抗衡，由中共中央决定，在清华大学原被转并掉的物理系的基础上，汇集全校各系尖子，创建由教育部与核工业部共管的工程物理系，首任系主任是何东昌。该系下设五个专业：核电子、铀分离（原子弹）、核材料、核反应堆和加速器。系本身还有一个原子反应堆实验所。

号称“原子弹摇篮”的工程物理系，在毛泽东去世后又成为华国锋的

王牌。当然，这一次不是原子弹，而是高能加速器。其经费可以与“建造十来个大庆油田”相提并论！除了苏、美两国，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单独建造这种加速器，西欧各国也只能共同出资，在瑞士、法国边境上成立了“欧洲核子中心”，合用高能加速器。

缘于这个历史的误会，笔者也与这个领域结下不解之缘。一九八〇年笔者跨入清华大学的工程物理系，一九八五年的毕业设计又是在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完成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刚入学时有一个铀分离专业的同学声明他不愿杀人而要求退学。一个老校友谈到此事时说：“好比原始部落中，突然有个部落发明了刀，怎么办？我们也只好造出来，这样才能平等。”我们都接受了这种认识，但有一条很明确：中国不能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改革的含义和方向】

笔者刚入学，就传来不幸消息：邓小平取代华国锋后，听取了李政道的建议，认为在中国建高能加速器不合国情，这个称为“八七工程”的计划作废，改为建两个中能量的加速器对撞机。对撞机的建造几经挫折最后终于成功，其产生的束流效果达国际同类机器的最佳水平，其时正好是“六、四”爆发前夕，邓小平、赵紫阳由周光召陪同，亲自出席了庆贺仪式。

清华工程物理系的成长和发展成为中国当代政治的“风向标”。从这里出身的何东昌、周光召、贾春旺、林炎志等等，是中国动荡无常的政治中技术官僚的典型，他们是共产党维持政权的中坚力量。“六、四”以来，关于中国的民主化争论何其多也！各种预测还没有来得及传开就夭折了，其中最为致命的弱点就是人们都贪图便宜，只想从政治这个最具偶然性的变幻中去碰运气，而没有人从事具体细致的社会学分析。

今天的民主运动中，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利用其文科的优势，在外界和国际上的共鸣之下大造声势，仿佛民运的传统就是北大的精神，这是极为肤浅和可怜的。首先，中国的改革，是一场远远超过为争取言论自由的民主运动（特别是示威游行）的社会形态全体的变革。争取言论自由的民主化运动只是整个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最敏感的问题而已；其次，如果把北大的精神只赋予抗争的含义，那么就意味着放弃了研究社会、认识社会的更重要的责任，也是忽视了科学知识对社会影响效应的广泛深刻性。北大对

中国社会生活内部的实际决策几乎没有影响力，这也反过来证明了其致命弱点。

【清华对中国社会的支配力】

清华大学对中国社会的支配性影响是越来越明显的了。清华大学每年涌出的两千人的滔滔浊流，成为邓小平时代决定中国社会政治变迁的最强有力的筹码，其中有：姚依林、宋平、何东昌、滕滕、艾知生、贾春旺、周光召、钱伟长、林炎志，以及遍及全国各省市、部局、厂矿的实权派。整个国家教育委员会，几乎都由清华出身的人把持着，历届教育部长是清一色的清华出身。这一次让北大新生去军训的安排也看得出清华系对北大的排挤。令人欣慰的是，民主化的潮流从本质是与理工科知识要求的发展是一致的，清华毕业的万润南、罗征启等也投身到民主运动中来了，在天安门广场上最后撤退、牺牲最多的是清华的同学。这就是清华精神！在最关键的位置和时刻，清华人付出了最大的贡献。当晚学生要校方派救护车去广场，张孝文校长还不相信真会如此严重，犹豫之际被愤怒的同学打了两耳光。江泽民，这个上海交通大学（“南方清华”）出身的技术官僚，最先就是去清华安抚的，被同学们纷纷质问：你自己还能坐多久？

【清华教育的魅力所在】

邓小平时代的一个伟大进步就是实现了自然科学的社会价值，承认了自然科学研究者的社会地位，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则仍是马克思教条的奴仆，这就是清华大学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远胜于黄浦军校的背景。清华大学的实际运营，丝毫无愧于时代的需求，其实力在于基础知识和学习方法：基础课必须由系主任等老教授讲课。教授我们微积分的施学喻先生（苏步青的弟子）在回答如何提高积分技巧的问题时说：“我作了两万道积分习题！”学生会选举中有人不知天高地厚地要求把五年制改为四年，引起老先生们的强烈抗议：“四年能学到什么东西？除非不搞毕业设计！”至于学习方法，教授们乐于提及的是：“给学生猎枪而不是干粮”。因为社会大森林太广阔了！

在“红”这一条，清华也是中国的所有高校都望尘莫及的。邓小平多次对清华的教育赞不绝口，因为清华能够培养出适应上层意图、符合工作环境的保守慎微、扎实肯干的人材。这才是在中国社会发挥作用的最重要

本钱。我们一进大学，校方就力戒同学中的“大事干不了、小事又不屑干”的骄习，培养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的素养；每年毕业分配，虽然有人事的暗算，但总有 10% 的同学无怨地去“新(疆)西(藏)兰(州)”等边远地区工作并在基层扎根，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林炎志、顾立基就是典型的例子。林炎志深知中国需要胡平那样的人，但他自己绝不干那种蠢事。顾立基与胡平同时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但他毕业时撇开上海的老婆，穿着补丁裤子去蛇口任工业区主任了。北大就寻不见这样的精神。我的一个北大同学，在毕业时贴出海报自愿去边疆，令我们大为惊奇。后来校方真的找上门来，他用四川话回答说：“老子去个 X！”

越是伟大的事业，就越需要细致严密的责任分工，而绝大多数岗位都不会成名成家的，“干大事业不当大官”就是清华精神必胜的法宝。

【中国变革的三阶段】

整个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必然要求社会组织形态适应于科技的发展采取合理、民主的方式，这样的要求是超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苏联变革的社会学实质即在于此。萨哈罗夫(核物理学家)、方励之(天文物理学家)的出现，都是共产主义全权社会形态下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变革中尽管有不少偶然性的政治因素，如“六、四”事件的过程，但整个社会的变革是无法抗拒和阻挡的。大体说来，中国变革层次有三个敏感的晴雨计：(1)核物理、(2)自然科学技术、(3)所有人类知识文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民主化进程都是它们依次取得社会公认地位、发挥社会效用的进程。中国目前正处于从(2)至(3)的转变之中，这种转变，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合理的现实，对清华大学的透视便是最明白不过的证明。

[发表于东京《民主中国》月刊 1991 年 4 月号、《明报》月刊 1991 年 7 月号]

8. 陈独秀的思想变迁略考

当我读完上海亚东图书馆于一九二二年出版的《独秀文存》，⁶²目睹今日之中国社会，不由得想起黑格尔的设定，难道太阳之下，真的没有新东西吗？

《独秀文存》于六十六年之后能在中国再版发行，只不过表明了中国社会在言论自由等侧面的退化得以抑止，其本身的内容，正如“自序”中所言，“原没有什么文学的价值，也没有古人所谓著书传世的价值”。“不但不是文学的作品，而且没有什么有系统的论证，不过直述我的种种直觉罢了”。“有许多不同的论旨，就此可以看出文学是社会思想变迁的产物，在这一点也或者有出版的价值。”但今天的现实，竟然使其出版价值超越了单纯的历史变迁记录，恰恰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嘲弄。⁶³

独秀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之确立，首要是他立志适应了时代的要求。“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若夫明其是非，以供抉择，谨陈六义，幸平心察之：（1）自立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⁶⁴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1915年9月15日“敬告青年”）。“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916年2月15日〈吾人最后之觉悟〉）。任何自负起开时代先声者，首先必须在乱世之中立志安身：“吾之所谓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者，曰勤，曰俭，曰廉，曰洁，曰诚，曰信”，“呜呼！金钱罪恶，万方同慨，然中国人之金钱罪恶，与欧美人之金钱罪恶不同，而罪恶尤甚。以中国人专以罪恶而得金钱，复以金钱造成罪恶也。但有钱可图，便无恶不作”（1916年10月1日〈我之爱国主义〉）。“像上海这种齷齪社会，居然算是全中国的舆论的中心，或者更有一班妄人说是文化的中心。……流氓式的政客，政客式的商会工会的利用手段更是可厌”（〈上海社会〉）。

⁶² 原版三卷四册，一九八八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重版。

⁶³ 一九八八年，笔者在大阪主办的《雁鸣》杂志被迫停刊时，朋友们都对我说：“你的言论，与《新青年》相比，完全一样”。

⁶⁴ 指密尔的功利论与孔德的实证哲学。

身处知识分子的职业，独秀更痛感没有独立人格的知识手段（工具）的堕落，“中国急需学者，但同时必须学者都有良心，有良心的学者才能够造成社会上真正多数人的幸福”。“这班学者脑子里充满了权势及富豪的肮脏东西，他们不以为耻辱，还要把那些肮脏东西列入学理之内”（1920年11月1日〈社会的工业及有良心的学者〉）。“他们分明是不过为自己为资本家弄了几个铜钱，而偏偏自谓是在中国实业上贡献了许多文化。杜威、罗素来了，他们都当作福开森、朱尔典、拉门德一样欢迎，而且引为同调（硬说罗素劝中国人保存国粹）大出风头，（屡次声明罗素是某人请来的）”（1920年11月1日〈三论上海社会〉）。这不是在论今日中国之教育研究界依附国内外权势争相降低知识分子的地位和能力吗？其时留欧学生赵仁铸感叹到：“德瑞（教授）其职者均为各界之泰斗、著作等身之士，以数十年之经验教导青年后学之士，识途老马，是以无颠蹶之虞”。“反视吾国，任教授之职者均属青年后学，……莫不有大学教席舍我其谁之志”。“又忆及昔在美国每晤吾国同学，辄滋滋问北大教授薪水若干，如何入门”。北大教授王抚五先生有感于此，情愿去筹备中（结果未开张）的西南大学外国学者之下当助教。那些侮辱人格的职称的高低、待遇（如能够自由出国），本身就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社会之罪。

从立志是基于个人主观意志的事实上看，它并不是过分困难，一个具有信仰的人不需要任何高深的知识或社会关系技巧即可行之。但中国人没有信仰的传统，不肯为非现实非功利的东西去奋斗，独秀说：“中国的文化源泉里，缺少美的、宗教的纯情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基督教在中国行了几百年，我们没得着多大利益，只生了许多纷扰，这是什么缘故呢？是有种种原因：（1）吃教的多，信教的少，所以招社会轻视。（2）各国政府拿传教做侵略的一种武器，所以招中国人的怨恨。……（4）因为中国人的官迷根性，看见四书上和孔孟来往的都是些诸侯、大夫，看见《新约》上和耶稣往来的，是一班渔夫、病人，没有一个阔佬，所以觉得他无聊。（5）偏于媚外的官激怒人民，偏于尊（孔）圣的官激怒教徒”。“最可怕的，政客先生现在又来利用基督教。他提倡什么‘基督教救国论’来反对邻国，他忘记了耶稣不曾为救国而来，是为救全人类的永远生命而来”（1920年2月1日〈基督教与中国人〉）。独秀本人的命运表明了其立志优于其行动和认知：最终被自己创建的政党抛弃（中共还宣传他是“拿日本人津贴的托派”），但他宁愿坐牢，绝不肯向蒋介石低头当议员。

一个人的行动虽发自主观的立志，更深受社会环境的限制，独秀之行动由于其立志献身民族的再兴而大放光彩并免去了可能引来的非难，其首要贡献当推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孔教问题，方喧哗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到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到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到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917年2月1日〈文学革命论〉）。此“潘多拉的匣子”一经打开即无法收回，一往直前，推及教育问题，“中国教育大部分重在后脑的记忆，小部分重在脑前的思索，训练全身的教育，从来不大讲究”（1917年7月1日〈近代西洋教育〉）。推及政治问题，“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盖以孔子之道治国家，非立君不足以言治”（1917年8月1日〈复辟与尊孔〉）。随着国内、国际政治激变，独秀更致力于实际社会生活的考察，并由此与胡适、张东荪等“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者分手。“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的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第一当排斥武力政治，第二当抛弃以一党势力统一国家的思想，第三当决定守旧或革新的国是”（1918年7月15日〈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宣言》）。

但他最终参与、置身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活动中。这个彻底的转折是因为中国社会现实很快就破灭了你对“民主”的幻想。“我们不是忽略了政治问题，是因为十八世纪以来的政制一经破产，我们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我们不是不要宪法，是要在社会上造成自然需要新宪法的实质，凭空讨论形式的条文，是一件无益的事”。“资产阶级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会的学说，是阶级战争的学说；资产阶级所欢迎的，不是劳动阶级要国家政权法律，是劳动阶级不要国家政权法律。……你看现在全世界的国家对于布尔赛维克的防御、压迫、恐怖，比他们对于无政府主义党利害的多，就是这个缘故”。“我敢说，若不经阶级斗争，若不经

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的利器”（1920年9月1日〈谈政治〉）。在此，独秀已经公开主张用无产阶级的独裁政治破坏、代替旧社会，显然其实际行为的结果具有与文字革命完全不同的性质。郑贤宗就反论到：“如先生所说规定用法律来强迫，我倒要请教这法律如何规定”。“先生鉴于现在政治的罪恶，对于俄罗斯的劳农政府不禁油然而生羡慕之心；这也是人情所常有的事”。朱谦之抗议道：“你主张要从政治上教育上施行严格的干涉主义吗？你要造一个‘名称其实’的开明专制的局面吗？果然，你的人格就破产了，你已没有再向青年们说话的余地了。你是新式的段祺瑞，未来的专制魔王，我为拥护人们的自由起见，发誓与先生在真理上永不两立。”这样的反驳、抗议对青年思想导师而言，当然以平等的辩论与阐述回应，但如果是上书政权领袖则必遭灭顶之灾。一个真正的思想家，正因为其思想必须深刻影响社会实践，所以必须深刻反省、假设自己思想的各种可能后果并对其担负责任。这一点上，独秀并不是没有想过，连对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这种国家里面，国家的权力过大了，过于集中统一了，由消灭天才的创造力上论起来，恐怕比私产制度还坏。这种国家里面，不但无政府主义所诅骂的国家、政治、法律的罪恶不能铲除，而且更要加甚；因为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从前只有政治的权力，现在又假国家社会主义的名义，把经济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这种专横而且腐败的阶级，权力加多罪恶便自然加甚了”（1920年9月1日〈谈政治〉）。但尽管如此，（实行无产阶级独裁的）“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同上）。独秀也必须在现实政治的压迫下选择，介绍周恩来入党后又成为共和国政权下右派的张申府说：“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相信马克思的很有，但未必是真懂得。……吾到法后，感着欧洲一时是无望的。生于东方的人，不能不仍希望东方。最好的希望是中、俄之联合。……吾觉着中国改造的程序应是：革命，开明专制（美其名曰劳农专政）。以今日中国之一般知识阶级而言代议政治，讲选举，纯粹是欺人之谈”（1921年6月12日寄于巴黎）。中国政治实际已经在呼唤着另一种更极端强烈的主张，如蔡和森（以及毛泽东）疾呼：“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的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注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

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以为这些东西都是阻碍世界的障碍物”（1921.2.11 寄于蒙逢尼）。

如果仅以政治斗争来归纳独秀，今天的中共党史教材对他的定位也许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评定，但他并不只是作为中共建党的一个跳板而更具社会的意义，“我承认人类不能够脱离政治，但不承认行政及做官地盘抢夺私的权利这等勾当可以冒充政治”（1920年9月1日〈谈政治〉）。“我老实说一句，国家也是一种偶像。……若不明白他是一种偶像，而且不明白这种偶像的害处，那大同和平的光明，恐怕不会照到我们眼里来！世界上男子所受的一切勋位的荣典和我们中国女子的节孝牌坊，也算是一种偶像”（1918年8月15日〈偶像破坏论〉）。“梁先生自杀，无论是殉清不是，总算以身殉了他的主义。比那把道德礼教纲纪常挂在口上的旧官僚，比那把共和民权自治护法写在脸上的新官僚，到底真伪不同”（1919年1月15日〈对于梁巨川先声自杀之感想〉）。“军人、官僚、政客，是中国的三害，无论北洋军人、老官僚、新官僚、旧交通系、新交通系、安福系、已未系、政学会，可以总批他‘明抢暗夺误国殃民’八个大字”（1919年11月2日〈实行民治的基础〉）。“欺压我国的日本人为了‘山东问题’正在他们国里日比谷公园开国民大会，好几万个人天天闹个不休，他们的政府不曾丝毫干涉，他们是何等高兴？我们被日本欺压的中国人，也为了‘山东问题’，想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做政府的后盾，政府却拿武力来杀逐国民，不许集会，满街军警，断绝交警，好像对敌开战一般”（1919年5月11日〈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独秀甚至直接教示着今日的留日诸君：“这种浅薄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乃是一班日本留学生贩来的劣货。现在学界排斥日货的声浪颇高，我们要晓得这宗精神上输入的日货为害更大，岂不是学生应该排斥的吗？”（1920年1月1日〈学生界应该排斥的日货〉）。可以用其原文认识今日之中国，反过来，也表明今日之中国尚没有一个站在独秀位置上的有良心的学者全面抨击评论社会，造成国家权力中的一个侧面（行政权）的恶性膨胀。“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御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1919年6月8日〈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

在这罪恶的时代里，志、行固不易矣！但知或更艰。独秀初以驳斥康

有为为使命，但康氏所言却含有几分知的预感：求共和适得其反而得帝国、专制，慕美国不成反为墨西哥，中国武力专制，永无入共和轨道之望，不能专归罪于袁世凯一人（引自〈共和议〉）。再观其未来“无旷土无游民”之理想，“私有财产废止的好处：（1）社会资本真能集中，（2）全社会资本完全用在生产方面，不会停滞；（3）人人都有劳动生产的机会，（4）可以节省用在拥护私有财产（国内、国际）大部分的劳力资本，到生活品的生产事业上去”（1920年4月1日〈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社会现象虽然变迁复杂，但社会规律则并不至于两年一变。可惜，因为知性的贫困，独秀随即变为共和的攻击者了：“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那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现在多数人都渐渐明白起来要求自己的自由与幸福了，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的公例，都是不可逃的命运”（1920年10月1日〈国庆纪念的价值〉）。这样一来，把民主也拱手让给现政权，“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它来打倒封建制度的武器，在现在拿它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民主党与共产党〉）。独秀并很快达及“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的立场（1921年8月1日〈答蔡和森〉）。所以顾克刚要建议独秀：“素闻先生以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先生之用心，当在挽救精神之不衰焉。”欲透知中国，并非“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即可达成。

在文学方面，独秀同时代人为我们留下了中国文字的未决难题中。白话文的确立、普及大大推进全体民众的知识水平，但中文之文字、语法乃至言语，至今并没有达成一个理想的方案。钱玄同说：“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以致辨认书写，既不容易，音读极难正确”（1918年3月14日），比独秀“中国文学，既难转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1918年4月15日〈四答钱玄同〉）更为客观。日语能够快速跟踪欧美社会新思潮，多亏了表音的片假名，汉字是否也可引入表音的辅助字符，或直接导入英文字母与汉字并列？例如，《傅雷家书》中有不少人名、地名的外文字母，对于傅氏父子而言，那种表达方式比硬译为中文更能达意。今后的时代里，中国人义务教育都能略知外文，则掺夹外文的表达方式并不特殊，不会遭到人们的反对。或者，在过渡期间，两者并写（如日

文中把片假名读音写在汉字的上方不影响正文的连接)，但如“马克思”、“美国”这类已经汉化的专有名词可以直接用汉字表示。许多专业刊物、涉外文书其实已经被迫这样实行了，如此可解消吴稚晖“中国文字，迟早必废”的危机论。

独秀的思想，除了对基督教信仰的浅显批判，未能深入思考以古希腊为代表的理性逻辑和以古罗马为代表的法律契约精神，对近代英法美（甚至德日）为代表的产业革命在民主、教育、组织等方面的进步也无法进一步研究。今天，面临着七十年前类似社会现实（在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方面甚至不如七十年前），需要新的知性，让《独秀文学》名副其实地成为单纯的仅供历史学家或者古文字考据者收藏的文物记录。

[2008年11月2日美国圣拉蒙发表记：此读书笔记写于1993年7月3-4日日本静冈县三岛市。2002年1月8日我于美国圣荷西写短文〈陈独秀：问题、思想以及“复兴”的可能〉，收入2008年10月1日出版的《安那祺主义：理论与实践》第一版（ISBN：978-0-557-01635-8），没有展开对陈独秀思想变迁的考证。此笔记正好可以作为一个长长的注释补充上述短文。]

9. 现实的历史中包含着合理的必然

—读铃江言一著《中国革命中的阶级斗争》所感

今天，已经没有人再相信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历史的必然”了，北京政府最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把“四项基本原则”塞进宪法的第一条，靠强权来维持这个“立国之本”。不过，二十年前，面对随处可见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标牌却没有多少人感到过抗拒，对此今天的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百年不动摇”的口号，“历史的必然”不是再明白不过了吗？再往前推二十年，连白宫政府（杜勒斯）也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无所适从呢！但如果我再往前推二十多年，面对北伐胜利，国民党一统天下大业告成的一九三零年，会有人科学、实证地研究出世界战争在中国的利益冲突的展开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必然胜利吗？

一九三零年八月十五日（十五年以后的这一天成为日本投降日），铃江言一（1894-1945年）在其所著《中国革命中的阶级斗争》⁶⁵序言中开宗明义道：“两年半前（1927年）在广东宣告成立苏维埃政权的中国工人、农民最近又占据了长沙，帝国主义列强和国民党扑将而去，不久即夺回了长沙，取得了短暂的喘息机会。但夺回长沙在今天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了，为什么呢？/能够在此历史开头完成此书，感到无尚欣慰。”“无论怎样，毕竟维持了两千多年的中国特别的国家秩序，被欧洲资本主义的到来突然搅乱了。/欧洲资本主义集中对中国和中国人进行原始的殖民地剥夺，他们把商品和资本用军舰搬运而来，把原材料抢掠而归，中国的所有统治阶级都成了他们的工具——买办。/当中国的富豪收割起农民的贡纳品终于戴上“CAPITALIST”（资本家）帽子的时候，中国已经被鲜明地按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中国的重要海岸已经被帝国主义列强夺去，河川成了他们的私产，矿山、铁道等基础产业被置于他们支配之下，关税也由他们管理，他们还君临于银行的财政。总之，他们在中国的绝对的政治经济优势地位已经被不可动摇地规定下来了。”

⁶⁵1975年，阪谷芳直校订版，平凡社东洋文库272号、275号两册。

在这样的情形下，铃江明确地宣告：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的历史前提，清朝的专制主义政治崩溃了，但代之而起的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而是封建地主武装的军阀与官僚贵族的统治。/在从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制度转换的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必然要反抗封建残余与帝国主义的支配，在这种场合的共同对敌的民族斗争中，阶级矛盾被遮掩起来，他们成为工人、农民的同盟。/但是，在帝国主义资本的影响下形成的由中国式的富豪转换而成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经济（即农业经济）的地位中，没有与对农业生产进行封建剥削的地主阶级对立，而是与被榨取的农民阶级相对立。同时，在民族资产阶级面前又存在着：（1）为获求彻底的土地革命而斗争的农民大众；（2）在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军阀统治的政治斗争中为获求自身解放不存在丝毫妥协可能的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投降，与封建地主妥协，对于昨天的同盟，今天以不共戴天之仇的面目出现。……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就是丧失了革命领导权的民族资本主义、封建地主、买办、军阀、官僚的结合，也就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总代办。”中国革命的特性和其必然的发展方向就由以上诸情况决定，此书对这类事情，以及在这些事件中活跃登场的各阶级：资产阶级、地主、军阀、官僚、工人、农民、半殖民地的幼稚知识分子的作用进行客观的记述。“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军阀战争、反复无常的兵变、学生运动、抵制外货、共产党、农村斗争、土匪……，一般人见到的只是不间断的‘混乱’。但只要对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进行准确的解剖，就不存在任何‘混乱’，那些看起来混乱的东西，都运行在一条必然性的轨道上。本书的目的，第一，就是对那些只看到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混乱’的人们，提供这条轨道的必然性说明；其次，就是对那些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考察中国的人们提供必要的资料。本书的表现形式就取自于考茨基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

应该公平的指出：铃江的此书已经高于考茨基。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众多研究中，基于马克思主义史观对既有历史事实的再透视已经决定了考茨基的“阶级局限性”，考茨基（以及梅林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并不比梯也尔、米涅、基佐（Guizot, 1787-1874）等资产阶级学者提供多少新的视野。但铃江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以及他最早的《孙文传》，远远超过《西行漫记》（斯诺）、《伟大的道路》（史沫特莱）等新闻性报道，成为研究中国革命史之经典读物。正如校订者阪谷芳直所解说的那样：“大

正时代中期（1919年3月），作为25岁的失意青年漫无目的飘然渡华的铃江，被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革命运动所触发而激起强烈共鸣，以自己的生命在革命运动中把自己培训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间没有懈怠对中国革命的科学的考察，以自身的实践体验和活生生的资料为基础，为世人捧送比三十年代前后无论在日本、中国或全世界都找不到的关于中国革命的高水平且具正确透见力的劳作。”

在第一章“军阀与官僚”中，铃江通过军阀战争的分析，揭示出军阀的本质，“总之，军阀的地位与活动是以帝国主义殖民掠夺的本质政策为前提的，其结果必然是阻碍中国的近代国家的统一运动，维持封建支配关系来不断对工人、农民的生活进行抢夺压榨。……军阀之间不断展现的各种纷战的永久混乱状态，无非表明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矛盾，除无产阶级革命之外别无解决途径。所以，在过去的国民革命中，不具备彻底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资产阶级，必然以打到军阀开始，以与军阀握手妥协告终。”这样的结论，完全属于共产国际的决议内容：“南京政府没有触动土地所有问题，以后也没有这种打算。因此，在军阀战争中（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等等都是军阀），必然地，构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矛盾不可能得到解决。……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切任务，相互交错、结合，最终只能靠工农专政的胜利才能获得彻底解决。”如果说，仅靠地主阶级的武装代表（军阀）并不能实现对中国的有效统治的话，官僚就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前世纪的英雄（即官僚贵族的栋梁）可以维持大一统的帝国，在帝国主义列强们（主要是日、英、美）的入侵下被武力分割为不同的地盘，他们与军阀勾结在势力范围内布下地主阶级的专政，而最有力的军阀与官僚就构成了“中央政府”，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首尾一贯的特性，在对方的军阀地盘上就没有任何指挥权。这样的状况，正是不惜一切手段在中国谋求经济侵略的帝国主义所求之不得的。而官僚，在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无非就会耍三种手段：（1）争相出卖中国的主权（经济方面）；（2）争相发行公债；（3）加紧对民众的直接掠夺。其结果，当然是扩大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支配权。从1911年到1927年的十六年间，“中国元首”换了九回，内阁更迭高达四十六回。国民党借助工农支持，在“反对党派之争”、“反对军阀混战”的口号下，达到北伐的成功和统一的形成，却也不可避免的重蹈覆辙，走军阀、官僚的老路（其转折是蒋介石到达上海后维护帝国主义列强利益，镇压中国纠察队），都

表明了铃江对于中国革命前程的坚定信念：“解答只有一个：只能靠由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和急进的小资产阶级进行的国民革命才能达成。”

第二章“地主、土豪、劣绅以及农民”是此书的重点。面对中国的农村现状，铃江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报告最为正确、科学（可惜他没有读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表明了民国政府已经不可能获得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农民的支持，在国民革命的根本问题（土地所有）没有得到任何解决之前，民国政府已经开始解散农会，靠地主、土豪、劣绅来维持在农村的利益了（政府官僚们本身就是大土地占有者，特别是南京附近的土地皆为官僚家族之私囊）。“总之，国民党只不过是为了维持对农民的支配才讲土地问题、“平均地权”等等，事实证明国民党已经失去了讲土地问题的资格。国民党对农民的许诺越多，农民就越离弃国民党而去。”但农民已经开始了政治的觉醒，而共产党的政策、宣传又最能抓住农民的人心，农民斗争的必然结局就是选择苏维埃，由此，中国革命大致方向就很明确了。当然，铃江虽然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五年，但主要在北京等大城市度过，并没有深入地体验农民生活方式中不可变动的惰性，一方面赋予农民运动过高的政治自觉意义，另一方面又没有预想到农民生活的巨大惯性隐约地影响着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政府在内的历届统治阶级的决策。铃江正确的指明了丧失农民支持的国民党的失败，十五年以后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内战中，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国军”败于共产党组织起来的浩浩荡荡的“打老蒋”的民工小车队。获得农民的支持是主导中国革命的必要条件，依中国的现状，没有政权腐败、先靠政策宣传的共产党比较容易的抓住这一点，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领导权的确立同时表明了中共的成熟。中共的教科书比铃江更详细的记述了共产党人在“政权就是一切”、“政权出于枪杆子”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的英武业绩，但共产党在获得政权后不得不依从一种必然的迫力，把背弃农民、压榨农民作为维护政治统治的国策，直到今天，我们还是看到：中国的根本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农民的解放程度。

当我们明了农民的状况，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的无能了。铃江在第三章“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结论中引用共产国际 1927 年 7 月中央第十次扩大会议的发言：“中国一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

都与解放农民、横扫封建残余密切相关，这个中国革命的所有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却无法由资产阶级来解决。”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全部特征都可以归结于这么一个历史事实：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发达起来的帝国主义列强以军事和经济的实力阻碍中国资产阶级在本国（特别有如此巨大的市场和资源）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彻底完成所谓的国民革命，自动地与其反对的封建残余结合，向帝国主义投降这个事实，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达，对于中国产业的发展，进而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都赋予了重大的条件与特殊性。”对比“后发资本主义”德国和日本的历史，都发觉国家强权对产业的辅助政策之不可缺性，反过来说，民族资产阶级从本质上是爱国的，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来推行保护民族利益的产业政策。中国出现的共产主义的政治强权，曾经给一些人带来过幻想，中共制定的国旗中也给予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五分之一的地位，不过，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命运比在外国资本主义（特别在今天，如香港）的压榨下还悲惨，这似乎表明统治阶层更注重政治的安定而不能容视可以异议其统治的资产阶级的成长。今天，北京和台北的两个中国人政府都在竞相加入 GATT，也表明作为一种政治强权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必须扮演的功能。共产主义作为唯一可以在中国大陆达到统一的强权，其胜利是合理的必然，今天，这个合理的历史必然性，又要求中共搬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牌子来维持其对中国的统治。

在第四章“知识分子”中，铃江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逐渐萎缩的地位与作用，可以分为五个时期来说明：（1）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辛亥革命为止的时代；（2）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国民党改组为止的时代；（3）五卅运动（工人阶级独立展开斗争）时代；（4）南京（蒋介石）、武汉（汪精卫）政府对峙时代；（5）现在。“半殖民地知识分子的自觉活动在第（3）时代才开始由年轻人组织起来并实际参与，其整体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急进倾向，在第（4）时代中只有年轻的知识分子的活动还代表着抗拒资产阶级的反动化的小资产阶级的进步立场。”不过，以 1927 年夏天为转机，当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出现在中国社会的舞台上时，小资产阶级的运动也失去了昨日的光华（少数人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之中间了）。一般地，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被不同程度的吸收到政府权力机构当中。从科举以来官场成为他们唯一的进阶之途，直到今天，那些爬得最快的“教授”、“学者”，基本上都不是由于学术研究成果而是尤其丧失人格、

依附政治强权的权谋达成的，所以不可能指望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或革命功用。中国的知识分子连为他们争取自身地位（人权）的资格都没有。铃江所指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学生运动，但中国的学生本身连养活自己的临时性工作都不干，完全没有一丝经济上的独立性，学生运动只是敏感地反映出社会矛盾爆发前的预警，而镇压学生运动的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作为政府机能都是很脆弱的，很难维持其统治的正统性。

铃江对中国的工人阶级寄予极大的期待，第五章“工人”中：“既然帝国主义的基础在于殖民地的榨取，半殖民地中国的解放运动就对帝国主义的命运有决定性的关系，由此而言，中国工人的斗争对于帝国主义的命运有决定性的关系，即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构成了世界革命的最重要的前线阵营。”当然，绝不软弱的中国工人阶级（绝对数值而言有 270 万产业工人，1200 万手工业工人）在其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时就被国民政府背弃了。罗章龙 1928 年在太平洋工人会议机关报上发表文章论到：“所有罢工都被‘维持革命军的后方秩序’的军事上的必要为借口所禁止，北京陷落时工人阶级准备提出自己的要求，但罢工依然被禁止，只是口号变成为‘工人阶级必须为中国的安宁牺牲阶级的利益’，政府对于今天的服从，给予工人们种种将来的约束，蒋介石宣称：‘今天你们服从政府的政策，将来会使你们都乘上自己的小汽车’。”如果不温顺，就有“暂行反革命治罪法”等“法令”将之格杀勿论（请对比今日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如此，中国工人阶级已不可能对改良抱任何幻想，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中国工人阶级受压迫最深、革命最彻底，与农民有天然同盟，自登上政治舞台就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到这里，中国革命的进程和动力都很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铃江此书的研究完成，已经达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中国社会现代政治史的分析的极点，而其先见之明也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所包含的历史必然性，正如我们不该因为蒋介石被赶出中国大陆就否定中国国民党在创建共和、统一国家、组织抗战方面的功绩，我们也没有必要因为中共今日在天安门的屠杀就否定其早期的奋斗。通过此书，我们可以确认共产党人对中国前途的探索，其更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的精神符合中国在现代史所必需面临的选择。对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我们既没

有必要欢欣鼓舞，也不必担惊受怕，在这种合理的现实中透视出新的合理性去创造中国的新实现。这个新的合理性中国人过了四十年才逐渐觉醒过来，我们反而可以证实铃江在六十过年前的透见，以及他所依据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效用。铃江也预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世界资源的不均平）和日本帝国的灭亡，成为真正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少数几位日本学者之一，这对深受国家主义教育毒害甚至成为国家暴力帮凶的至今的日本学术界仍有强烈的教育对比，本可以借此提高日本学术界（社会科学）的整体水平。

今天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有较全面的了解，特别认识到其阶级论在说明社会所有现象方面的局限，也更容易理解铃江此书中的难以逾越的困难。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日本人，铃江自然很敏感地关注帝国主义资本在中国的影响，他自身也交际于国共的领袖之间，自称在武汉时代国民党左派政权里得到“国宾”的待遇（他本人倒从来没有政治上的打算，虽然在抗战中还秘密为胡汉民、津田会谈担任翻译），从实践的感知面上也强烈地受着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影响而容易忽视中国社会长期沉淀下来的除政治斗争之外的社会因素。例如铃江分析二十年代中国官僚的表现入木三分，但也过分夸大了中国官僚在帝国主义列强下崇洋媚外的方面，对于中国官僚在维系动荡中国中的政权基础所从事的事务性的机能就无法考察得全面细致。关于这一点，例如铃江的好友伊藤武维等人利用“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对中国农村等进行的民族学考证，以及稍后的美国费正清等人对中国历史制度的再分析等等，都更显科学系统。从整体上看，铃江在此书中表明：在帝国主义阶段成为列强最后、最大一次殖民争夺地盘的中国，只能靠阶级斗争、靠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彻底解决中国革命的最紧要的民族危机（但不是所有问题），那么，最彻底执行阶级斗争政策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最彻底的民族主义者，这就是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的最充足的说明，从方法论上也是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辩证扬弃。

在民族危机的开头，中国共产党以阶级斗争为主线，掌握了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导权（这在抗战中充分表现出来），那么，在中共建国以后，民族主义的矛盾已经让位于民主主义的问题时，中共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表明中共已经失掉了掌握、解决中国命运的领导力，这就是中共乐于提示的“历史的辩证法”。

[补注：在此文基础上，我扩充对铃江的研究，发表为 The Politics of Suzue Genichi: The Class Conflicts in Chinese Revolution, Sino-Japanese Studies, Vol.9, No.1, 1997.]

[首次发表于东京《民主中国》1993年6月号]

10. 北京掠影⁶⁶—之一

一九九四年六月四日，我在东京的纪念“六四”五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即便在日本（我已经七年没有回过中国），从中美关系（如克林顿对华政策的转变）、中日关系（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台湾局势（我正好读到《朝日周刊》里司马辽太郎与李登辉的对谈）、香港问题等方面，都强烈地提示着如何在经济、法律、文化等关系到普通平民生活的社会各层次争取人权、民主，既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社会而尽量少重蹈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罪恶（甚至引发更深刻的民族灾难）的必须，也是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挑战和机遇。当李鹏政权杀气腾腾，东京政权以国家权力胁迫在日中国人的基本人权时，我们的抗争本身就具有为中国民主进步的爱国主义和为日本文明进步的国际主义意义。这种意义在今天、将来仍然重要并需要我们不断地努力。不过，仅仅局限于此而没有准备更重要的国内生活（并不一定需要强烈的反抗，虽然有时是必要的、想躲也躲不掉的），就放弃了我们应该承担的更大的使命。

个人生活是如此之渺小，对于自己而言，能够在中国秉着知性与人格这两条信念置身于平民阶层（无论是何种职业都行，但不附庸国家权力），也就是自己所能从事的（必要时为之献身的）最大事业了。我原计划在日本完成思想体系之后再回中国去宣教、实践的，但我不久意识到这个体系的确立有一部分可以在中国完成。从去年以来，我开始准备回国，决心在中国没有实现基本人权就不再跨出国境（为此很想能先去美国、台湾自费考察，没想到这两个曾经表示过欢迎我的政府却不肯放行这种没有政治利益的平民性交流）。现实形势超越了主观预料，中日经济交往表面的热潮把我所在日本公司与北京铁路局联系起来，六月二十二日，我随日本同事于晚上七时许抵达北京（我的出生地）。

在海关没有遇到任何麻烦，这虽是预想之中，又有些“求仁不得”的遗憾。去年曾有人传言，如果我不经北京而回家探亲，地方上会“保证我的安全”，我大致可以感到原来在重庆公安局传达的“一经发觉即可逮捕”

⁶⁶1994年两次短暂访京之后，我1995年逃离日本到达美国，1996年后至今没有任何护照，再无法进入中国。

的恐怖已经松弛，他们甚至知道我回国的决定，让我父母转告，欢迎我回去投资！

这里正经历着从官本位的官僚独裁向钱本位的官僚·资本的腐朽专制的制度性变迁，贪得无厌的官僚迅速吞噬掉民众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也争先恐后地葬送这个不能自我革新的国家政权基础。为我所在公司与北京铁路局中介的在日中国商人教我们如何向主管的副局长请客送礼，竟信口说此人靠着与江泽民的“同学”身份将来会做铁道大臣等等。此副局长果然胃口不小，竟要求我们把已经订好的北京饭店改为王府饭店的日本料理！我在付款时才明白王府饭店（六人花八千多元）比北京饭店贵一倍多，突然闪出一个念头：开个玩笑让副局长先生付款试试。看着公司的日本同事们点头哈腰的姿态，我一下子冷却了被这个合作业务激起的热情，回到日本，在报告中劝告公司撤退并声明自己完全没有继承从事这种有违人格的交往的意愿。不用说，把日本的资本家与中国的官僚统治集团连接起来的利益就是如何共同榨取中国普通劳工的剩余价值，过于腐败的北京政权和过于垄断的日本财阀（如三菱、八佰伴等娴熟地在中国运用它们在日本收买议会、行政权力的手法）不久就可能葬送掉正常的、看起来不断发展的中日之间的经济关系。

我本来计划去“国家教育委员会”查询一下90年4月以来被贪污掉的奖学金·生活费，更想追访有无可能索回我们不得不向福建的公安局副局长交付护照的买路钱。如果北京政权真的履行它作为政府的这一点机能，我们很想把它捐给“希望工程”那样的基础教育事业，当然，如果我们自身能够在中国自由地从事教育事业更可以服务于社会。要实现这一点还需要多少的努力呢？我时常感到疲惫，期待某种“不劳而获”的享受（当然，我能安全地置身北京即表明我们实际上正在享受着人类改善自身制度的成果），可以肯定的是：学生·知识分子已经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承担社会改进的主要角色了（早知如此，我们可以扮演得更成功一些的）。我回到离别九年的清华大学校园，在三弟（他正好念完四年级）的宿舍里度过一夜，随手翻阅校党委的学生教育手册，看到除了前几页的江泽民讲话，主要是介绍“股票”等经济常识，回想起这个曾在《邓小平选集》中被大为赞许的校党委，曾经为我们学生建立“个人档案”进行细致思想教育。今天呢？我为三弟买了辆“永久”自行车，他加了两把锁还不放心，

晚上还得搬到宿舍里，否则肯定会不翼而飞的！甚至连上自习时外出走动一会儿也会丢失文具，广告栏里到处贴着各种启事：“哪位好心的同学为本人保管的文具，对您而言并没有多大价值……”面对这样的校园风气，统治阶层大可以安枕无忧了！

校园之外的社会风气就更不必提及了。问题在于：当国家权力只专注于强化暴力机器（天安门广场上无知却略带蛮横的士兵就是明显的象征，连毛泽东也会嘲笑的）、收买知识阶层而官僚统治阶层本身迅速腐化在金钱中时，谁来从事以平民的生活共同去改善民生（就业平等、医疗、福利等）、维护基本道德水准的使命呢？这种召唤，对于我们任何一个人而言，都是太沉重而且又必须去担负的。

[1994年7月16日 静冈县三岛市]

11. 北京掠影一之二

如果说六月底我时隔七年首次返回祖国是出于自己的决心（所在公司明白我的政治立场，原来没有安排我去北京），仅仅两个多月后我再次踏上生我的故地，则是出乎我意愿的仓促决定。大概是因为六月二十二日傍晚我刚到北京不知底细，到旅馆安顿下来随便叫了一辆出租车带同行的铃木（公司取缔役，相当于董事）和氏野（课长）去王府井附近的夜市上痛吃畅饮了一顿，第二天晚上正在与北京铁路局谈判时铃木和我都腹泻不止，被救护车送到协和医院的缘故，使酷爱北京烤鸭和京剧的铃木没能尽愿，回到日本身体恢复之后又制造借口要设宴答谢铁路局，才决定再次访中。铃木这一次充分满足了自己的愿望，但实际上竭力策划这一次没有经济商务意义的访中的是铃木，我刚开始就感到氏野神色有诈，说新世纪饭店（五星级）条件不好，非要安排铃木离开我们两人，单独住进最高级的王府饭店。

深夜三点过，我突然被电话闹醒，隔壁的氏野要我去他的房间。我虽然预想了可能的事态，但推门进去仍然被屋里的情景迷惑住了：穿着内裤的氏野肩头靠着那位奥林匹克饭店前厅端咖啡的小季，床前坐着两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其中，那个能讲日语的小个子声称是小季的亲戚。我马上明白了事由：氏野六月初第一次来北京谈业务时住在此饭店与小季相识，让小季怀上了孕，六月底第二次（我也同行来时）氏野告诉小季说他七月底还会再来，但小季过了七月、八月都不见氏野且又接不到任何来函来电（我曾为氏野翻译过信寄去，又打过电报），怕氏野不再来见，只好自己堕胎了。我立即鄙视起氏野来：你四十来岁独身，在日本怎么做都很自由，第一次来中国出差就这样放肆？日本商人在泰国、菲律宾，在东南亚，在全世界，都难改本性，中国的姑娘们也變得如此低贱吗？氏野自己显然还没有从这三位不速之客的到来中反应过来，纳闷地自问：“我早已检查过没有生育能力的，怎么会怀孕呢？唉，我真混蛋，没想到还能生孩子，却又失掉了！”氏野很激动地表示，他一定会尽责任的，回到东京后马上办理手续安排小季去日本念书（我看她的字迹用句，大概没读完初中），如果小季适应了日本的生活并愿意的话，他们就结婚共同生活。不懂日语的小季似乎很悲哀没有什么表示，小个子为她仗义执言，说小季没有去日本

的思想准备，且不知氏野此次回日本后是否再来北京……，总之，氏野必须理解事态的严重性并有所表示。

听到这里，我突然想到白天乘出租车时听到的收音机播送，讲一个有家室的台湾商人在北京沾花惹草，被女孩子与她的情人敲诈再三，最终只得向公安局报案。不过，氏野是独身，还与小季的父母见了面，从电话中小季母亲热情邀请氏野去作客的态度上看，他们很乐意把她托付给日本人的。氏野被小个子穷诘之下，气急败坏地讲要两个小伙子在门外等几分钟，让他单独与小季交谈（我留在房中做翻译）。氏野诚恳地问小季：我年纪大你一倍，你将来还有前途，真决心与我结婚吗？小季吃力地点了点头。氏野马上提笔按照小个子的要求，表示对小季的信任，先付一万元作为补偿。氏野先拿出两万日元，表示与字据无关让小季接受，又数出身上仅有的五千元人民币交给小季，说明这次出差没有带多少钱，另五千元待回东京后再寄还。我在一旁用日语说可以先由我垫上，氏野很严厉地用眼色止住我，也不再理会小个子的纠缠。打发了三位不速之客后，氏野问我是否见过不懂日语、一直没有发话的瘦高个儿？他就与小季同在饭店前厅弹钢琴！北京的四星级饭店竟然如此！

第二天早上，氏野想起接受过小季母亲去作客的邀请，我打电话去辞谢，没想到是一个小伙子的声音（我听出是小个子），不耐烦地说不是季家，不知道哪个小季。我没有兴致猜想整个事由，但无论如何，在这件交易中氏野并没有什么后遗症（虽然，如果从卖春的行情来看，一万元确实太贵了），但季家呢？是女儿欺骗，或者是父母利用独生女儿？

兴许，这样的例子并不太具代表性，因为当事者双方的主观动机太强，并不表示在中外经济交流背景下发生的普遍情形，但紧接着（九月二十日）在建国门外发生的造成近百人伤亡的枪战，无论个人动机的偶然因素多强，也直接表明社会矛盾的激化。当我们乘车路过时，仍然可见翻倒的车辆和掩盖在泥土下的血迹，这正是五年前北京政权作为的直接归结。任何社会（更何况中国这样的大一统国家）都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当某一领域中发生的大规模、明显的人权侵犯（天安门镇压，中共驻东京权力迫害中国公民等等）没有得到制止，就不可能期待在别的领域（军队、警察、企业等）中实现平等与正义。除了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集团，谁有意愿、有能力破坏安定秩序、甚至引发内战呢？

统治危机只不过是社会危机的突出表露，国家权力强调政府的镇压机能表明正常的分业制度很难维持下去了。例如，包括中国社科院在内的学术研究机构，由于客观条件（待遇低）和思想专制（只能为统治阶层服务），丧失超越出行政权力的独立存在价值，在这个领域占据最大利益的“学者”、“教授”，除了帮助国家权力压榨整个知识阶层的附庸外就是商业广告的推销（这使人想起几年前那些打着“赵紫阳智囊”旗号的人们的恶迹）。很显然，今天的旨在强化统治机能的政策只不过推延社会矛盾的爆发而已，而新起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势力阶层越来越带有买办官僚的特征推波助澜加剧贫富差别。如何从制度上制约国家统治阶层，实现民主主义和国民主权的近代国家原则，迫不可待。

[1994年10月22-23日 静冈县三岛市]

12. 东京“六四天安门事件”六周年纪念集会

一九九五年六月四日晚五点半至九点，由民主中国阵线日本分部主办，在东京丰岛区池袋的丰岛区民中心举行了“六四天安门事件”六周年纪念集会，有上百名中国、日本、美国、斯里兰卡的友人出席。

这次集会改变过去的强调宣传感情效应的方式，没有在公会堂而是选择大会议室举行，也没有行默哀之礼，主要是想更好地平和地回顾、反省、讨论这场至今、将来也会深远影响中国前途（以及人类命运）的历史事件。在演讲之前，先放映了近一个小时的《六四天安门事件纪实》录相，悲情的歌声激荡起我们的心潮，历史的伤口怎能忘却？

不少日本的团体·友人与会发言，池田纯一律师从职业角度，通过“六四事件”以来日本政府在处理张振海、林桂珍、赵南等中国人的政治避难申请，在留资格申请等事件中的表现，对于“日本是否是法治国家？”“日本的司法是否独立于政府？”提出质疑。在某种意义上讲，“六四事件”早已超越中国的国界，成为至今仍发挥影响的国际事件，这几年，我们用自己的生活遭受着日本政府（文部省、法务省、公开或秘密的警察等等）的非人道处置与迫害，才真正地改进着这个国家的愚昧与落后制度。社民党参议院议员的秘书 Lisa 小姐向与会者报告说，最近日本的国会也开始意识到，日本如果仍然不肯尊重外国人的人权将难以在国际上自立（例如近来一直在活动想钻入联合国安保常任理事会），于六月十六日将举行一个“入管（即在外国人中臭名昭著的‘出入国管理局’）调查会”，希望大家去旁听。



大赦国际日本支部的北井大辅先生在发言中遗憾地表示，每年这个日子都没有听到更好的消息可以与大家共享。他自己也由于被分派负责中国问题，几年来都紧张从事这种义务性的专业分工，至今还没有考上律师执照。

“保护斯里兰卡人权”学生会的代表 Rajasooriya 先生在发言中表达了对于中国民主·人权运动的连带。亚洲记者俱乐部的菅原秀先生也强调了亚洲的人权问题与种族纷争、环境破坏等各方面的关连。

继中国民联的周小萌先生发言后，民阵日本分部代表赵南先生联系到中国国内最近正在进行的令人瞩目的“反腐败运动”，指出腐败的实质是制度性的腐败，根结于中国共产党十多年来的只允许经济自由不实行政治民主的错误，我们中国人难道还情愿背负文字狱的耻辱去迎接 21 世纪吗？

Philip J. Cunningham（金培力）与会作了“我所了解的中国”的专题讲演（以下用第一人称简述※）。我在密执安大学学完中国历史后于一九八三年来到上海华东师大学习，后期还参加《太阳帝国》（1987 年）、《末代皇帝》（1986 年）等的摄制工作。虽然我由于与女孩子交往与警察打过交道（他们认为我是精神污染），但我一直对中国抱有美好的愿望，而八九年是最自由的一年。那时，我正好在北师大历史系学习，中国同学们鼓励我说：金培力，你不是老说言论自由很重要吗？跟我们一块儿去游行吧！我就参加了五月四日历史系的游行，也参加了一万人的自行车游行，抗议四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我当时看到警察不做他们应该做的工作（抓学生），保持中立，认为是很大的机会。我那时为 BBC 电台做翻译，住在北京饭店。五月二十六日，柴玲一人来找我，我与她并不熟，是朋友的朋友（式的关系），我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绝食，不值得嘛！现在我明白了那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政治手段，以此占领广场。运动的过程就由反腐败·官倒、要求言论自由发展到市民对学生的支援活动，十六、十七日达到了高潮。但二十日戒严令发布后气氛一下子就变得悲观起来，同学们也非常疲劳，但又不敢离开广场。这时，外地的学生不断赶来支援，我想，政府一定会害怕的，怕发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群众运动。五月二十八日柴玲来到北京饭店我的房间，说她知道自己被列入黑名单的第 3 名，很害怕，希望在有个万一之前要对全世界的华人留下录音。我知道我们在饭店并不安全，就开车转了两个小时，最后在外交公寓的一个空房间里进行了录音。柴玲说过要推翻政府，但那样的环境下讲这话是可以理解的，并不是预谋要这样行动。这个录音我没有交给 BBC 电台，因为我不放心 BBC 的那个中国翻译，而把它交给了 ABC 电台。五月二十九日警察发现了录音关闭了 ABC 电台。我被 BBC 电台训斥了一顿，只好带着摄影师（避开中国

翻译)又去找柴玲录音(六月二日)。

六月三日晚上, BBC 电台的人都说今晚不会有变化要去舞会, 我却从一个朋友(高官的儿子)那里接到消息说今晚镇压, 所以说服 BBC 的人去广场采访。两三点时, 我们回到北京饭店, 从我的房间里可以看到广场发生的事情, 排下了许多镜头。早上七、八点时警察来搜查, 我们把胶卷藏在厕所间, 没被收走。我们知道王府饭店是解放军开的, 肯定不会被搜查, 就带着胶卷逃进王府饭店。六月五日, 形势很紧张, 有传闻要发生内战, 我们决定离开中国。好不容易叫到一辆出租车, 开到飞机场, 却没有机票。我找到全日空的负责人, 说明情况, 他很帮忙, 让机场不要检查我们的行李。这样, 我就到了东京。

Philip 讲完之后, 大家进行了简短的提问与交谈。一个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与会向大家发传单, 还特意请我们共同关注中国工人、劳动人民的人权状况。与历史上所有以知识分子为先导的社会运动一样, 只有中国的劳动民众(工人、农民)为了改善自身的地位被迫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 社会的进步才是不可障碍、不可能被出卖的。民主·人权运动也只有与此结合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

司会人⁶⁷ 赵京

一九九五年六月五日 静冈县三岛市

⁶⁷会场当时没有录音。我翻译时在集会传单背面作有记录, 可惜, 散会时一个日本女子要去了作记录的集会传单。另外, 我当时与 Philip 交换名片时, 他身上没带名片。

13. 中国的民主化前景对东亚政治格局的影响

一九九四年，Westview Press 出版了由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政治学系爱德华·弗里德曼 Edward Friedman 教授主编的《民主化的政治学——概括东亚经验》。这是由 Mark Selden 主编的《转换：亚洲与亚洲化的美国》丛书的第一册，力图从政治学的角度对当前激剧变动的东亚各国的民主化过程综述把握。“简而言之，民主不是文化或经济或其他因素的自动反应；相反，这是一项政治事业、一种人性的可能；这种政治制度可以避免专制弊害，提供人们解决各种问题的条件。”“正如这一卷书所示，民主化逐渐被理解为政治面不是文化或经济的反应”（弗里德曼：结论，p. 257]

本书分别介绍、评述东亚的五个国度、地于域的民主化历程。在第二部“日本”中，中村论了 1945-1952 年美军占领下日本的民主化、和平与经济发展，正如“老牌自由主义者”松本在朝日新闻上所承认的，“如果日本没有经历战败，它不会获得民主，这就是日本当代史的悲剧。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悲剧就在于我们没有赢得自由或民主，我们战败了，不得不接受它”。这是解读战后日本政治史的基本框架：首先战败确实带来了日本政治结构的重大转变，农地改革、财阀解体、工会合法化、解散军队、解除军国主义者的公职等改革为日本宪法(除天皇部分)中所倡导的“主权在民、尊重人权、和平”三原则奠定了基础；其次，由外部军事强力推行的改革很容易受到外部国际关系的影响而发生扭曲，中国内战、朝鲜战争与随之长期化的美苏两大集团军事对峙都直接阻碍了日本政治的进一步民主化：天皇制的存续，⁶⁸国家官僚机构几乎原封不动的保留(如战犯重光葵又登上他战前的外相宝座)、自卫队的恢复及不断膨胀(正

⁶⁸在《国家形态与社会秩序》的“日本政治结构”一章中，笔者比较详尽地论及天皇制的反动、保守作用。简而言之，所有日本政治生活中的反对民众的国家主义强权性格都离不开天皇制的支撑，是否反对天皇制是衡量日本政治势力集团的第一条特征。例如，自民党敢把社会党委员长推上总理宝座就是出于社会党对天皇的认同。真正日本的有识之士(如京都大学堀川哲男教授)都非常惋惜由于美、中(蒋介石)、苏(斯大林)的自私国家利益没有把裕仁推上战犯审判台，错过了日本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政治机遇。

是旧军队与警务系统才构成自民党政治的主流)等等，为日本战后政治的倒退乃至军国主义再兴提供了基础。

本书的中心是由荒濑 Arase “日本的外交政策与亚洲的民主化”与佐藤 “从 ODA⁶⁹看日本外交政策中出现的在亚洲推进人权和民主化的新动向”展开的，日本能否在亚洲采用推动人权、民主化的外交政策成为亚洲的领导呢？前者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都缺乏起码的知识，仅凭过时的、主观的日本政府数据说明日本有能力和决心这样实践；后者对现实接触较深，说明 ODA 以及任何日本外交政策的辞令后面隐藏不住的经济利益。这种“带有绳套的援助”所到之处首先为日本大企业开拓资源、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加重了这些被援助国家的经济依赖，在许多场合甚至直接与专制当局合谋阻碍当地的民主化，⁷⁰只有彻底回避了 ODA 的韩国成功地发展了独立于日本的产业、同时也助长了独立于日本政治的民主化。⁷¹如果说在今天的 ODA 政策中加入了民主化、人权的考虑，也是受到 ODA 负面影响的亚洲民众抗争的努力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修正的结果，而且，在运行时总是被选择在符合更高的日本国家利益时才付诸实际。

编者(弗里德曼)对于日本推行人权外交寄予了很高期望，专门为荒濑与佐藤的文章作注，“中国的独裁者们结果更喜欢与日本拉关系而不愿接近欧美，因为他们把日本视为协调的、儒家权威型的、中国精神的、还在增长的经济动物”。“既然日本政治家要在国际政治中扮演更大的领导角色，既然日本社会进一步民主化，那么，日本变为亚洲的人权领导就

⁶⁹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政府开发援助。日本以此计算其对世界的经济贡献，其数额自 91 年以来超过美国为世界第一。它的实际进行可以由伊斯坦布尔的第二座博斯普鲁斯大桥为例。当世界各家公司(特别是对博斯普鲁斯海峡具有传统利益的英国)正为设计施工投标时，受到大企业指使的日本政府突然宣布增加几百亿日元对土耳其援助，结果这座桥至今被称为“日本桥”了。

⁷⁰那些帮助当地居民告发专制当局或日本大企业的日本人被称为“非国民”。笔者以日本公司雇员身份访问北京时，熊古组(大建筑公司)北京分公司负责人告诉笔者，那些帮助战时的中国俘虏矿工要求熊古组赔偿的日本律师“自己还是日本人吗？”

⁷¹韩国统治阶层虽然独裁却可称爱国，不敢忘记亡国的历史。那些浪费外汇的高档消费品收买了上层社会的民族意识又使得汽车、电视机等产品的维修、换代依赖于日本的产业构造。

是一个自然的结局”。这是不准确的片面论断。编者批判经济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道：法国大革命死了那么多人，当时谁能说法国的经济或文化适合于民主自由呢？那么，为什么人们比较易于接受经济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呢？无非就是因为政治现象是最直接关涉到人类生活状况的现实，对于它的认识很难客观、公正、全面地研究，⁷²经济决定论倾向于用较易把握的数值来说明复杂的政治过程带来的简单结果，文化决定论则倾向于说明变化多端的政治过程导致的各种可能性，它们对政治分析而言，常常等于什么也没有讲。这提示我们对于政治研究，应该付出更多的调查和实践才有可能更有发言权、下结论，而本书对于日本政治的内在结构及外交政策取向的影响都没能深入分析，就做出上迷片面、甚至错误的结论。担当亚洲的人权领导，对于日本来说并不是坏事，长期地讲也最终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但是，与任何政治行为一样，在获至最终目标之前，必须有一段艰难的路程，在短期、局部过程中常有不符合日本或其某些统治集团的利益，日本能否克服阻碍达成有潜力达到的政治目标，正是政治学分析的任务和特长。本书没有提供政治分析本身，实际上笔者特别自“六四”事件以来的一系列实践和思考最终导致的结论却是：日本不仅不可能成为亚洲的人权领导，日本国内的民主化和人权的进一步发展，说到底，还得依靠亚洲民众的人权意识高涨、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⁷³

韩国(本书第三部)、香港(第四部)和台湾(第五部)的民主化过程所显现的特性都是由其特定的国际地位所决定的，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所影响，特别对于台湾而言，更具现实的和平意义。上周笔者参加了由威大麦迪逊分校台湾学生联盟主办的“林双不谈台湾”讲演会，当录像中放映到林先生由于坚持台湾乡土(地方)文学遭到当局压制时很令笔者同情，但林先生却不恰当地把国民党的统治概括为中国

⁷²换一种更直接的表述，几乎所有的占据主流统治地位的“学者”都是国家政府的雇员，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他们注定不可能对政治现实进行科学的把握。在日本或中国不存在政治科学，很大程度是因为官制的御用“学者”、“智囊”们的欺骗功效。

⁷³实际上比较先行民主化的韩国、台湾已经开始对日本国内的政治进步显示出积极的影响，尽管日本的民主化程度高于东亚别的国度、地域。国内的民主化并不完全等同于外交方面的人权政策。

人对台湾人的“种族压迫”，使笔者惊讶不已。笔者在一片哄笑中小心提请林先生注意文学创作的主观激情与政治活动的客观现实之分，林先生彬彬有礼地声称“希望贵国人民推翻独裁政权……”等等。

如果台湾独立运动都如此缺乏起码的政治理智，也难怪北京政府的军事选择更缺乏人性。两岸的民众都不赞同战争，因为无论是“胜利”或毁灭，牺牲的都是普通民众。进一步推广地讲，只有两岸民众以及整个东亚地区的所有民众都互相扶助、提高了民主与人权意识后，真正的国家种族地域间的和平才会实现。如果说东亚的民主化有什么不异于西方的民主演化的共同处，那就是人类追求更自由、更幸福生活方式的人性，通过各种斗争(韩国的激进学生运动、台湾的顺从惯了的农民上街抗争吓倒了官僚阶层，以及八九中国爱国民主运动对世界的震撼等等)改善了社会组织方式和政治制度。可惜此书的最后关于中国的部分没有篇幅论及中国民主化的牺牲和贡献，有些文句读起来完全偏离了政治科学的分析立场，如“(革命起义的罗马尼亚式)这样自上而下的转变也可以发生在 1989 年的中国，如果军队站在人民一边的话”(苏绍智，p. 226)。编者最后引用许家屯 1993 年逃来美国后的回忆录，⁷⁴说明赵紫阳讲过要允许独立的学生或工人组织存在并让他们参与选举，似乎新的统治者也有可能如此实行民主。其实，中国的学生(以及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不可能具有政治、经济的独立性，让它独也立不起来，更何况赵紫阳在讲此话时并没有站在中共中央全会或全国人大的讲台上，而是身不由己时的孤注一掷以保清名，并不太具政治意义。

弗里德曼教授的民主主义理想在此书中没有令人信服的展示出来。实际上，由于“六四”事件的悲剧，直接地影响了日本政局更加保守、反动、倒退，影响了台湾的民主化朝着独立运动的危险方向展开，它们反过来推动中国军备的扩张，再反过来推动日本的军国主义化(甚至核武装)、台湾的独立意识……，很可能出现一幅恶性循环的前景，整个东亚政治格局的变动，说到底，决不是日本的民主化、人权领导地位问题，完全是中国大陆民主化所决定。

⁷⁴作为政治人物，出版回忆录本身就意味着许家屯已经没有信心再返回中国政坛争夺正统了。由任何退任(特别是被赶下台的)政治人物口中流露的民主心声正是现实不民主的表现。

有鉴于中国大陆民主化的重大意义，佛里德曼教授紧接着于一九九五年又推出了他的力作《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认同与民主化前景》，⁷⁵“除了识别出那些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带向民主政治道路的力量与原理外，此书力图对于目前正在分析家中展开的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特别是关于知何形成民主主义的国家认同的讨论，提供新的贡献”（前言）。“本研究基于这样的事实，即所有的社会都能成功地于实行政治民主化”，“与普遍流行的把东方与西方截然分为不同世界的看法相反，本研究致力于表明：对于所有社会至关重要是各种对抗的国家认同以广泛的政治联盟事业参与其中的民主化政治（前言）”。在列举了基督教民主传统国度里美国的南北战争、德国的魏玛共和国挫折之后，“更重要的是不论专制政体延续多久，所有的人类社会如何通过斗争达成民主主义的人类尊严，以及所有的人民都能够在统一的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中建设运营他们的国家共同体并能够挑战国家里的反民主倾向。这对中国当然也适用”（前言）。

在以国民国家为单位展开的动荡的近代史上，中国最终找到以社会主义来指导全民族的反帝国家认同，⁷⁶并确立了毛泽东的独裁和中共的专政地位。独裁的统治方式更适应于战争年代的胜利要求，和平则为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⁷⁷但这个从独裁向民主制度的转换却不是一个自然过程或经济发展的必然，而需要人为的奋斗。专制权威主义与儒家式的列宁模式⁷⁸可以被理解为中共上层统治集团在新形势下摸索的尝试，他们用尽了各种方法企图避开政治的民主化来维系既定的政治秩序，经济改革就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政治含义了。佛里德曼在第十章“中国是欧革成功的模式吗”中指出；毛泽东去世之后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是否说明

⁷⁵359页，M. E. Sharp 公司出版。

⁷⁶铃江在一九三〇年出版的《中国革命的阶级斗争》中，用马克思—考茨基的阶级分析观点，已经准确地预见到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可能。参见笔者“现实的历史中包含着合理的必然”【民主中国】1993年6月号。

⁷⁷这个分类最早由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中阐述，也可以从最简单的功能-结构对应中找到。

⁷⁸笔者自身对于这样的术语使用不熟悉，多少抱有抵触感，认为它本身就带有某些重大的前提，其定义本身是需要讨论的。至少，列宁当政期间的政策很难归纳为固定的模式，斯大林和毛泽东当政期则以显出更多的固定特征。

北京的改革派已经发展出一套值得别国效仿的战略能够带动经济的持续增长与社会的安定呢？一般人似乎认为俄罗斯在推动经济改革之前就推动民主化是不明智的，因为民主化产生出延缓、阻碍改革的迎合大众的利益，而中国的作法优点在于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可以推行民主化国家办不到的、必需的改革。上述经验认为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应该先行于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一个参与世界银行援助俄罗斯项目的美国经济学者指出，皮诺切特政权下的智利和中国南方经济迅速发展的广东省就是这样的方式，在没有外国援助的情况下成功地于转换到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国南方很难能对俄罗斯提供参考，俄罗斯不再是一个能够推行严格控制的逐步展开的经济改革的自治国家，实际上在一个新生的民主国家里，总理大臣最头疼的是企业的压力游说可以阻碍国营企业的合理化、扰乱金融政策”（Prowse, 1992）。

美国财务长官 Lloyd Bentsen 访问中国和俄罗斯后也指出两者的对比：“俄罗斯在市场经济没有确立之前试图建立民主政治体制，中国的试验则是在不实行民主政治改革的条件下发展繁荣的自由市场经济”（Bentsen, 1994, p. 6）。一位印度的上层企业家也指出：“李光耀正确而戈尔巴乔夫错了，在政治开放之前必须首先实行经济重建”（Dalmia, 1994, p. 25）。美国银行家 William Overholt 同样在《中国的掘起：经济改革如何产生出新的超级大国》（New York, Norton, 1993）中以“把经济改革的骏马置于政治多元化的猫群之前”来赞扬中国的智慧（Manning, 1994, p. 10）。

确实，一个独裁政体明显地可以带来财富，但事实上却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专制政体能比民主政体更能发展经济（Hwlliwel, 1993）。实际上，讨论一个独裁政体也需要创造财富，正如 Stephen Haggard 已经对东亚所作的分析中所示，是非常无聊的。那些想反对东亚在民主体制下更能发展的明显事实的分析家们只要简单地于设想一下如果战后的日本没有民主的情形即可以了。战后日本的农地改革与工会合法化⁷⁹创造了日本

⁷⁹当然，农地改革并不彻底，山林没有被重新分配，据说是因为植树需要七、八十年时间且需大面积种植。笔者曾在和歌山的一家庄园主中做客，他家还得雇人管理庞大的山林（伐木等都由机器操作），维持了旧有的方式。另外，工会的合法化使“体制内”的社会党（以及后来分裂出去的民社党）得益，“体制外”的共产党

的民主主义政治家们可以依靠的农民与工人群体，也创造了能够维持日本式大量高水准消费产业发展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民众。没有民主，日本的经济奇蹟只是幻想(p. 188-189)。

弗里德曼通过中苏改革的对比，很有启发性地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并不是中共上层比苏共上层高明一筹，而是因为中国的现实条件比苏联更迫切需要改革，因而减少了改革的阻力。例如中国的重工业(除了东北的传统重工业基地外)被毛泽东移到三线使得广东等沿海容易转换产业结构，苏联的产业构造经过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完全从属于重工业导向不适应改革，等等。其实，更深刻的原因是政治制度性的，最先发动的改革在中国的最贫穷的农村，在那里通过改革农民失去的只是奴役、获得的不仅是对生产资料(土地)或产品的部分支配，更是人身的进一步解放。在苏联，“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将使集体农庄的农业工人们失去基本的社会保障，所以他们不愿改动现状。面对上述这些现状，中国的政治环境又处于一个绝无仅有的机遇：整个中共统治阶层在好不容易清扫了荒唐的江青集团后，都承认是毛泽东独裁的受害者，这种经历使得他们程度不同地理解、听取人民的呼声，那些阻碍人民追求稍微富裕一点生活的基本愿望(即所谓“四个现代化”)的政治结构，由于“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性灾难的现实被拆除了。从深远意义上看，中国的改革也是由民众推动的，邓小平集团只是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才占据了中共的统治地位，也使中共对中国的统治延续十多年的正统合法性(没有受到严重的挑战)。在这种意义上看，毛泽东去世之后的中国的经济改革的部分成功是特殊的、偶然的，它的失败却是结构性、制度性的，任何新的统治集团必须找到适应新的时代的政治统治方式，这就是：以民主主义来重新树立国家认同，也只有民主主义才能保护经济发展的成果，减少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那种残忍与压榨。

即便从外部交往方面，中国的经济改革也要求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否则，陈希同-王宝森集团控制的不再只是北京而将是整个中国。一般地讲，比较起华人资本家来，日本商人更能遵守起码的商业规范，但任何商业的动机都是在不完善的制度的可能限度内追求利润，所以必须利用政治法

没能在企业中发展势力。

律的手段来规制经济的发展。现在，所有的日本大公司都涉入中国市场了，如果它们利用在日本国内或其他东南亚国家熟练的收买手法在中国畅行无阻，它们最终必然会力图象控制日本国会那样操纵中国的政治，这也是中国的民主化面临更大困难的原因。⁸⁰

从道理上讲，中国的民主化必将带动日本政治的民主进步并最终达成真正完整独立的国家主权，⁸¹中国的民主化必将推动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朝鲜的核武装会成为日本军备乃至核武装的借口），中国的民主化必将彻底消除台湾海峡、西藏地区、香港地区等的极端不稳定因素，从而引导东亚以及整个亚洲和平、繁荣地进入二十一世纪。从现实上看，正如日本政府及其统治阶层不可能发善心或聪明地担当起亚洲的人权领导作用一样，要让东亚各国各地域的统治集团们明智地顺应民众的民主化、人权要求实现内政、外交上的转换是不现实的，正如任何国内的民主化进度（如前些时候韩国逮捕了卢泰愚、全斗焕两位前总统）都是国民牺牲奋斗的结果一样，任何国际关系中的人权尊重都是各国民众死难伤亡的代价，捍卫民主化成果、保护人权尊重的现实不被政府权力拉向倒退而是迫使各国政权改善嚮前，正是我们每一个普通公民的义务与职责。如果要举出具体的行动，正如佛里德曼等作者指出而日本政府竭力逃避的那样，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觉醒中首先遇到的东亚关系的人权原则是中国民众必将

⁸⁰ 中国人在日本从事民主化与人权活动遭到迫害压制的原因不仅仅是日本的知识阶层、大学当局的卑鄙，更主要是日本统治集团出于国家经济利益的考虑，决定把没有多大政治能量的中国民运活动家作为人质向中共政权争取外交筹码（如不反对其进入联合国安全常任理事会）。我们的人权活动被日本政府判定为“破坏了中日友好关系”（上引佐藤文，p. 104），笔者因为履行一个中国公民的义务即被大阪大学校方与中共政府机构商议逐出大学及日本的公共机构（参见香港支联会主编【中国的良心】1993年出版）。

⁸¹ 日本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独立主权国家，所以我们很难要求它能够自主地给予不发达国家地区的公民的人权（这一点不在此文论内）。不过，最近的事例很能说明日本的这种缺乏主权尊严的国家特征：日本政府今年突然以“中国不听日本政府多次劝告、仍然强行核武器实验”为名取消了九五年的无偿贷款（七十多亿日元）的绝大部分，极端的军国主义论客还要求停止数千亿日元的有偿援助甚至“断绝外交关系”，与日本在天安门事件后的反应大不相同。但这丝毫不表明日本的外交独立性，因为日本本身是在世界上最强大的核保护伞下的。当美国占领军强奸它十二岁的幼女时，这个政府的行为是帮助美国政府压制衝绳的民众。

抛开所谓“日华友好条约”（1952年）或“中日友好条约”（1972年）中各政府强加于民众的“放弃战争赔款”等践踏人权的耻辱条文，与朝鲜双边、台湾、香港等地域民众共同最终妥善处理日本的战争犯罪历史、共同开拓东亚各民族的真正长久的和平。

只有这样的和平前景才值得我们去奋斗、追求。

[首次发表于美国《留学生》1996年 Vol. 7, NO. 2]

14. 在中国的民族主义中树立民主主义的认同

比起7年前在巴黎召开的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5月17日至20日民阵第四次代表大会和民联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及随后的“台湾大选后两岸关系与大陆民运研讨会”在这个只有20万人口的俄亥俄州列克星敦市召开，本身就表示海外民主运动的低沉现状。民联在93年的“华盛顿合并大会”的分裂之后，被迫把总部也从纽约搬到主席吴方城的住址，也只有经营着3家快餐店的吴老板能尽地主之谊。民阵的状况更是今不如昔。在大会上，万润南主席宣布所有资助自94年墨尔本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完全中断，民阵不得不独自经营约一百万美元的“欧亚美澳基金”。这次会议也由此基金支付一部分。民阵新一届的选举结果，万润南退任，由另一位居住加拿大的老板杜智富出任主席，也意味着民阵政治功能的进一步萎缩。

民阵总部的工作报告包括“总部，经济自立及国内布局”，“文宣工作，欧洲地区民运”，“外交人权工作，美洲地区民运”，“监事会工作，人权委员会工作”，“组织工作，亚太地区民运”以及“六四调查委员会工作”一系列专题，但没有给与会者留下多少记忆，只有马大维先生事先准备的材料可供事后阅读。不过，马大维先生作为副主席（以及下一届的监事会主席）的个人贡献，恰好说明了民阵一个政治组织的资源贫乏。以马先生的“前联邦政府官员”的背景，本该去竞选议员，以美国公民的身份支持中国民主运动。在马先生“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怎样的中国？”等诸多评述中，笔者感受到马先生的“我们”，并不是相对于北京当局的“我们中国人民众”，更像是相对于中国的“我们美国，我们世界”。

实际上从民阵成立的那一天起，关于海外民主运动的性质定位就没有得到过严肃、认真的讨论，甚至由于民阵领导人的错误导向，严重的影响、降低了民主运动的形象。如果说巴黎大会“成立宣言”的内容是几个刚从国内恐怖环境下逃出来的文人以天安门广场激情（加上个人意愿）压倒政治分析的结果，那么，事隔7年之后，民联民阵的共同宣言中仍然把拥戴“中产阶级”（如果存在并可以明确定义的话）、“发展私营经济”作为主要诉求，就难以用“文人议政”的水平问题来解释，而是偏离民众

生活的政治立场的局限了。齐墨起草的这份宣言据说是反映了万润南的意向，万润南明显地过分强调了以邓力群为代表的左派保守势力的弊害。齐墨在说明宣言时竟然摆出对阵的姿态要与邓力群“打好不满现状的工人这张牌”！听到这里，笔者不由得不顾自己的“列席”身份要求发言，也打消了再参与民阵或民联的组织活动的念头，甚至庆幸海外的民运组织没有足够的力量被用于与中共政权“打牌”。当然，今天的中国民众也不会轻易地被任何政治势力掌握、玩弄。

7年以来，以天安门事件触发的海外民主运动已经耗尽了政治资源，也转化为多层面的社会进化活动了。各种半政治性的、非政治性的团体在舆民运组织的竞争中产生并活跃起来，以各种形式表达了民运的部分要求，并以“非政治”的形式部分地得以实现。如果我们要继续海外民运，唯一的途径也只有保持和发扬政治“前卫军”的功能。落实到具体运作上看，正好借“所有外部资助都断绝”的时机，首先彻底清理与各国政府当局的关系。当海外民运盲目自大地幻想与中共争夺政权时，其团体负责人就必然会力图利用外国政府的政治资源，结果只是被外国政府利用并导致内部的分裂。

今后，以“前卫”定位的海外民运，由于其追求的政治目的非常有限，其可以采取的策略也非常明确、规范。我们没有任何一件需求助于任何国家权力的，我们必须捍卫任何国家权力企图但不能剥夺的权利，我们必须反对任何国家权力迫害、压制人权的行爲。以此，我们就立于最没有权势的、最广大的中国民众之中，成为中国平民的一员，为我们自身、而不是为“他们”的前景而奋斗。

从小的方面看，即便是民运组织的代表大会，也没有必要请求各国政府“恩赐”批准签证放行。扩大一点看，在普通的中国民众没有权利踏入台湾，一旦进入即被投入牢狱(包括货真价实但没有足够“名声”的民运人士尹进)的现实下，任何以“民运人士”名分或其他任何人道之外的理由访台的行为，都必然带有出卖同胞的性质，必然会被正在兴起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所碾倒。台湾当局敌视中国大陆民众的性质不在此论范围，但其甄别大陆“精英”入境的手法却把“精英们”可怜的最后人格面孔也撕掉了。这也是为什么一部分海外的大陆中国人与西方政客一样，恐惧大陆民族主义的原因。

在中国的民族主义中树立民主主义的认同，正是包括海外民运组织在内的一切中国进步政治力量的责任和使命。

[首次发表于东京《华人时报》1996年6月15日]

15. 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与台湾前景

一九八九年九月，中国国民党代表李胜峰先生与台湾民主进步党代表康宁祥先生从台湾赶到巴黎，庆贺民主中国阵线的成立。笔者当时虽然感到唐突不安，预感到那些“民运精英们”把握不准大方向，但同时也抱有些许期待，以为台湾的两大政治势力能够理解与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不过，国际政治的现实很快呈现出来：以流亡色彩为主导的民主运动在残余的道德感召力式微之后不可能继续保有政治资源的现实驱使那些具有政治志向的民运人士不可避免地与各种相关的组织进行交易⁸²。这样的恶性循环很快把仅有的政治资源耗尽。在这个过程中，实在没有必要指责或关注那些以“民主运动”为职业的活动分子。相反，握有实标政治资源并声称理解支持中国大陆民主、人权运动的各政府当局应有相对真实的政治价值：是真心诚意、一视同仁、平等待吾地帮助呢？还是拉拢、利用、控制、甚至与北京政权合谋迫害呢？几年来的实践表明：台湾当局采取的拉拢精英控制海外民主运动的短视策略，间接地加速了中国民主运动在海外的衰退⁸³。丧失了人格、道义的民主运动，就不存在任何价值。

当时笔者倾注了很多心血的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宣言，在今天看来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因为包括宣言起草者在内的与会者们很少真正地实践它。笔者因为徒劳地撰写过一份代替校，印象深刻一些，清楚地记忆并至今从同关于台湾与西藏前景的认识，坚持这些问题的真正解决必须以中国的民主化为前提。

⁸²那些徒劳地维持民主运动独立性的努力很快成为北京、东京、或台北、华盛顿政权的迫害目标(如大陆内的“民阵支部”，笔者力图在日本展开的“知性与人格改进运动”)，失掉政治性的影响，而更具兼神性的宗教意义。

⁸³以台湾当局“恩赐”大陆公民(在“中华民国”的法统之下，大陆民众仍是其统治子民)入境台湾的方法，可以看出任何政权对于政治资源的丧失人性的利用。前几年(笔者不知道今天的情况)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公民入境时必须签署一份有辱人格的声明，笔者因为拒绝照办由此失掉进入台湾的资格。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有幸访问台湾的大陆人士都撰文歌颂“台湾经验”的原因之一。而那些没有得到台湾“恩赐”而“非法”进入台湾的大陆民众则被抓进牢狱(据说北京当局不愿接回他们)。总之，台湾当局与许多台湾人一方面谴责北京当局，一方面依靠、帮助北京当局共同对付大陆的民众。

很可惜，这没有成为共识。当台湾方面颁布《国统纲领》时，笔者认真地体会了一番，不仅失望甚至感到台湾当局对统一的诚意和热情都很缺乏⁸⁴，证实了失掉“直选总统”的郝柏村先生所言：他第一个、最早发现李登辉是个台独份子。撇开“中华民国”的法统、历史不提，从政治理论的本质上来考究，只要物质条件许可，任何地域、组织都应该实行直接普选来决定最高行政首脑——无论其名义如何。以卢梭的嗜好，台湾这样的规模正是理想的共和国的条件。从原则上讲，台湾的民众有权利要求自治、自决乃至独立⁸⁵，甚至在分离独立明显不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也应该尊重这种权利（正如人有权利选择“安乐死”乃至自杀一样）。但是，基于当今的政治现实，正如选举期间台湾西部海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东部海洋美国第七舰队、日本舰艇的军事对峙所显示的那样，很可能会带来远远超出独立带给台湾民众的小利的灾难：由台湾引发的战火波及日本、太平洋及整个世界。或者，退一步看，即使没有爆发实际的战争（这或许是北京政府没有能力，或许是中国大陆民众的善良愿望），缺乏自卫能力的台湾必然与美国、日本结盟对抗中国大陆，不仅从国际上封塞住中国往东南海洋的发展前景，而且在大陆国内也必然会助长专制政治的强阻碍甚至消除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前景。

当台湾的民众遭受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时，由台湾本土的“政治精英们”所喊出的自决、独立呼声具有进步、人性的价值。笔者刚到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不久，就踊跃地参加“台湾乡土作家”林先生的讲演。当笔者看到林先生因为用闽南话写作、教学而遭受当局迫害的录像时，不

⁸⁴参见笔者“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读《国家统一纲领》有感”，刊于《民主中国》1992年9月。当“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昆辉先生来东京讲演时，一位台湾贵妇当场言及“大陆民众脏、穷、教育水准低，不配统一”等等，正好对应了《国统纲领》中以“均富”经济指标差距阻碍政治统一的意图。当一位“中华民国”同学会的留学生激昂地宣言如果李登辉搞台独他就退出国民党时，黄先生答道：“李总统会这么傻吗？放着全中国的总统不当去当一省的总统”。问题在于李先生是不是、能不能当“全中国的总统”。在此文中笔者也论述了“直选总统”的原则。

⁸⁵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们多具超越国境的国际主义信念。如李大钊支持外蒙古的独立——因为独立后的外蒙古可以首先脱离帝国主义、封建专制而进入社会主义；而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更明确宣布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的自决权。

禁为之同情流泪。但录像之后林先生露面，宣扬说国民党当局的迫害是由于“中国民族”对于“台湾民族”的压迫，笔者内心惊骇不已，强作平静地提问交流。林先生勉强用“贵国话”（汉语）作答，希望在“贵国人民推翻了独裁统治后“再（从其语气上看，是指才有资格）与台湾人民和平共处。

前几天笔者看到署名“台湾同学会主办、中华民国同学会协讚”的宣传广告，呼吁大家参加三月十八日的游行抗议军事演习、支持台湾民主。笔者按时到场，本想准备“人类之间不要武力相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之类的字牌，却听到主持者用喇叭宣布：“不许用别的标语”、“不许呼别的口号”的指令⁸⁶，再看那些准备好的充满台湾“民族主义”的标语和录像者，立即明白了此次游行的政治意图是帮助台湾内的独立诉求“总统”候选人。从其传单上，不仅可以感受到台湾独立分离主义者对于北京当局军事演习的愚举的升级漫骂（对于他们来讲，正是宣扬台独的求之不得的良机），更可以意识到台独分子对于中国大陆民众的种族歧视：

“大军压境，新生的台湾民主正面临一个存亡绝续的历史时刻。/新生的台湾民主，仿佛风中之烛，瞬息将灭。/制裁中国战争暴行，协助台湾度过这道民主化的险峻关卡。/纯以血缘神话与历史虚构为基础的中國民族主义由于完全缺乏对个体自由与多元价值的尊重，不但对内已沦为压迫愚民的种族主义，对外更堕落为扩张侵略的帝国主义。中国当局动輒以民族情绪煽惑民众轻启战端，已使台海两岸与周边邻国的人民同受其害。我们呼吁中国人民扬弃这种偏狭傲慢的民族主义本着人类普遍的良知和道德勇气，和台湾人民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携手奋斗，反对中国当局破坏世界和平、侵犯基本人权的恶行。中国人民现在必须以具体行动回报国际社会的长期支持，并向国际社会证明他们追求民主自由的决心与诚意”。可以想象，独立后的台湾当局将会变本加利、更残忍地对待中国大陆民众。

与任何政治活动一样，当台独已经呈现出可以问鼎“国家权力”的趋

⁸⁶这倒不是针对笔者的，而是针对持有“中华民国”国旗的参加者，因为他们根本不欢迎也不愿意与大陆同学、学者对话，他们的对象是纯粹不理解历史的美国民众。受到“欺世盗名”耻辱的“中华民国同学会”只好另设桌台以示不同立场。

势时，它已经丧失了当初反抗压迫的进步内涵，变质为为了统治权欲（“全中国总统”完全没有可能，“台湾总统”当然比“台湾省长”威势得多）不惜利用外国军事力量，动员台湾民众与中国大陆的政府、民众的军事对抗。他们在要求大陆民众的“人类普遍的良知和道德勇气”的同时，却只字不提未来的“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无愧于自由的”“独立主权台湾国”对于大陆民众应偿还的起码债务：蒋介石政权从大陆掠夺去的中国历史遗产与经济财富⁸⁷。

如果我们比较台独活动在美国与日本或别的西方国度的情形，就会明白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重要力量。三月十九日的《朝日新闻》上刊登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 S. S. Harrison 的评述可以算是较为明智、中立的。他指出美国违背了“上海公报”中“逐年减少售台军额(数量上与质量上)并最终停止军备售台”等原则，建议美国明确保证在一定期限(如十年内)停止军备售台。在此冷却期间，台湾宣布放弃任何独立企图、北京政府宣布放弃武力“解放”计划，双方无条件地在发展经济、文化事业的同时进行政治对话(北京不坚持“一国两制”，台北也不坚持“对等政治实体”)。

这样的设想其实就是当初中美建交时的两国政府的共识，所以邓小平先生很有信心地把“统一台湾”列为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事态未能如此展开，当然是因为国际政治的剧变，美国调整了对华政策，而调整对北京、台北关系的重要依据又是中国大陆与台湾岛内的政治变化，特别是中国大陆的特殊制度弊端。最明显的当然是一九八九年对民主运动的镇压，不仅直接引发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制裁，更长久地影响国际社会对台湾的重新认同，助长了台湾独立倾向。所以我们说：北京政府的专制体制与台湾的分离独立主义，异曲同工，都是中国(包括台湾)的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障碍与威胁。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以来的不可割裂的主线(犹如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为了自身集团利益片面强调民族主义(北京)或片面强调民主主义(台湾)，都将引发远远超出对立利益集团之外的毁灭性灾难。

⁸⁷一位台湾同学竟说：由于历史原因，那些财富已经成为台湾的了。一般地，我们完全尊重台湾民众不愿忍受中共统治、害怕与大陆生活水准拉平的意愿。实际上，大陆政治、经济特别是地域差的剧变已经消除了很多顾虑。

既然统治阶层集团在妄图借台湾问题引发世界性(或至少亚太区域性)的冲突,那么,能否依靠民众的力量阻止台湾海峡的军事对抗以引导亚太区域内的和平呢?这样的理念看起来是梦想,实际上却并不复杂:台湾的完全中立非武装与不可侵犯性、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废弃、美国军队撤出东南亚的非核宣言...,让太平洋真正达成永久的太平。在这样的前景里,除了(人类公敌)“总统”、“大臣”、“主席”失去借以压迫内外民众的“国家权力”外,受益的是几乎整个人类。为了达到这个前景,对于民众而言,首要、基本的权利与义务就是制止而不是参与本身地域统治集团发动的“对外”冲突,在这个斗争中,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将对台湾安全、日本民众反对其卖国政权驻留外国军队(正如最近冲绳民众的怒火)以达成真正的独立主权、美国民众反对其政府出兵东亚、朝鲜北部反对独裁统治、朝鲜南部摆脱美国占领,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首次发表于【留学生】1996, Vol. 7, No. 3, December 1996, Madison)

16. 社会改进党人对中国民主化前景的展望

迄今为止的一段时期里，社会改进党人、或日无政府主义/安那祺主义者，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以及广泛的中国民主运动运作，保持着相当的沉默。

我们无意独立于中国民主运动，我们一如既往地承担起中国民主化的前卫牺牲，我们甚至不愿付出必须的代价阻止进一步的背叛与出卖。展望中国民主化前景，我们不得不告示我们的历程与方向：纯粹地执着于由八九年民主运动中彻底表露出来的人格感召精神，任由任何政治势力集团利用其外延影响。这也是社会改进党人与别的民主运动同路人的唯一区分。

当今中国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进运动，无非是重复先行者们在人类历史上所付出的牺牲：启动俄国革命、唤起中国革命、推动欧州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对新形成的美洲大陆国家注入彻底自由传统。所有的上述政治实践结果都背叛、辜负了作为政治“威胁”的社会改进党人。我们今天面临着同样的宿命。社会改进党人自觉扮演这种违反政治常识的功能，唯一的动力是拯救人类社会的信念。这种信念与基督类似，只是没有自身获救的可能。

八九中国民运在海外延续，再现与应证了这个过程。“六四”镇压之后，推动中国民主化的组织性活动只能公开存在于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度，所谓海外民主运动成为暂时的关注对象。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民主运动主体的转移，中国民主运动永远只能在中国大陆本土上展开，海外的民主运动只具备声援、资助大陆内活动的功能。当然，海外的民主运动也具有独立的斗争意义，因为八九中国之春所显示的世界历史价值决不仅限于反抗北京当局的斗争，它必然地同时反抗一切现存的国家强权对人性的摧残。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前，香港的民主运动实际上形成了海外民主运动的生力军，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香港市民的参与，就不存在所谓海外民主运动而只有“海外政治运动”。以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为代表的香港各界民众的活动最直接地反映了海外民主运动的两个特征：一、短期地、暂时地、仅其有象征政治意义的特征；二、最终地展现出

来的代表中国本土民主运动的社会改进特征。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后，随着香港的民主运动从“海外支援”变为中国民主运动本体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所谓海外民主运动的前一个特征即告终结。“海外民主运动”也不复存在(各种有意义的政治活动仍然保持下去)。

自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七年为止的海外民主运动(当然，在八九年以前早已存在公开的反体制活动)的历史价值，就是一个象征性政治特征消失、本质性社会特征呈现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政治制度不均衡的各西方国家里表露程度不同，社会改进党人在日本推动中国民主化所遭受的社会迫害以及我们被迫把改进日本的社会制度作自身命运，最早且明确地显示出中国的民主运动必然地会面临每一个政府强权的欺骗、出卖、背叛与镇压。这同时意味着具有世界价值的中国民主运动，必须与世界上所有正义进步事业一同努力改进人类自身的社会结构。

社会改进党人在“六四”事件这样的突发性政治事件中鲜明地表示，作为任何政治运动的先锋前驱的命运与天性，天生的“历史遗忘症”(不愿汲取每一次历史时间中被出卖的教训)，使得我们全心全身投入单纯的政治斗争(如反对戒严令与开枪镇压)而不可能顾虑各种短暂同路人的图谋。每当历史性的变动告一段落，容得我们反者时，我们都忏悔自身的(根源于善良天性的)政治判断为运动本身带来的危害：没想到北京政权除了强暴还具奸诈(其在东京的代理当然不会直接利用暴力)，没想到东京政权除了伪善尚具卑劣，没想到同为中国人同类的内奸在国家强权的文易中会彻底丧失基本人性...。但是，如果社会改进党人变得聪明起来，谁来发动变革并承担政治牺牲?没有中国青年的天良，就不会有八九中国民主运动以及任何变革的动力。

在象征性政治特征几乎消失的海外民主运动中，除了社会改进党人(并不是简单的成员区分而是人格特征)在抗争北京政权同时反对东京、台北、华盛顿等国家强权的社会迫害，其余的打着民主运动旗号的同路人都程度不同于依附于一个或多个政府权力。虽然这些佔据优势的民主运动“主流”派别之间为了各自的“原则”、“理念”水火不相容，但他们同为台北当局的坐上客，被其玩弄于掌上。他们彼此之间的不和掩盖不了背后的附庸于强权的同一性，在其后的强权指使下，他们的活动加速着海外民主运动的终结。

在作为运动的海外民主连动最终结束之前，资源的枯竭会加剧为争夺资源的暗斗。实际上，华盛顿或台北当局已经把兴趣放在更能反映其意向的、与八九中国民运并没有多少直接关连的海外中国人的活动上。这些人的活动特征是：一、他们自身受到各种政权的保护或赞助，二、他们不曾抨击美国政治制度的黑暗(包括对中国人的迫害)，三、他们热衷于西方政客们乐于利用的兼具反中内容的反共题目(如围堵、制裁、诺贝尔奖等)。

社会改进党人没有任何资本或靠山与同路人相争，因为我们明白：不仅各政府权力不可能保障我们的人权，连它们的法律也最终服务于其统治集团。如果我们也需要政治资源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运动的话，我们只是在这个过程中积累起受迫害的事实；社会改进党人的遭遇无非就是起因对于普遍民主、人权理想的追求而受到北京、东京、华盛顿等各种权力的迫害。我们这样的实践最清楚地表明：只有中国大陆的真正民主化才可能改善我们自身的命运，无权(权力、权利、权益)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救自己。在即将到来的中国大陆民主化进程中，只有我们能再次承担先导的功能。

随着北京政权正统性的衰落，它已经不得不放宽经济与思想上的统制以拉拢新兴的“中产阶级”，大批的没有直接涉入八九民运(以及少量的有海外经历的涉入者)的知识分子已经被统治集团收买并死心塌地为统制阶层效忠。北京的现政权正逐渐把对民主运动的直接镇压(威胁人身安全的政治恐怖)变为间接的社会歧视与广泛的社会迫害。中国的民主化运动逐渐由以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加上少数中共上层“开明良知”者)为先导的自由诉求，变为以工农下层平民为主体的利益抗争。中国民主运动于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七年的特殊历史时期再海外的预演，表明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民主化进程强朝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展开。佔据主流优势的“民主派”将会在西方国家政权的扶植下，与佔主流地位的中共统治集团结盟共同压迫、压榨平民大众。

毛派（政治个人独裁，经济平等/均贫）	社会改进党（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均富）
邓派（政治权贵专制，贫富悬殊）	民主派（表面政治民主，放任贫富悬殊）

殊)	殊)
----	----

上表虽然不能准确地表现中国将来的政治区分，但可以表达出不同的特征。请注意社会改进党人与其他三者的差距大于他们之间的不同。

社会改进党人在将来的中国民主化前景中，不可能扮演政治上的主角，因为随着“体制外”民主派的公开合法化，统制集团的正统合法性得到进一步的确认与加强(正如今年三月在台湾的选举后趋于更加保守、反动一样)，我们将面临着更大的利益集权。在可预期的将来，我们也缺乏足够的政治力量阻止中国进一步资产私有化以及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如旧苏联、东欧这几年的进程所显示的那样)。我们还得承担因“六四”事件导致的政治性负面遗产：西方社会(特别是与中国有最深联系的日本)在政治上的全面倒退与军国(右倾)主义的抬头，他们直接的加强着中共现政权的统治地位，共同阻碍着中国的彻底民主化与世界上的一切正义事业。

面临着不容乐观的中国民主化前景，我们社会改进党人必须同时展开两方面的工作。首先，随着中国社会矛盾(普遍的官商腐败堕落、贫富悬殊、工人失业、农民盲流、下层工教人员贫困化等)的进一步加剧，两大社会阶级，即所有者阶级与非所有者阶级，正形成鲜明的不同利益集团。我们必须在正在形成的阶级对立中维护非所有者阶级的权益：就业权、受教育权、免于贫困权、选举国家官吏权等等。只有通过这些斗争，我们才能把中国的民主主义扎根在现实生活的民众中，同时防止兴起的民族主义被统制阶层利用朝危险的大国沙文主义方向膨胀，从而刺激起美日列强的军国主义扩张。

其次，中国的民主化在抗争北京统治集团的斗争中，将越来越显示出与西方各资本主义列强的冲突(中共上层容易看出台湾统制集团比较高明地用“民主选举”方法维系权益，将逐渐减少对“民主”的恐惧与抵抗)，我们更需要加强与世界上一切受压迫、压榨集团(民族、人种、阶级)的斗争联系、互相支援。尽管各国统制阶层在压制民众上其有共同利益，但瓜分世界有限资源、市场的冲突威胁大于现存的各种“国际条约”保障。避免现存威胁的唯一途径是各国民众互相了解，不愿意充当本国统制阶层的工具，因为各国民众之间不存在威胁对方生存的利益冲突。最终地看，人类和平的条件之一是清除国界、国家，但近年来的、为各式国家御用学者

所津津乐道的“无国界化”却只迎合资本家及其代言人或附庸的贪欲而将普遍民众奴役、限制起来(如北美贸易协定)。

如果社会改进党人不加倍努力，如果没有这两方面的有效工作，中国的民主化前景就无从展望，世界进步也无以达成。这就是我们的奉献价值，也是我们的信念。

(首发于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合编【回归的挑战】1997年7月)

17. 从天安门到热诺亚

这一天来得太晚，但它毕竟到来了。

自从 1989 年中国民众在天安门广场奋起抗争一党专制并遭到卑鄙的镇压后，人类社会经历了急剧的倒退与反动。在几乎所有的政权稳定的国度里，无论是华盛顿、北京，还是东京、平壤，民众的政治、经济权利都遭到统治集团的进一步剥夺。这个历史性复辟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生活在发达工业国度的民众被其统治集团蒙骗与操纵，没有配合在一党专制下抗争的中国、苏联等民众、使得我们原初的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普遍斗争在国内被镇压或在西方被收买成为一小撮替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效劳的政治人物的工具。

我们没有必要顾及那些背弃了自国民众寄人篱下的叛逃者们的灵魂出卖，因为他们毕竟对社会伤害不大。但是，那些靠民众力量爬上政权的“精英”，当政时面对的只是“国际社会”（即西方社会、或美国）的统治集团的“支援”（或压力）、缺乏西方社会民众的声援，只能扮演买办的角色。尽管他们迟早会被民众抛弃，但已经出卖或瓦解了祖国，为害深重。米诺舍维奇企图以民族主义逃脱此命运，招来了帝国主义的直接军事轰炸，他本人也被囚捕。

每年一度的西方发达七国首脑会议本来只是一个不具政治色彩的“富人俱乐部”，但因天安门事件立即转换为世界“民主主义”的政治宣言立法者。1989 年东道主密特朗宣判北京专制政权没有未来，西方的广大民众都以为这七国的制度才是人类未来的唯一选择。在中国受到制裁、苏联瓦解与联合国机能瘫痪的过去 12 年里，七国首脑（加上后来的欧盟与俄罗斯首脑）会议迅速转变成决定全球命运的、推行全球资本主义化的世界买办“政府”。它的主要效劳顾客是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集团。

2000 年在冲绳召开的八国首脑只遭到轻微的抗议，因为在美国军事占领和日本政治、经济支配下的冲绳民众被迫招待直接决定他们命运的强权。面对 2001 年 7 月聚集到热诺亚 Genoa 的 20 万欧洲民众，八国首脑以及主流媒介把他们描绘成“暴乱的无政府主义者”与“请求免除第三世界债务的天主教徒”，表明这些世界支配者们只准备两种答复：开枪镇压或

“开恩施与”。实际上，欧洲民众的如此大规模的、明确宣示的政治示威，主要是因为全球资本主义化的扩张已经威胁到他们自身直接的生活利益了。

天安门的示威显出中国民众对于自身命运的另一种可能性的追求，热诺亚的抗争意义在于西方发达国度的民众正面地以直接行动拒绝各国买办统治集团对人类前途的威胁。这对于中国等追求民主化斗争的民众提供了一个新的鼓励方向，可以阻止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像过去那样被西方国家统治集团轻易地利用。

在经历中国被纳入世界贸易组织、江泽民集团公开宣称“三个代表”（要点是“代表最先进生产力”、即西方跨国公司利益）、公开欢迎资本家加入共产党等一系列有关国家本质的转变后，北京的执政者梦想挤身成为“九国首脑”之一员的愿望也流露出来。日本等欢迎中国加入以便“教育”中国不至于与西方公开冲突。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有时有二流的英语词句、概念（如“绊脚石”、trouble makers 形容李登辉，似乎华盛顿本身没有意图干涉台湾事务），有时用一流的日语直接与日本外相谈判、丧失立场（如就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用词不妥被日本政界利用），深怕西方强权以为北京当局不理解西方、发生误会。

可以期望，西方国家民众的抗争会越来越持久、扩展，中国民众抗争的政治方向也会更加成熟，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各国的统治集团，为整个人类的前途带来希望。

[首次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2001年9月]

18. 毛泽东主义

在多如牛毛的关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或Maoism（毛主义）论述中，提出“毛泽东主义”并以此为视角，主要是试图从方法论方面确立一种新途径来研究老问题。

“毛泽东主义”这个提法最早只可能源于毛泽东本人。据王明的《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⁸⁸中记载：“从1941年9月起，毛泽东在同政治局同志的谈话中，时常说他要搞一个‘毛泽东主义’。”王明引用毛泽东的话说：“一个领导人没有个主义，活着就会被人打倒，死了也还被人反对。有个主义情形就不同了。”“我搞毛泽东主义还是要马克思主义，只是不要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或者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此时，日本尚在准备偷袭珍珠港，美国并没有对日本宣战，中国的抗日战争前景并不明朗，“毛泽东主义”出笼太早。

当刘少奇等人为了个人目的制造并推行“毛泽东思想”这个用语的时候，中共还没有取得全国胜利，斯大林正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顶峰绝无仅有的领袖地位，所以，这个“思想”用词低于用于马克思和列宁之后的“主义”的级别。今天，当我们正视中国革命这场人类最伟大的政治实践时，把其无可争议的绝对领袖“提升”到“主义”的层次来考察，并无不妥。其实，任何具有特殊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的人物的思想（例如托洛茨基、斯大林、卡斯特罗等），称其为“主义”，都未尝不可。当然，对活着的人冠以思想或主义之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中共开了先例，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所以，延安整风之后，首先提出的“毛泽东思想”⁸⁹，是空前之举，遭到国际共运的普遍抵制。以至中共建国后六、七年间，都没有再提这个造语。

⁸⁸引自《中国之春》1986年12月第60页。

⁸⁹据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505页）考证：1943年7月8日发表的由毛泽东布置并经他审阅的王稼祥的文章，首次用“毛泽东思想”代替“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何方引自徐则浩著《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页。

对于毛泽东主义，首次根据其自身的逻辑研究其（自相）矛盾的，恐怕要归功于王凡西的《毛泽东思想论稿》⁹⁰。这本流传非常有限的论著的历史价值在今天的任何读者眼中都可谓有目共睹，不必重复。我只想在此略为提及由于王凡西特殊的流亡背景所造成的局限和政治信奉（托洛茨基主义）所造成的偏见。

王凡西在批判、揭露斯大林、毛泽东的个人神化丑恶时没能对马克思、列宁持有客观、公正的态度，而是把后两者作为神来崇拜，并把他们等同于社会主义。例如，王凡西在批判《红旗》杂志主要理论家施东向（多半代表陈伯达或毛泽东）时赞扬到，“施东向有一句话说得对：‘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的政权问题’”。这可以看成是列宁主义的宣言，与社会主义传统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论）不同。王凡西进一步断言：“可是在毛泽东思想中，表示出最无远见，因而被事变驳斥得最为残酷的，恰恰是关于这个根本问题的立场。”这应该可以被认为是王凡西对毛泽东主义理解偏差之典型。毛泽东在此“根本问题”上，表现出了与列宁相当的远见。

另外，王凡西虽然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教养，但他对于社会主义其他流派却几乎是无知的。例如，王凡西套用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断言：“不难看出，这段文字里提及的蒲鲁东、劳麦、小资产者，毛泽东当然和蒲鲁东一样，是‘和小资产阶级观点有关的’。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官僚主义堕落，以及斯大林官僚制度与官僚思想的普及于全世界共产党，也大大促成了毛泽东那种貌似辩证的、蒲鲁东式的诡辩主义。”这对于蒲鲁东和毛泽东都不公平。这里，引用这段指责并不是想指出因为蒲鲁东比马克思高明，所以王凡西搬用马克思嘲笑蒲鲁东就是错误的。我想说明的是王凡西在方法上的局限：如果你自身没有理解无政府主义的精髓就随意嘲笑蒲鲁东，那么你怎能反驳陈伯达、毛泽东不理解托洛茨基主义就批判托洛茨基呢？

戴着托洛茨基深度近视眼镜的王凡西，以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后整整七

⁹⁰ 《毛泽东思想论稿》，王凡西，香港信达出版社，1963年10月初版，信达出版社1973年再版，新苗出版社2003年再版。

<http://marx.org/chinese/20/marxist.org-chinese-wong-1964.8.htm>

年才由刘少奇在 1956 年 9 月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宣称“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为例子，讥笑到“一九五六年九月，离开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已过了整整七个头。在胜利以前，毛泽东固然看不到中国的革命专政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事实，而在胜利以后，当这个事实摆在面前时，也还需要长长七年的教训（其中不少是悲痛的），才使他（经过刘少奇之口）终于认识到人民专政已经是一种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实质。毛泽东究竟是怎样伟大的一个革命战略家，仅凭这一点就完全可以测定了。”今天，中共自己也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基本原则”而改用“人民民主专政”，而作为中共实践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文化大革命”、“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已经彻底暴露出独裁的本质。应该说，这是毛泽东进一步迈向个人独裁的理论借口，而不是他“进步太慢”的说明。这进一步证明王凡西用以衡量中国革命、衡量毛泽东主义的那把“尺子”本身是不科学的。

从 1949 年中共建国到 1976 年毛泽东去世的 27 年间，在毛泽东独裁统治下的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于中国社会和世界政治的影响深远，从其中概括出反、正两方面的毛泽东主义，并非没有益处。但其难度较大，且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⁹¹。相对而言，建国之前的毛泽东主义比较单纯且具有不可替代的正面价值，可称为毛泽东主义的精髓⁹²。具体说来，毛泽东主义的形成，可以从毛泽东等人（主要作者是陈伯达）于 1939 年冬季合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此论的第二章“中国革命”第五节“中国革命的性质”里，第一次出现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概念：“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

⁹¹对建国以后的毛泽东主义的研究，还涉及到评价邓小平集团主导中国的意识形态，即所谓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四项基本原则》，需要大量的亲历者的有意义的反省。至目前为止，公众连许多基本事实都无从得知，遑谈评论和分析。何方的《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 2005 年出版）算是一个开端，其出发点就是因为经历了延安整风、长期在张闻天手下工作的著者“深有所感，总想一吐为快，表而出之”，基于“现行主流中共党史很难算得上信史”（第 697 页），“在现行体制下很难成为良史”（第 701 页）。

⁹² 2004 年我在 H-Diplo 网上论坛 <http://www.h-net.org/~diplo/> 与美国、英国、德国、以色列、澳大利亚等国的国际政治学者们就中国革命、毛泽东、陈伯达等展开过冗长的论争，促进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观点的形成。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现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此观点在1940年1月发表的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论》中更充分地发挥出来。从政治实践的角度看，正如列宁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布尔什维克奠定了一党专政夺取政权的理论基础从而确立了“列宁主义”一样，“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并统治、发展中国奠定了理论基础。一言以蔽之：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但它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就是“毛泽东主义”。没有此理论，就没有领导人类历史上最伟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就没有我们今天认识的中国革命。



毛泽东主义的实践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且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是对列宁主义的运用和发展，指明在任何经济形态下的人民都可以直接用政治、军事手段推行革命、夺取政权。如果我们对照古巴、菲律宾、秘鲁、尼泊尔这些不发达国度的情形，毛泽东主义比列宁主义更具普遍意义。

提到毛泽东主义，自然离不开在毛泽东身边与之共事三十多年的“大笔杆子”、“天才理论家”陈伯达。直到被毛泽东的“第二张大字报”⁹³打倒为止，陈达伯作为中共的理论权威，是毛泽东主义的第一作者，在“文

⁹³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于1970年8月31日在九届三中全会印发后就注定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难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的陈达伯的政治命运。此“意见”的全文见注5的书里“附录一”，第128—130页。

化大革命”中被周恩来、毛泽东推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位子上，官列中共第四名，但很快以“唯生产力论”罪行被打倒。毛泽东抛弃陈伯达，启用张春桥、姚文元这样的“理论家”，以为可以为毛泽东主义创造出新的思想，但张、姚等人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反观陈伯达，在其晚年的 18 年狱中期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出了不少令人称绝的好文章，如“《石头记》里的一件公案”，“‘青州兵’与曹操”，“一部历史悲剧——《水浒传》”，“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⁹⁴等。至少我们可以说：陈伯达之后，中共的理论就没有它自身的逻辑，中共也就没有了理论。

[2005 年 5 月 10 日 美国圣荷西]

⁹⁴ 《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陈晓农（陈伯达之子）编注，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8 年出版。在这些文章中，陈伯达指出：林黛玉的悲剧在于她没有财产，曹操的发起靠镇压、收编黄巾军，梁山泊好汉们的悲剧在于小生产者的政治局限，佛学的顿悟、渐悟两派源于社会地位不同等等。可惜，他不能对毛泽东、对自身的经历进行一番马克思主义的反省。

19. 「八九六四」之后的我

一九九三年，当我受邀为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编的《中国的良心》写稿时，颇为书名之沉重犹豫。同时我也很期待经历了四年之后仍坚持民主运动的海内外中国人能够反思、反省、反悔，所以写了「沮丧的回省」，表达出在日本被出卖后的精神思想。那时，我仍然对北京政权、对日本政府抱有一丝期待和幻想，以为它们最终会明白，我们的民主运动在道义、实践等方面都是在帮助它们维繫社会秩序。

一九九七年，当我再次收到香港支联会主编的《回归的挑战》约稿时，我以「社会改进党人对中国民主化前景的展望」为题回应。那时，我明确了自己的定位：社会改进党人或曰无政府主义者，与所谓「左派」（即毛派）的「经济平等、经济专制」性质，邓小平集团的「经济自由放任贫富悬殊、政治专制」性质，所谓「民主派」的「经济放任贫富悬殊、政治自由」的性质区别开来，坚持「经济平等、政治民主」的自由社会主义（即「安那祺主义/无政府主义」）立场。这个立场至今没有改变。

回想起来，当我一九八五年考上当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唯一的社会学专业留学研究生时，颇有抱负要「创建」中国的社会学。一九九二年，我作为大坂大学第一名社会学博士毕业时，却没法在中国或日本的「学术界」濶一口饭吃，因为那时的北京政权驻日公使唐家璇与日本文部省进行了一个小小的交易（「赵京破坏中日友好」），把我赶出日本的大学（我也从未再进入其中）。这使我懂得，所谓「学术自由」在「国家利益」面前是多麽地一钱不值。唐家璇因为其「杀一儆百」（全日本被取消国家公费奖学金，被赶出日本大学以及被剥夺护照权利的只有一人）的手段获得靠「六四」国难发迹的江泽民的赏识，后来高升到外交部长、国务委员职位，可见北京政权镇压、出卖本国公民的专制本性。

一九九五年，我迫于没法从北京政权和东京政权那里拿到「结婚证明」，特别是面临即将出世的后一代在日本没有任何身份的现实，逃离「社会主义者」（日本社会党首领村山富市）佔据首相官职的日本，开始了在美国的无国籍难民生活，并投身到反战、反失业、争取医疗保险等社会正义的运动中。二零零四年，当我下定决心去美国移民局 CIS 申请护照时，被告知联邦调查局 FBI 正在调查我的背景，移民局不能批复我的申请。时

至今日，我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国会议员）询问，都被拒绝，理由是甚麽呢：「国家安全考量」！对于安那祺主义（自由社会主义）者来说，还有甚麽比这更高的奖状呢？如果 FBI 对我不屑一顾，那我在美国的这十几年工作有甚麽价值？

回顾自己自从一九八零年无意识地参与清华大学的学生会选举以来与北京的专制政权、日本的军国主义兼排外种族主义，以及美国的帝国主义的一系列斗争，我更坚定自己的信念：如果允许我再一次选择，我还是会重複被出卖、被压迫的生活；只要北京政权不具备尊重人权的合法性，我宁愿再坚持十几年的无国籍政治难民身份，不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向北京政权效忠。与此同时，我也作好准备，不畏惧美国政府把我驱赶出境。因为，在今天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体系中，只有当所有人都获得了自由，才能有我的真正的自由。

（2009 年 2 月为香港《回家》而写）

20. 回顾与林希翎大姐的短暂交往

1989年我从日本去巴黎出席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见识不少人物，林希翎女士是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

我回到日本后，把关于民阵大会的文章寄给林希翎大姐（称“大姐”不是因为年龄辈分，而是因为“普天（或上帝）之下皆兄弟姐妹”的情感），发表在她主办的《开放》杂志上。不久，收到她的来信，批评我“一稿两投”，因为同一文章也发表在杨中美主编的刚出版的《民主中国》月刊上。我第一个反应是：“《开放》和《民主中国》在法国和日本分别发行，我的文章都不要稿费，自己保有版权。”但我马上意识到：必须帮助林大姐。我回函道歉，给《开放》另写一稿，并附上五千日元。林大姐在《开放》发表并任命我为驻日本编辑。

我近来整理自己的文论，重新打字后在网上等发表，但没有动另一篇在《开放》上发表的短文（关于日本外务省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隔壁家长打小孩”，与我无关）。我十几年来一直希望，等我有了一本护照可以去欧洲时，要去看望林大姐，得到她的许可才能在别处发表那篇短文。现在，要到天国才能看望她了。

中国近代以来的自由民主运动，多为当局镇压、个人利用，于中国的社会进步没有多大价值。庆幸1957年的自由民主运动，正是有了林大姐这样的旗帜，才没有被完全出卖。林希翎永存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中。

[2009年9月22日，美国 圣拉蒙]

21. 台港澳掠影

在日本拿到进入中国的签证后，我有意购买了台湾的中华航空公司的往返旧金山和香港的机票，途经台北转机，可以造访“中华民国”，也防备万一无法进入中国时，可以在台港澳多考察几天。

2010年11月15日，我第一次踏上“中华民国”的管辖地。1989年的天安门悲剧后，我本来接到过李焕“行政院长”的邀请访台，但因为不愿签署“匪区进入自由区声明”一类的东西，一直未能成行。“中华民国”至少在名义上还代表中国，但我这个出生于北京的中国人却只能靠一张USA passport本本才能进入台湾。

因为只有十个小时的转机时间，入境后我马上随第一个遇到的大巴士赶到台北中心，首先到达“国父纪念馆”，正好赶上9点的卫兵操练仪式，使我回忆起1989年在法国境内“圣马力诺公国”见到的类似情景。这是当今人类学实地考察的最好标本之一，见证人类社会制度的开化程度。十几天后，我得以直接造访孙文先生的出生地故居，进一步了解“国父”传说的起源。

台湾的人类学地理标志是“中正纪念堂”和“中正广场”（现改为“自由广场”，两边有国家戏剧院和国家音乐厅）。我很幸运地赶上人类学实地考察中最重要的时刻：利用此设施的仪式活动。“中华民国总统”在陆海空军仪仗队的吹鼓下迎接洪都拉斯总统来访。我在戏剧院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啤酒，观察约一百多米外的马英九等部落首领。周围的保安人员并不突出威严，围观的人群也颇为自然。我知道，自己中学时练习手榴弹投掷，只能扔30来米。

我还没有找到恰当的词语形容白色的、颇有祭天成分的“中正纪念堂”的含义，在去“总统府”的路边遇到不起眼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正好回答了我的问题。我也注意到正在进行的选举广告，为台湾人能够找到这样方式来组织他们的政治结构感到幸慰。我到达“总统府”时，还可以在一楼参观，从本地人的解说中体会了“身为台湾人的悲情”，比过去听到的“台湾独立”等狭隘宣传入耳。我一下飞机，就注意到拼音的使用，感到两岸在文化上的接近，经济上的融合也不用提，但政

治上，已经获得基本自由民主人权的台湾民众，如何能够理解、同情、支持大陆民众的感情和权利，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我 29 日回美再次在台北转机时，只去了故宫博物院，遇到宋代文物（部分来自大陆）特展。我在朱熹等思想家的手迹前停滞较久，想起斯宾诺莎对于犹太人同族“没有思想”、“轻视哲学”的惋惜。中国的文人“正统”，都以“帝师”（借用王妙发学兄之语，实为“行走”）为目的，喜欢在某种既有社会秩序之偏见下设计人的（非）权利，而没有想到如何在个人的自由天赋基础上组织社会，真是本末倒置。我两次在台北转机时，都是周一，国立图书馆不开放。那里收存有我的《安那祺主义：理论与实践》等政治思想论集，提供了人类组织形态的不同选择。

27 日，我从珠海进入澳门，在妈祖阁体会较为原始的民俗信仰（插图），这是我不太熟悉的领域。这里与大陆城市明显不同之处是小摊上的关于北京高层的政治报刊，我也遇到一组法-轮/功人士的静坐，使拥挤而有序的澳门更像香港的缩影，是中国式的市民社会的典范。这些报刊很容易带入大陆，我在大陆也遇到几个友人问起从港澳带回的《国家囚徒-赵/紫/阳》的真实性。这一类刊物的真实性不是我们的关注，我们争取的是民众能够阅读这一类刊物的自由。

我 28 日再次进入香港，立即联系好与长毛（梁国雄）、林致良的会见（《十月评论》的电话号码又不对，无法联系上）。1993 年我首次访问香港时，曾与致良见面，这次重逢，格外热切。我们在尖嘴的码头信步，



交流美国、香港和大陆的情况。他介绍他所从事的社会工作越来越被边缘化，政府的相关预算越来越少。他也在帮助编辑马克思网站 marx.org 的中文版，提到要收入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如苏联 1921 年克朗斯塔得水兵起义的宣言等。我们都尊重每一个人选择不同的流派、道路，只要是为了共同的改进人类社会的理想。

我这次是第一次与长毛见面（插图）。我们在一个小面馆讨论了不少深入的问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领域内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议员（除

了标志性切·格瓦拉衬衫外，他还带着马克思像章），他的意识很现实：“权力归人民！”，不同于我们的“解消一切权力”的安那祺主义（自由社会主义）理想。他特别批判在“五区公投”中与之分手的司徒华，令我感到不安。我与华叔接触不多，对于他高龄病体下不勇退、依然出任支联会主席略感不适，但还是很敬重他 21 年来能够领导支联会坚持到今天。长毛提到民主党向北京靠拢的原因是香港驻军（我在出租车上，经过了一栋有“八一”标志的建筑物），倒使我思索良久。作为个人，我们都更崇尚幸德秋水那样的自由社会主义殉道者，而不是乔姆斯基那样的论道师，只要是普通民众的权利，牺牲自由也在所不惜。但事态并不那么悲观。失去信仰的当代罗马帝国（中国）正需要思想和信念，而除了自由社会主义的明灯，还有什么意识形态可以指导中国的社会转型？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自 1989 年天安门悲剧以来已经很大程度上被蜕变了，但我们的（经济）平等、（政治）自由的社会主义理念，比任何资本阶级的势力（包括“三个代表”诡论下的政党）更天然地符合包括广大士兵在内的中国民众的利益，不必杞人忧天。我这次离开重庆 23 年后能够探亲访友，也见证了我们为之奋斗的中国自由、民主、人权的些许进步。长毛，你只要坚守住立法会的阵地，准备好投入几年后要实施的特首普选，就离“权力归人民！”的理想进一步了。除了我们，没有任何政治思想/理论/实践要解消世界上一切权力机器。

[2010 年 12 月 4 日]

22.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方法论局限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以下简称《党史》二卷）由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隆重”出版。《党史》二卷概括1949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邓小平的实际领袖地位）这段历史，其编修从1994年9月开始，花了16年时间，最后上报中共中央，赶在中共成立90周年之前，得以批准出版。最近，蒙承国内友人厚意惠寄，我得以与8千万中共党员同享这场政治学习的“庆典”，以此文作为简要汇报，与广大读者分享。

在网上查阅“《党史》二卷”，会得到各地“掀起学习高潮”的信息。我不是中共党史研究者，故无暇评论《党史》二卷的史实性（编者本身也承认“有些档案是看不到的，这没有办法”，而对于至今没有公开事件真相的林彪事件等档案，即使编者能看到，也不能作为信史采用），而宁愿采取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以《圣经》本身研究《圣经》”的方法，主要从方法论，特别是本书据以立论的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指出其局限性。

我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网站 <http://www.qstheory.cn/> 上读到本书的编辑机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负责人石仲泉（“《党史》二卷若干问题刍议”）、张启华（“在探索中前进的中国共产党”）、逢先知（“一部重要的党史著作——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除了党政文献外，本书唯一引用以个人名义出版的毛泽东传记的就是逢）等的介绍推广文章，可惜无法知道本书的编写过程是如何“得到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精心指导”（后记）的。不过，本书的第3页江泽民1999年10月1日的单独图片、第4页胡锦涛2009年10月1日的单独图片出现在这本1949年到1978年的中共党史，而没有出现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半点形象⁹⁵，表示本书的“党性”意识形态压倒“科学性”史学研究。此书的首要“基本指导原则”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把握，坚持以中共中央《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

⁹⁵我当时读初中，在美术组参与大量的宣传画展庆祝活动，记忆犹新。

历次重要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有关重要论述为依据”（后记）。按照本书的逻辑，它们是本书的“纲”，别的都是“目”。我读到的所有关于本书的评论都围绕着“目”（历史细节）展开，在这方面许多人比我更有资格评论这方面的内容。既然没有读到论“纲”的文字（或许只有上述第3、4页的图片人物才能评论），我这里主要就是想谈谈这些首要“基本指导原则”的局限。

30年前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⁹⁶），对1949—1981年历史的基本评价是：“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本书的29年包括在《决议》的32年中，自然不可能离开《决议》的框架。本书没有列出名词索引，但对出现了几百、上千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等核心用语却没有解释。这里面有许多问题。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只是第一国际中的国家社会主义流派，它的主要实践代表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或第二国际。二、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提法大意是指“用列宁来定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列宁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⁹⁷，实践上是已经破产了的一党专制的斯大林体制⁹⁸。三、“毛泽东思想”被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张春桥、江青、华国锋以及最后裁决的邓小平、胡乔木等变来变去，搞得连毛泽东自己的思想已经不是“准确”“科学”的毛泽东思想了。那么，对于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大意是指不可违背的正确指导思想），应该用“毛泽东主义”来概括。这些见解，多少反映在我的《安那祺主义：理论与实践》⁹⁹、《鲜

⁹⁶我当时作为清华大学学生，有幸参加校方组织的政治学习，第一次用自己的眼光观察中共的权力交替。

⁹⁷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时定义：承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由此而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

⁹⁸托洛茨基虽然声称自己才忠实于列宁主义，主要是出于与斯大林争夺正统的需要。他开创的第四国际后来谴责一党专制等列宁主义特征。

⁹⁹ ISBN: 978-0-557-01635-8。2008年第一版。

为人知的俄国革命》¹⁰⁰书中的“马克思与巴枯宁冲突的结症”、“无产阶级专政与列宁主义问题”、“毛泽东主义”和“巴黎公社悲剧的教训”等理论文章里，此处不再重复。正如我在“中美两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困误”（《安那祺主义：理论与实践》第二版）中指出的那样：“政府、政党（特别是一党专制下的政党）控制的经济并不等于公有制，没有新闻自由、政党自由的政治制度不是社会主义”。本书的编者（以及他们上面的“中央领导同志”）不太可能读到我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最新研究，但他们至少要借鉴在中国公开出版的《苏联历史档案汇编》等原始史料呀！实际上，如果要对中共党史进行全面、准确、客观的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最首要的工作是出版至今没有公开的原始史料，让不同的史观基于客观的事实写成不同的党史版本自由发行。

正是因为中共（特别是毛泽东、邓小平本人）在这些社会主义理论上的贫乏、局限、混乱和错误，带来了实践上的过失和犯罪。例如，民主正是人类社会组织如何集中意见、权力、资源的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方式，所谓“民主集中制”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本身就是对民主的否定。但这个在战争中有效的带有强制（专制）性质的组织方式却未经辩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原则（第8页），实际上背弃了中国共产党自身1944年提出的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第9页），难怪直到今天中国还没有普选等基本民主制度，带来一系列社会灾难。再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以及《共同纲领》总纲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规定（第10页），从英文的翻译看，只在Republic of China（中华民国）上加了People's（人民的）形容词，但“人民”由执政当局甚至毛泽东一人随意定义解释（连国家主席、党主席的接班人也成了“敌人”），还不如取消为好。实际上，摆脱苏联操纵的东欧国家正是这样做的。顺便指出：本书名为《党史》，实为《党中央史》，且不说象我父亲这样的中下层忠诚党员干部（大学毕业时从北京主动要求、被分派到贵州毕节山区创办师范学校）、我母亲这样的因为出身“问题”申请了几十年才入党的知识分子“人民”永远不可能成为《党史》的材料，连绝大多数中央委员（除了在“永远”开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中共八届扩大的12中全会决议上唯一弃权的陈少敏，见第805

¹⁰⁰ ISBN: 978-1-4583-0411-7. 2011年第一版。

页)也只是在统计数目时才有用处。另一方面,中共直到1945年七大仍保留“联邦共和国”的宣传纲领,更接近苏联的模式,得到包括达赖喇嘛和西藏共产党创始人在内的人士的赞同,可能会较好地处理西藏问题。其实,federation这个词,是指自由联合的社会组织方式,与上述1944年中共的“民主联合政府”接近,比作为政治法律用语的“联邦”更为广泛,是第一国际(正式名称是国际劳工协会)等社会主义团体和今天的许多国度(从大国美国、俄罗斯、德国到小国瑞士等)采纳的方式,比“人民共和国”更合适。在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的建议下为了统治的方便取消了联邦形式(第12页),看起来迎合了多数人的利益,但一党专政的执政党随意改变自己过去对哪怕是一小部分集团(民族)的政治承诺,也会引起上台后的合法性疑问。

再如,在人民代表大会(即使是形式上的)作为最高权力已经确立起来后,仍然保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看到其在总纲中明确规定“基本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266页)必须共同遵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积极学习国家的政策,提高政治水平,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进行思想改造”(第267页)这样尴尬的“二等公民”政治局势,才出现了“不公开的共产党员”吴晗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的身份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第753页)这样的政治笑话/悲哀现实,把“肝胆相照”的“民主党派”作为连花瓶摆设都不如的异己分子。从逻辑上看,如果没有政协,让知识分子或“民主党派”要么加入人民代表大会要么干脆什么政治组织也别加入,批判《红楼梦》研究(江青就是由此在毛泽东的指使下介入中国上层政治的)以及后来的反右等运动“阳谋”就不那么容易被毛泽东发动起来(第286-287页)。没有实质的党外监督(例如,让他们独立参选人大选举),党内民主也不可能存在,一党专制很容易蜕变为个人独裁。这一点,连自以为高明的、斯大林的死对头铁托也不例外。

《党史》二卷在有些关键的历史疑难问题(因为我们还没有确切史料)上有所提示但没有点破原因,例如,“八大通过的党章还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是增加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一款。...二是在党的指导思想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这可以使读者联想到党内斗争迫使毛泽东退到二线(会皆大欢

喜)，或者意味着中共社会主义水平的提升（放弃终身制），但本书马上声称：“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也没有影响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第 403 页）给读者不知所云的感觉。不容讳言，对毛泽东的评价，是本书作为“历史”是否客观、公正的要素之一。可惜，按照编者之一的解释，“毛泽东一直在努力探索如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如何保卫国家安全、如何赶超发达国家、如何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权利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课题。他的成功与失误，他的光辉与瑕疵，大多与此相关，而丝毫不是为了个人私利。”（张启华：“在探索中前进的中国共产党”）果真如此的话，本书就不应该为彭德怀、刘少奇等一大批更像“不是为了个人私利”的遵守党内规则的受害官员辩解了。这种态度与“历史唯物主义”¹⁰¹相去甚远。其实，正如《圣经》里伟大的犹太王大卫也犯罪一样，但耶稣（上帝）还是把他作为自己的祖先来继承；而本书对毛泽东的处理，显现出其代表的当代执政集团害怕承认毛泽东犯有罪过会减弱他们的执政合法性。这也可从书中的一些突堂的高调结尾感受到：“这是一个已经载入中华民族史册的伟大功绩”（第 631 页）¹⁰²，总结文化大革命时“历史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第 753 页），读起来好像“历史”很容易摆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倒是说：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才有有什么样的领袖，作为“人民”的一员，我们没有必要过分责怪毛泽东或共产党。

《党史》二卷似乎想达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确立斯大林主义的效果，继 30 年前粗糙的《决议》之后，推行以“邓小平理论”为名的、掺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背叛¹⁰³）和“科学发展观”的邓小平主义。不过，邓小平本人对理论不感兴趣，当年就无法敷衍张春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因为，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改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自相矛盾的用语）作为社会主义的理论讲得通的话，“继续革命”不仅顺理成章，而且极为必要。所以我们读到本书中还不得不用“左”（本书意指极左）这样的不规

¹⁰¹我在此无法就这个概念展开讨论。

¹⁰²既然如此，还要写在这里干什么？其实，西藏问题今天还没有解决。

¹⁰³这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法律教授最先提醒我注意到的。

范、不科学的用法来概括林彪、江青等文革派主张。虽然邓小平主义要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1992年“南巡”才最终确立起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改革”道路，一党专制的中国共产党从国家社会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型现实有其合理的必然，非毛泽东主义可以阻止。这主要还是由于中国从靠政治（特别是军事斗争）“挂帅”的较单纯社会形态向以经济为中心的复杂社会形态的过渡。正如杜尔凯姆的研究所提示的那样：古代的简单社会形态里产生的共产主义观念无法适应欧洲的近代复杂社会的进化，才产生了社会主义的思潮。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对毛泽东、邓小平的态度，应该学习耶稣对其部落首领大卫的继承和超越。

《党史》二卷没有交代或明确否定设计国旗时的违反政治常识的解释，只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第8页）带过。考虑到目前的政治“路线”，可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大星）下，中国的毛泽东主义（实质为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邓小平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较接近马克思主义原意）和在第一国际中出现的与马克思主义竞争的自由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这四种政治主张（小星），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党史》二卷体现了在一党专制的制约下费尽心力用16年时间结合头两种主张的局限，实际上描绘出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离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有多远，值得一读。

[2011年7月1日]

23. 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

2012年11月1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2300多名党的十八大代表和特邀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由376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和130名中央纪委委员组成的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¹⁰⁴

这个信息里有好几个专用名词与社会主义相关，值得专门考察一下。那么，从何着手呢？我想到了自己的思想导师。

在奠定了近代政教分离原则基础的《神学政治论》中，斯宾诺莎运用以《圣经》说明《圣经》的方法¹⁰⁵，解除《圣经》的神秘面纱，指出：即使在基督到来之前，在希伯来人的国家灭亡之后，希伯来人不必遵守摩西戒律（他们实际上也没有遵守），上帝与希伯来人的约定已经解除了。这实际上宣示：历史上，因为人类理智的缺欠，存在过不受挑战的神权，但是，从此以后，地球上已经不存在任何神圣权力了¹⁰⁶。斯宾诺莎对于《圣经》旧约的编纂也有不少疑问。例如关于两卷《历代志》：“我一向觉得奇怪，那些把《智慧书》、《透比》和别的称为伪书的书摒之于《圣经》之外的人倒把这两卷书包括到《圣经》里”。“有些法师想把《箴言》和《传道书》摒除于《圣经》之外，想把它们都归到伪书里头，……想到圣书的处置操在这般人的手里是很可叹的”。

今天，看到仍然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把“三个代表”这样的背叛社会主义的垃圾“理论”¹⁰⁷塞进其党章，是很可叹的；看到号称坚持社

¹⁰⁴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18/n/2012/1114/c350837-19582905.html>

¹⁰⁵以下引来自赵京：“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再考”。最初发表于《比较政策评论》2001年 <http://cpri.tripod.com/cpr2001/spinoza.html> 后收入《安那祺主义：理论与实践》，ISBN: 978-0-557-01635-8，2008年第一版。

¹⁰⁶后来洛克在《政府论》（1689、1690年）中更明确地发挥了政教分离的思想，而且在英国，客观上有条件实践这个原则。

¹⁰⁷“三个代表”垃圾论的提法，据说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中共中央

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仍然摆脱不了社会主义流派之一——马克思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各种“跳蚤”变种（一党专政的列宁主义及其变种），也是很可叹的。斯宾诺莎感叹犹太人鄙视哲学的传统，先知性地劝告：“大众或与大众脾气相投的人请不要读我的书”；我对中国的知识阶层的政治理性和道德功能早已抛弃，但对中国的政治前途倒不悲观，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连站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代表大会主席台中央的“三个代表”的僵尸也不敢公开放弃社会主义的旗号。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占领中国的政治中心天安门广场时，在昏庸独裁的邓小平¹⁰⁸主导下，分裂的中国共产党统治集团慌忙拉出一个投机分子当总书记。虽然任何政治组织都有“盗中道”，但这个政治暴发户连中国共产党内部自身的“合法性”也没有，所以刚上台时还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来应付国家社会主义源头苏联及其附庸政权的垮台局面。但是，当邓小平去世后，这个摆脱傀儡身份的“阶级异己分子”¹⁰⁹在国际帝国主义（唯一超级强权美国）和资本主义（日本等）的压力、诱惑下，抬出邓小平的僵尸一所谓“邓小平理论”——把中国推行从国家社会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转换。

本来，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统治集团，包括陈云、胡耀邦、赵紫阳¹¹⁰、

军委秘书长杨白冰兄弟，据说他们因此失权。兴许，把“三个代表”归结为新“三座大山”更贴切一些，因为它实际上把中国革命的主要成果出卖了。

¹⁰⁸ 1989年“六·四”事件之际，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正在大阪大学访问。他不假赞扬“八九”民主运动精神已经超越“五·四”，还纠正会在会的同学们：“邓小平不是老糊涂，而是发疯了！”。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普遍感觉。

见赵京：“如何翻过当代中日关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64-sino-japan.pdf>

¹⁰⁹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政治词汇。官方广为宣扬的他的一个叔父早年参加共产党，但对他本人和其父亲1949年前的背景却语焉不详。当然，作为一个公民，他的出身不应该妨碍他投机政治，但如果没有那场民族悲剧，他会从地方大臣退场，过一个有人性的老年退休生活，不至于对中国社会带来多大危害。

¹¹⁰随便提一句：赵紫阳本人胸无大志，没有管好自己的儿子和“智囊”，是导致个人和中国的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八十年代初，赵紫阳刚当上总理，人们都看好他的前途。有一天我去北京航空学院见我的高中同学，他突然指着一个人说：“看！那是赵紫阳的儿子，刚从南昌航空学校转学来。”当时的中国，社会风气尚算简朴，赵紫阳让自己的儿子从一个普通中专“转学”到很好的大学，使我想到占这

万里等，在 1979-89 年代里，适应民心，把毛泽东本人及其嫡系建国后制造的毛泽东思想的负面遗产转换解释为主要由其反对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推行的务实的“唯生产力论”¹¹¹，带来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步。有人形象地说邓小平的长处是“拍板”作决定，但他在本该安享退休生活的晚年，被不民主的制度导致作出把中国拉向倒退的致命决策。如果没有发生“六·四”悲剧¹¹²，中国能够实行政治改革，可以把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转型为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的官僚权贵在“六·四”悲剧前还只是一个潜在的、见不得人的小集团¹¹³，“三个代表”垃圾论用本人不懂理论、讨厌理论的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决策中违背社会主义的做法，把一具政治僵尸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在这具僵尸的庇护下，官僚权贵已经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现实新阶级。不过，中国民众的维护自身权利的民主意识也随着经济、知识的增长而增强，迫使统治阶级让步。从积极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¹¹⁴的可能功效在于恢复邓小平做法中用“科学决策”（万里在八十年代先提出过这种说法）来发展生产力的正统“精髓”，加上对党内“协商”（接近赵紫阳的“社会协商”提法），对社会“权利”、“公平”、“机会”、“规则”等承诺，把“三个代表”垃圾论扔到它在历史上的本来位置（垃圾堆），回到当年把邓小平推上中国历史舞台的改革开放的政治气候，才可能把中国共

种小便宜的赵紫阳头脑单纯，没有准备可能的政敌攻击。我的预感在 1989 年“六·四”事件不幸成真后，又使我意识到：一个不占“小便宜”（不贪婪）的官僚其实反而爬不上去了，因为那样做背叛了他所在的统治阶级，上司、同僚们会忌讳他。所以，我对后来的两个总理的“反贪、清廉”神话，都一笑置之。他们的儿子都在他们直接管辖下的中国金融行业“大显神通”，就是一个证明。

¹¹¹更形象的说法是“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耗子就是好猫”的“猫论”。

¹¹²这个悲剧的发生有许多原因，但从其直接政治权力落入什么样的人的手中这个结局来看，这个悲剧是有可能避免的。

¹¹³陈云就很忌讳这个说法，一再否认中国存在新官僚阶级。

¹¹⁴我在清华大学因为力图推进 1980 年后被停掉的学生会差额选举，被断定为“有改造共产党企图”，毕业时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发配兰州，这个经历使我对政工干部的印象不佳。不过，胡政治辅导员最终没有赖在中央军委主席的位子上，至少显示出不怕清算的勇气和正常人判断，值得表敬。我们当然不可能知道原因，也不感兴趣探究内幕。如果是与赵紫阳放弃在中国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企图一样，他也因为知道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放弃，这也很难得。

产党拉回到初级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才谈得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当然，强大的官僚权贵阶级¹¹⁵基本上已经阻塞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即使中国共产党能最终抛弃“三个代表”垃圾论¹¹⁶、克服邓小平的违背社会主义的做法¹¹⁷，还要面临扬弃列宁主义的一党专制¹¹⁸、“民主集中”制（民主本来就是一种如何集中公民意愿的方式，这种把民主与集中分开的说法本身就是对民主的无知曲解），以及最终放弃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社会主义教条的政治原教旨主义¹¹⁹等一系列艰巨的转

¹¹⁵顺带提及：中国的官僚阶级的可怕、可恶，倒不是今天中国的特殊现象。除了韦伯对国家社会主义（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制度下官僚阶级的预言（见赵京译《社会主义》ISBN: 978-0-557-01998-4, 2010年），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册（素麦维克节录，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也有很贴切的纪录。古埃及“杜亚夫的教谕”：“我见过挨揍的人，...我见过在强迫劳役以后被释放了的人，...石匠想尽办法找工作，什么硬石头都不管。石头雕完了，他的手臂也毁了，他的力气全用完了。...还有在田地上工作的人，...也是精疲力尽、无法形容。...工厂里的织工，比什么女人的命运都更悲惨。...打鱼的人又怎样？他不是河上生活，成天同鳄鱼打交道吗？...你听我说，随便做什么工作都要听人使唤，除了当官。当官的人是使唤人的。”而中国的官僚“也象古代埃及的同行一样执拗，想尽办法占据着这种骑在别人头上的地位，甚至西方文化的冲击都没有动摇过他们。旧式的科举已经废除了，但是这些官僚们还是可以用一张芝加哥大学的或伦敦经济学院的文凭在农民面前作威作福。”（第103-104页）

¹¹⁶其中一个主要的指标是人道地解决由“三个代表”暴发户本人一手造成的法轮功镇压问题。

¹¹⁷首先从公布“六·四”历史事实、公正人道地恢复受害者权益开始。连梯也尔政府几年后都能对巴黎公社参与者“大赦”，中国共产党为什么23年后还不愿、不敢、不能承担历史责任呢？说起来，除了几个靠人血馒头成名、得到日本国家权力（国立神户大学）、美国政府帮助的唯一恐天下不乱的败类，连参与镇压的侏子手都愿意公布“六·四”事件的真相。

¹¹⁸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创始人陈独秀在“我的根本意见”中，“最后已经放弃了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回到/达到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的立场。”见赵京：“陈独秀：问题、思想以及“复兴”的可能”，收入安那祺主义文库 R-6《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ISBN: 978-1-4583-0411-7, 2011年。

¹¹⁹例如，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在《新阶级》（陈逸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北京）中早就反思过。序：“当我对于当代共产主义现实愈来愈远时，我就愈来愈接近民主社会主义的观念”（第2页）。第六章 对思想的专制统治：“马克思与恩格斯理论与与众不同之点，并非由于他们所提出的理论的本身，而却是由于他

变。不过，至少在理论方面，其实已经有了不小进展¹²⁰，但中国更需要进一步思想解放和学术、言论、结社自由的突破。至于中国共产党是否、何时能够回到国际工人协会¹²¹和巴黎公社¹²²的精神和原则、回到真正的社会

他们运用这些理论时所用的方法。他们不承认同时代人们思想里的任何科学及进步的社会主义的价值，常常一古脑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科学’；这样一来，一切认真的讨论和研究都被他们预先阻止了。”（第 111 页）“马克思、恩格斯两人进行本身的工作，并不了解同时代的许多最重要的思想，也轻视他们同一运动内部所有与他们相反的意见。…马克思、恩格斯对付他们在社会主义运动里反对者的办法完全是凭凶暴与不容异说。这对于蒲鲁东的社会学来说也许是不重要的；但对社会主义及社会斗争的发展来说，特别在法国，却是非常重要的。同样的情形也可适用到巴枯宁。马克思在他的《哲学的贫困》一书里，除了把蒲鲁东的意见一笔抹煞外，他又轻蔑地说了好多的题外话。他同恩格斯两人以同样方法对付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拉萨尔以及他们自己运动内部的其他反对派。”（第 112 页）

¹²⁰除了上面提及的《新阶级》，在安那祺主义文库 R-6《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ISBN: 978-1-4583-0411-7, 2011 年) 一书中，我翻译、介绍了马赫诺运动，也引用了已经议成中文的基于解禁的苏联原始档案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1921 年的喀琅施塔得》(纳乌莫夫、科萨科夫斯基编，任建华等译，人民出版社，2007 年)、《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沈志华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 等大量新资料。

¹²¹关于国际工人协会(也被简称为国际，即国际歌中的“英特纳雄耐尔”)几乎所有的中文文献和引用都持同一论调，来源于为列宁主义政治目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除了直接参与者马克思以及后期为了排挤巴枯宁派进入国际的恩格斯、拉法格(马克思的女婿)的文章，别的翻译成中文的资料，例如，根据俄共(布)中央出版社 1934 年版译出的《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文件资料)》，都宣示出对国际中所有非马克思派、特别是马克思以外的各社会主义潮流的敌视，曲解了国际的精神和基本原则。国际的精神和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在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度的欧文式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最先进、丰富的欧洲大陆社会主义发祥地法国的蒲鲁东式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被后来者正确地称为 anarcho-syndicalism 安那祺-工联主义，也多少带有对被资产阶级出卖的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⁷的向往。如恩格斯承认的那样，正是因为“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派，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拒之于门外的纲领”。(引自赵京：“国际工人协会的精神和基本原则”，2012 年 9 月 3 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international.pdf>)

¹²²巴黎公社是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的里程碑，所有的社会主义流派都在此一显身手，所有后来的社会主义流派都为此滔滔不绝地辩论、误导，都以此指导、修正、影响自己的实践。其中最主要、最有影响的见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流派，特别是在中文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巴黎公社的见解是唯一的话语源。可以说，正是

主义（自由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的方向，目前无法判断。不过，可以指出的是：现代社会高度分化、国家机能高度复杂，社会主义运动也丰富多彩，不必、也不可能拘泥于一种教义、组织、名称、形式；没有必要指望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中国导向社会主义，如果中国共产党继续被“三个代表”僵尸迷惑而不能、不愿把中国带回社会主义，它本身就没有继续统治中国的正统性，回避不了连同“三个代表”僵尸一起被送进历史坟墓的命运。

正如以人民的名义实行专制的雅各宾主义最后变质为一小撮人对大众的专政一样，以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以及人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名义的一党专制不仅不是社会主义，而且是社会主义的毒瘤。我们在马赫诺运动、喀琅施塔得起义、西班牙内战到以天安门民主运动为标志的中国民权运动、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世界社会论坛、阿拉伯之春、互联网自由人权等各种社会运动中都看到对自由社会主义精神和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挥。我们劳工各阶级的解放只能靠自己去争取，这个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得任何阶级特权和垄断地位，而是要争得人人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废除所有的阶级统治¹²³。国家废除之后，巴黎公社试验过的基于包括草根阶层在内的人人参与的直接民主和基于自由联合的公正、平等社会交换与博爱的方式，是人类永恒的价值，是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生活的基石。¹²⁴

[2012年11月15日]

在巴黎公社的立场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治理论。（引自赵京：“巴黎公社悲剧的意义”，2010年11月8日第二稿。<http://cpri.tripod.com/cpr2010/paris.pdf>）

¹²³赵京：“国际工人协会的精神和基本原则”。

¹²⁴赵京：“巴黎公社悲剧的意义”。

24. 回忆与吴方城的点滴交谊

我大概是在香港支联会 1993 年出版的《中国的良心》上读到吴方城的文章，留下印象，1995 年春首次访美时从旅馆第一次与他通话。我不断地往电话机塞入硬币，他几次要我回到房间接他打过来的电话。我说：“由你打过来也一样花钱”，直到硬币用完。记得我们交流中国民主人权运动在美日的不同处境，他认为不应该给那些没有参加民主运动的人留美身份，我理解他的用心，但从安那祺/自由社会主义的原则出发，解释说任何人都有资格获得包括国籍任何社会政治权利。

1996 年春，我作为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系访问学者去芝加哥中国领馆申请护照延长，刚开始似乎正常，因为管威斯康辛州的贾（假）领事让我把个人支票改为现金支票。等我把现金支票寄去后，好久没有任何回复，再三问询之下，芝加哥领馆回答说没有收到过我的申请，也没有假（贾）领事，证实了我的预感：中国教委和驻日机构转来了李铁映、唐家璇等人当年对我的迫害材料，除了贪污我那可怜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奖学金外，连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资格也剥夺了（直到今天还没有任何书面理由）。我打电话给纽约的一个有名的人权机构的有名负责人物，他说我没有资格留在“他们”美国，又证实了我的另外一种预感（依附于另外一个国家权力）。与他同在西单民主墙事件中中共事过的赵南知道后，马上从日本打电话给他，那个人物才赶紧打电话来向我道歉。我向他道谢，就挂断了电话。

我给吴方城打电话，说虽然访问研究刚开始几个月，我被迫考虑准备回中国服务了。他力劝我留下来，还邀请我去肯塔基他家里，让我先在他这个“移民官”面前练习一下英文面试，使我感到我们毕竟都是理工科热血书生，难能可贵。于是，我乘“灰狗”汽车，碾转几次，深夜到达吴“老板”府上。

第二天，方城兄说还有许多别的朋友来访，邀我一同与会。我见到老万等在巴黎民阵成立大会的老朋友、一些在美民运名人和几个后来从中国出来的“领袖”，观摩民联、民阵在这里召开的联合大会。

以下摘录于我发表在东京《华人时报》1996年6月15日的文章“在中国的民族主义中树立民主主义的认同”。[5月17日至20日民阵第四次代表大会和民联第七次代表大会…。民联在93年的“华盛顿合并大会”的分裂之后，被迫把总部也从纽约搬到主席吴方城的住址，也只有经营着3家快餐店的吴老板能尽地主之谊。民阵的状况更是今不如昔。…如果说巴黎大会“成立宣言”的内容是几个刚从国内恐怖环境下逃出来的文人以天安门广场激情(加上个人意愿)压倒政治分析的结果，那么，事隔7年之后，民联民阵的共同宣言中仍然把拥戴“中产阶级”(如果存在并可以明确定义的话)、“发展私营经济”作为主要诉求，就难以用“文人议政”的水平问题来解释，而是偏离民众生活的政治立场的局限了。…明显地过分强调了以邓力群为代表的左派保守势力的弊害。…在说明宣言时竟然摆出对敌的姿态要与邓力群“打好不满现状的工人这张牌”！…7年以来，以天安门事件触发的海外民主运动已经耗尽了政治资源，也转化为多层面的社会进化活动了。各种半政治性的、非政治性的团体在舆民运组织的竞争中产生并活跃起来，以各种形式表达了民运的部分要求，并以“非政治”的形式部分地得以实现。…正好借“所有外部资助都断绝”的时机，首先彻底清理与各国政府当局的关系。当海外民运盲目自大地幻想与中共争夺政权时，其团体负责人就必然会力图利用外国政府的政治资源，结果只是被外国政府利用并导致内部的分裂。…我们没有任何一件需求助于任何国家权力的，我们必须捍卫任何国家权力企图但不能剥夺的权利，我们必须反对任何国家权力迫害、压制人权的行爲。以此，我们就立于最没有权势的、最广大的中国民众之中，成为中国平民的一员，为我们自身、而不是为“他们”的前景而奋斗。…在中国的民族主义中树立民主主义的认同，正是包括海外民运组织在内的一切中国进步政治力量的责任和使命。]

我一方面惋惜有太多的纯朴良知学子在失望受骗之后离开了中国的民权运动，同时又更加理解尊重方城兄这些原本与我同类的书生仍然坚持政治斗争。斯宾诺莎早就说过：德行不在于结局，而是在追求过程之中。而在追求中国自由民主人权的伟大历程中，方城兄不愧为一个中国的良心。

安息吧！方城兄。

[2013年4月20日]

25. 访陈独秀旧居随感

2004 年圣诞节期间，我专程赶到墨西哥南部 Coyoacan 小镇，参访托洛茨基展览馆。它是主人公最后几年生活的故居和遇难地，最近刚得以改建。我在旅墨期间读完了托洛茨基一九二〇年在他的红军总司令部铁甲列车上与白卫军进行生死激战时写成的反驳考茨基的文章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小册子。这次墨西哥之行，确认了我对托洛茨基主义、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等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我很幸运能继承这么丰富的政治思想遗产。¹²⁵

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64 周年国庆日，我受重庆有关方面邀请，专程



赶到“1929 年因参加托派等原因被开除党籍”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连任了党的一至五届最高领导人”¹²⁶陈独秀 1938 年 8 月-1942 年 5 月最后的生命旧居。旧居位于重庆江津南郊五举石墙村，四周田园风光、空气宜

人。该建筑建于清乾隆、道光年间，复四合院布局，座南面北，土、石、木结构，挑梁式梁架，歇山式屋顶，四周以条石砌成丈余高的围墙，总面积 3600 平方米。新建的前庭，除了“陈独秀旧居”的横幅字匾，还有陈独秀手书的“行无愧作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对联，可以感受江津、重庆地方政府对陈独秀的特殊关照。比起在他乡被刺杀的俄国革命的领袖，中国革命的领袖在此可以安息了！

¹²⁵ 赵京：“墨西哥之旅随感” <http://cpri.tripod.com/cpr2004/mexico.pdf>

¹²⁶ 引自“陈独秀旧居陈列馆”介绍，表示陈独秀创立的中国共产党现在对他的官方定位。

陈列馆尽量忠实历史，把“蒋先生”（蒋介石）捐助5千元安葬陈独秀的记录也显示出来。除了对陈独秀前期贡献的赞扬，我注意到陈列馆也把陈独秀晚年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主义核心¹²⁷）的“我的根本意见”一文作为陈独秀对民主的贡献展示出来，不由得引起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对陈独秀在当代中国政治复权的联想¹²⁸。“与时俱进”的陈列馆甚至把陈独秀也作为“反腐败”的创始人，好像中国共产党现在才发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其实，任何近代组织，都应该有“利益冲突回避原则”或“尽职调查”一类的规则。例如，在美国要注册成立非营利/非政府机构，必须签署类似的规则。

我们也顺便访问了同在江津的“聂荣臻元帅纪念馆”。我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已经熟悉“两弹一星”工程的历史，也读过他的传记，但动荡的国际流亡岁月消退了我青年时代与美苏对抗的爱国主义“三角格局”激情（文革结束后，中国只有核物理这个唯一的“高科技”能够与美苏抗衡）。我又很幸运能继承这方面的遗产。不过，与聂荣臻过去的荣耀相比，陈独秀同时还代表着中国政治（民主、人权）发展的未来。

[2013年10月10日]

¹²⁷ 其实也可以由此推断陈独秀不是“托派”了。

¹²⁸ 赵京：“陈独秀：问题、思想以及‘复兴’的可能”，2002年1月8日。收入2008年10月1日出版的《安那祺主义：理论与实践》ISBN: 978-0-557-01635-8。

26. 京沪渝掠影片断

今年9月24日-10月8日，我走马观花上海（1995年以来）、北京（1994年以来）和重庆（2010年以来），在此记下一些掠影片断。

[1]浦东：我在旅馆安顿下来，沿着居民小区商店漫步，注意到近一半的店铺是住房销售点，高楼中的居室房价达3-4万元/平米。这使我联想到自己经历过的日本80-90年代泡沫经济和美国2000年互联网泡沫、2008年金融危机。与高速成长时的美日一样，一方面，这反映了中国经济（特别是地方财政）对土木建筑的依存；另一方面也提示着中国的制造能力已经超过消费的能力，面临产业（如服务业）和社会（如减少工作时间以保障就业）的转型。

[2]陆家嘴/东方明珠：我1995年被日本公司派遣到陆家嘴调查水族馆项目时，东方明珠主体建筑刚完工，周围还是玉米地。东方明珠高层的玻璃塔和底层的老上海博物馆都值得一访。从陆家嘴建筑物（硬体）来看，这里取代过去的外滩，不愧为东方金融汇聚处，在一些金融管制方面，也可以防止华尔街、伦敦城的自由放任（如普通商业银行与所谓“投资银行”混淆），但最大的担忧毕竟在信息交换方面的自由限制。对Google、Facebook等的限制保护了百度、腾讯等国内企业的成长，迫使Google等抱怨：“人权问题也是贸易/商业问题”。我与HP官员们也讨论过APEC无法达成信息在亚洲国家之间的“自由”移动，而在欧盟内部则没有什么担忧。从根本上说，没有思想/信息/人员（包括劳工）的自由交流，仅仅是物资的自由流动，不叫“自由贸易”，比不上香港。为此，不看好刚成立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

[3]上海-北京高速铁路：与二、三十年前日本的新干线类似，只是用手机在车上“办公”的旅客太多。公共场所高声对着手机谈话，成为中国的一大“噪音”污染。

[4]晴朗的北京城正午：残阳如血（雾霾）

[5]天安门广场：国家政治大剧院，关闭（为了迎接国庆）。周围是

军警和人流的“和谐”。虽然外来人口的动向难以控制，但有联系的居民（包括郊区）因为得到住房补贴而消除了1917年彼得堡、1989年北京那样的组织性社会不安的隐患。大学生（以及背后的教师）阶层早已被官商权贵收买。

[6]国家大剧院：建筑物的堂皇令我联想到后期罗马帝国，特别是尼禄的荒唐“艺术”竞赛。与权贵结合的艺术正是中国艺术没落的象征。

[7]清华校园、北大图书馆：官（政治宣传）商（广告）横行、空气污染、独缺思想自由的风气。为什么还要去亲身体验失落呢？仅仅是为了回顾青年时代的激情、浪漫吗？中国哪里有学术自由的一席之地呢？

[8]海淀书城：书籍电子化尖兵。经典书籍13.8元/斤！可惜我不能买下带着旅行。

[9]重庆解放碑新华书店：中国政府在提倡民众多读书，大概是担心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只从手机上阅读信息，但书店里多是政治宣传、炒作“大师”、商业广告、考试升级的工具手册，加上少数象牙塔式人文译作，没有什么值得购买一读的人生、社会、历史和文学读物。这也难怪。中国近代经历了如此剧烈的社会动荡，却没有一本深入刻画人性的作品，如《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等。

[10]人际关系：任何严肃的思想家的终极关怀 ultimate concern 都是社会秩序 social order。我离开重庆（1980年）太久，已经“水土不服”。过去以为回到中国只有一处可去（监狱），把社会关系简化到极限；现在即使超越政治分歧能够归国服务“发挥专长”、甚至实施自由社会主义的理想，也很难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国的社会转型才是最大的困难和挑战。

[11]电视节目：我不经意看了国庆天安门献花和一点国际评论（钓鱼岛、海军）节目，感受到宣传部的作品。美国CSPAN的三个专门播放各种政治见解的频道和PBS的Charlie Rose的广泛专题采访（包括前不久危机中对叙利亚总统的采访），多少体现了新闻自由的价值。

[12] 陈独秀旧居/聂荣臻元帅纪念馆：见“访陈独秀旧居随感”专文。

[13] 上海人民英雄纪念碑：我最后一天冒雨在外滩徘徊良久，对比吉本在罗马遗址思考历史目睹新型帝国的崛起。中国共产党权力的来源/遗产（主要是国家社会主义）正挑战其执政的正统性。

[2013年10月14日]

27. 正在摸索新的社会规范与秩序的中国

每次外出，我总是随身带着一本小书，抽空阅读。这次东亚之行，我带着 *The Greeks*¹²⁹，脑海里不禁时时对比 Hellenic world 古典希腊社会和正在摸索和确立新的 social order 社会规范与秩序的中国，不由得思考：我们今天的社会规范与秩序比过去进化了多少？

审视这个问题的最佳立足点当然是“天朝”的中心——天安门城楼。自从 25 年前那个改变了我和中国的历史事件以来，我一直梦想/幻想自己是否可能、以及会以什么形式登上这个从来没有实地考察过的人类学地标。6 月的那一天，我利用好不容易回到出身地的第二次机会，抽出几个小时，信步来到安检密布的城楼下，不由自主地随着密集的人流移动，脑海里想着如果吉本在此会如何感慨中国的社会秩序，注意到城楼开放着！虽然明知没有购票所需的身份证、甚至连外国护照也没有带在身上，我还是信步朝售票口走去。奇迹发生了：一个小伙子急冲冲地跑来要退票。我当即掏出高于票价的钱，免去了难堪的身份检查。

如果算上正在城楼下训练的警察/保安人员，进入城楼的游客人数不多于工作人员，且只能沿着一个方向移动，不得久留，但可以拍照留影。除了隔代遗留的皇朝建筑、走马灯一样的当代政治权力的风云变幻和一枚比人还高的政治秩序象征（国徽），我留意到放映的各军种阅兵的录像，与北京地铁里屏幕上放映的以海军舰艇为主的图像报道¹³⁰配合，把公众置于当今中国社



¹²⁹ H. D. F. Kitto, Penguin Books, 1968. 希腊在古代世界的突然崛起地位多半是因为它在地中海的位置，成为各民族/种族/部落的聚集点，而古代的地中海舞台已经移到今天的太平洋。

¹³⁰ 电视里涌现出不少高调的民族主义“专家”评论中国海军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联合演习。作为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寻求大英帝国和大美帝国那样的地位并不异常，特别在世界经济中心的亚太海岸（或者叫西太平洋），中国与曾经主宰

会秩序的背景之下。正如我在考察台湾、韩国社会时有效地应用人类学方法一样，我很幸运自己也可以客观平静地体会中国社会朝新的规范和秩序的摸索。另一方面，作为薛定格的学生，我也知道自己的研究摆脱不了“不确定性（测不准）原理”，特别是因为这一次回到北京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参与中国社会规范/秩序的转型¹³¹。

除了北京，以“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未平”的谚语表示出来的四川/重庆的社会秩序状况更能代表着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流。与一个世纪前的芝加哥类似，重庆代表着已经超过美国的生产能力的中国制造业的中心，跨江桥梁、高楼和车辆急剧增多的重庆显示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还没有停止下来。同时，两、三年前引起世界瞩目的上层人物的权力更迭也没有阻止民众对社会自由—民权—的追求和公民社会的增长。置身于市区的高密度人流，回想起自己行驶在时速 80 英里、前后不见人踪的美国中部高速公路，可以理解小布什/切尼/拉姆斯菲尔德这些终结了 solo superpower 帝国的败家子的背景¹³²与荒唐。同时，也惋惜鼠目寸光的东京统治集团没有到过重庆这样的中国内陆重镇，只以为东京比北京更像庞然大物¹³³。

中国的希望不在亚太的疆域和资源扩张，而在于基于个人自由的公民社会秩序的成长，大概在广州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国正在经历的新的社

过这一地区的日本帝国（大东亚共荣圈）和维持战后秩序的美国的较力，没有新的规范，令人担忧。见赵京：“全球化格局下参与国际新秩序的改进”，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4 年 7 月 11 日。

¹³¹ 赵京：“以搜狐治理尝试改进中国的社会规范”，2014 年 6 月 29 日。所有引用都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网页 <http://cpri.tripod.com> 为准。

¹³² 他们生活在可以狩猎和滑雪的德克萨斯、怀俄明或新墨西哥州的庄园，不懂得普通民众在密集人口环境下的互相尊重、平等相处的艺术。

¹³³ 战后宫泽喜一作为吉田茂首相的英文秘书到美国谈判，第一次访问内陆乡间，恍然大悟为什么战前日本的统治集团藐视美国：他们最多只到过纽约、旧金山，觉得还不如东京、大阪，而且认为美国民众自由散漫、不适应战争（陆军）。今天日本的第二、三代政客/秘书/官僚，最多只到美国镀过金，没有人了解中国的社会、民情，远不如领导日本战后复兴的吉田、宫泽那一、两代政治家。

会规范和秩序的转型方向。就在北部的飞机场不远处，有一个中国近代史动荡的起爆点。



这是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故居。在大清王朝的社会秩序几乎崩溃的时代，从这里产生了试图取代它的新的社会规范。至于它叫什么名称倒无所谓，或者说，一个希奇的、与中国传统背道而驰的口号（拜上帝会）能够掀起全国性起义/叛乱，反倒是更重要的是历史教训值得进一步反思¹³⁴。太平天国作为农民起义仍然被官方认定为其本身正统性的来源事件之一，这里除了由政府加以保修的故居，还建有立派的雕像和纪念馆。不过，我没有遇到别的参访者，这兴许是中国的福音：大规模的起义/叛乱/革命的时代不会再来了。至少，人们不会在这里寻找新的社会规范与秩序的启示了。不过，我们当然不能凭路易十六时代的繁华¹³⁵来以为革命就不会发生。

而提示另一种社会规范与秩序的展示，就在邻居，赫然可见，气势宏伟。圆玄道观由香港出资、创建，弘扬孝亲敬祖，提倡“三教合一”，是广东省道教协会会址所在地。“本观供奉儒、释、道三教近百位神仙，每逢神仙诞辰之日本观道长开坛诵经举办贺诞科仪，庆贺神仙诞期，祈求神仙庇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道观占地面积约十八万平方米，建筑



¹³⁴ 我在“当代人类学的力作：山地东南亚的安那祺史观”（2011年8月8日）中介绍了安那祺主义的视角来看待这次起义。

¹³⁵ 例如，The Age of Louis XVI (Alvar Gonzalez Palacios, trans. M. H. L. Jones, 1966.) 讲巴黎的收藏如何成为欧洲的艺术博物馆，使我想到了北京的“国家大剧院”的豪华排场。

面积约九万平方米。主体建筑以仿古“天坛”形式建造，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有三清殿、元辰宝殿（全国最大的六十甲子）、观音殿、三圣殿、纯阳殿、凌霄殿、黄大仙殿、文化陈列馆、素食馆、盆景园等配套设施。中央的老子道德文化广场以一尊青铜铸造、重约70多吨、高近20米、盘坐于三层台基上的八角青石上的老子像¹³⁶为中心，后座以三层高的“五岳楼”为背景。后座南面石墙上分别刻上儒、释、道三家主要经典《孝经》、《金刚经》和《道德经》。老子像前东西两侧用福建青石花岗岩高浮雕的形式雕刻而成，长73米，高10.5米，东侧为《朝元图》，按山西永乐宫《朝元图》壁画，以1:1的比例而成；与之呼应的西侧是《纪元图》，表现中国历代帝君及圣人与道教的渊源关系¹³⁷。

这里大幅引用关于道观的外形描绘，是想指出两点观察：一、它提示出与天安门/中南海截然不同的社会规范，但与洪秀全不同，以非起义/叛乱/革命的秩序挑战来自北京的权威；二、与历史悠久的四川青城山代表的自然道观不同，广州的人为建筑“天坛”，特别是把孔子和佛陀也附会在老子说教里的规范，能否为中国提示出新的社会秩序转型，不得而知。这里几乎没有多少参访者，也暗示着老子/道教不容易简单地被人为理解、利用。

实际上，自由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从古代希腊社会的规范得到启发提出了对近代社会秩序的新的方案时，就注意到老庄在古代中国已经阐述了个人自由在社会秩序中的不可替代的价值。而近代社会主义的精髓告诉我们：个人自由不是卢梭悲观描绘的那种隔离于社会的原始状态下的孤立，也不是建立在别人（多数人）被奴役状态下的国家体制权力和资本的横行，而是社会的进化使得“他人的自由成为我的自由的必要条件”的状态。正如巴枯宁的名言：“只有当我周围的所有男男女女都同样自由时，

¹³⁶ 形象很像佛陀或孔子。大概世界上只有佛陀的雕像高过它，我也不记得见过比它大的毛泽东、列宁雕像。

¹³⁷ <http://yxdg.org/index.htm>

我才有自由。I am free only when all human beings surrounding me - men and women - are equally free.”这样的基于社会相互作用和集体劳作的自由，才是新的社会秩序的基础。这样，我们才能说：路易十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以此纪念法国大革命 225 周年。

[2014 年 7 月 14 日]

28. 关于政治秩序正当性的断想

一年前，我在“作为文明开化程度衡量的国家机构的透明化与民主化”¹³⁸中回顾当代中日关系史上最肮脏的一页：1992年一个阴雨秋天，我在东京出席中日两国当局举办的庆祝“中日关系正常化20周年”会议，因为追讨被盗窃的关西1989年支援中国民主运动募到的捐款，被日本国立神户大学法学部雇用的中国学贼毒打。…我随后到警察署报案，一个东京警视厅制服警察和一个国家公共安全委员会便服警察带我到现场拍照、记录四、五个小时，向我保证：日本是法治国家，一定要公正处理。过了几个周后，我没有接到任何联系，就直接再次造访警察署，却被告知根本没有我报案的纪录！更气愤的是：管辖神户大学的兵库县警“好意”转告我：“忘掉此案吧！如果你还要追究此案，日本政府可以把你定罪为“斗殴”，取消在留资格赶出日本！”与国立大阪大学曾经准备以“无完成学业可能”把我赶出日本的校园的做法同出一辙。杨振亚（大使）、唐家璇（公使）控制下的中国驻日机构指使学贼兼学奸混入学生运动，在日本人的“保护”¹³⁹和策划下在大阪领事馆前烧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言“不承认李鹏伪政权”，伪造人数宣称“退出中国共产党”、还把所谓“日记”公开给日本主流媒体叫嚣要“用血与火洗礼中国”、甚至要成立“流亡政府”等；但6月8日邓小平公开露面后又迫不及待勾结日本当局出卖迫害在中国留学生，把我们赶出校园、赶出日本，暴露了在国家政权暴力下人性最丑恶的本性。¹⁴⁰

1989年在中国和世界展开的民主运动的悲剧的结症正是因为攸关中

¹³⁸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4年6月4日。

¹³⁹ 日本政府因为在巴黎的七国峰会上签署了“保护中国留学生宣言”，文部大臣等在国会上也声称已经采取相应政策，最后只“保护”那个学贼，以神户大学法学部副教授的残羹向公共舆论显示其“保护”政策，利用这个学贼迫害我们。

¹⁴⁰ 2009年9月23日民主党政权成立时，我致函首相鸠山，要求他公布1989年自民党执政时的把我们作为人质的对中交易的资料：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Zhao_to_Hatoyama.pdf

国 political order 政治秩序的正当性 legitimacy 问题，至今还看不到解决的曙光。自从毛泽东死去到 1989 年，以“改革开放”为旗号的邓小平领导层执政的正当性没有受到普通中国民众的异议，但 26 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对中国政治心脏天安门的占领，把当今中国政治秩序的正当性问题推到了全世界面前，成为 26 年来所有中国问题的结症。本文所指的正当性，不是一个特定政治秩序下的法律用语（合法性），而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与中国传统的“天”、“道”相近。例如，“替天行道”是“非法”的却是正当的；雅典五百人法庭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是“合法的”却是不正当的；罗马总督根据犹太人首领的要求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也是“合法的”而不正当的；因为正当性攸关 social order 社会规范和秩序的更广泛的人性、人道的人类生活本质，而作为善的正当性的首要前提就是真。

在人类的历史上，往往出现这样的启示：某一件事陷入死结的事件，正是历史创新的突破口。而 1989 年的天安门事件是否如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这些参与者和后来人的反思、进取、选择和行动。考古发掘证实在公元前 1250-1200 年左右的青铜时代在今天土耳其的小亚细亚海岸的一处有利地形存在着一个被毁灭的小城堡 Troy，这个在古代发生过无数次的事件五百年后经过一个盲人歌手的吟唱成为建树希腊民族乃至西方文明的历史、文化、道德、社会和政治规范和秩序的法典¹⁴¹。比起描述公子王孙衰落或记录将相豪杰暴发的中国传记传统，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英雄传、塔西陀的罗马史更偏重道德精神：“与其政治和帝国的变迁，更关注个人的性格、行为和动机”，体现了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崇高伦理。¹⁴²如果天安门事件的悲剧意义不亚于小城堡 Troy 的毁灭，我们还有更长的时间来记录、反省和创造历史。

¹⁴¹ Michael Grant, *The Rise of the Greeks*.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7. p.143-147.

¹⁴²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 Trans. John Dryden. The Modern Library, Introduction by Arthur Hugh Clough, xvii.

作为置身于历史剧变中的个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和驻日机构未出示任何书面公文就剥夺我的公派留学生资格和奖学金¹⁴³乃至国籍（至今），还不如1656年阿姆斯特丹犹太教区“以天使的指示和圣人们的命令，经上帝和所有圣徒的同意，我们革除、驱逐、诅咒和谴责斯宾诺莎”文明开化。我个人庆幸与斯宾诺莎同道，求仁得仁，因为被逐出一个失去了正当性政治秩序的集团，正是属于整个人类、通往永生的最直接入口¹⁴⁴。

如果说二十几年前在国力并不强大的条件下，中国政府迫于西方国家的制裁压力不得不讨好日本政府、配合日本当局迫害中国留学生的话，今天，追溯七、八十年前历史的中国政府还有什么必要隐瞒二十几年前的历史呢？揭开历史真相也是文明开化程度的度量衡，公开这一段并不复杂的历史、纠正历史过错，正是恢复中国政府正当性、恢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日民间相对友好的气氛、改善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的一个必要条件。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5年6月4日]

¹⁴³ 赵京1990年7月致函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铁映先生。未获回复，公开发表于东京【民主中国】月刊1990年10月号“请李铁映先生明晰”。

¹⁴⁴ 赵京，“自由社会秩序中的自然神祇与个人原耻”，2015年3月7日。

29. 天津之行的意外收获：两件天安门事件物品

2015年6月30日，我在成都临时决定，利用难得的一、两天空余时间访问天津后再回北京，于7月1日凌晨到达天津机场。因为机场有wifi可以从手机上网，我在空荡的大厅休息等到天明，才乘地铁赶往市中心。在梁启超、袁世凯、冯国璋等历史人物的故居外（都没能进入）观光后，我信步来到古文化街。

一块醒目的“红色经典”招牌吸引了我，小店里主要是文革的物品，但也有



不少官方出版的1989年天安门事件“平暴”书刊。五十岁开外的店主见我仔细翻阅每一本天安门事件的书刊，知道我是有心人，拿出了一块刻有“共和国卫士”字样的手表、印有“祖国卫士”的衬衫、留下姓名的小学生手帕等文物。我略为奇怪有关当局为什么没有把所有这些1989年的书刊和物品都统统买断。

原来，他是当年驻扎在天津蓟县的52891部队（坦克一师）政治部的

秘书，坦克部队攻进北京完成任务后他负责发放纪念品。他还指给我看外国人写的关于他的记载。我随身没有多少人民币现金，就只买下了一件印有“祖国卫士 天津市各界人民赠 1989.7”的衬衫和一块写着“赠 参加戒严的叔叔们 一号路小学 一年*班 孙*”、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 52891 部队政治部”公章的手帕。因为手帕上的字迹已经显得模糊，我请他手写下“中国人民



下“中国人民解放军 52891 部队政治部 蓟县仓上屯 秘书”。他犹豫了一下，说“现在还很敏感”，就没有写出自己的名字。

我刚

走出店，他就关掉了店门。

[赵京，2015年7月8日]

30. 尊师敬友，更爱真理与自由

-清华大学毕业三十周年随感-

2005年春，我耳闻有些热心的1980级（1980年入学）同学在北京张罗毕业20周年聚会。我本来前一年已经向当朝的多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校友”申请因天安门事件以来被中国驻日当局剥夺的公民权¹⁴⁵，但一直没有回音（至今），连任何国家的护照都没有，没有资格作回国的梦。

2011年4月大学100周年校庆时，虽然我有了护照，还是懒得去凑这份热闹。没想到两个弟弟都返校了，不由得感慨提笔写“清华百年的悲哀”，引用我发表于东京《民主中国》月刊1990年6月号的“回忆1980年的清华学生会选举”，说明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下科学知识不会发生其应有的社会效应，以及我2010年9月8日发表的“乔姆斯基教授的局限性”，“认为必须解散、摧毁清华、北大这些已经堕落为当代奴隶制（所谓‘中国模式’）的精神帮凶机器。”¹⁴⁶不过，这篇本来就不意发表的文章一直没有写完，我毕竟希望给母校改正、创新的机会，也珍惜两千名同级同学中哪怕是不理解自己信念的同学的感情。

即使在当代中日关系最黑暗的日子里，我在中日当局的压迫下，也从来没有改变对同班加速器专业十几位同学（1/3在国内，2/3在美国）的情感，也同样尊敬工程物理系（以及后来分出去的物理系）绝大多数同年级的同学、老师和师傅们¹⁴⁷。但我几年前通过一篇单纯技术创新投稿的小事¹⁴⁸知道，校方仍然握有1980-85年因为我参加、要求差额选举学生会

¹⁴⁵ <http://cpri.tripod.com/cpr2004/letter.pdf>。除了四个大学“校友”，还有一个南开中学“校友”。

¹⁴⁶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chomsky.pdf>

¹⁴⁷ 例如，教我们加速器原理的老师得知当年的驻日公使唐**因为勾结日本当局出卖、迫害我而高升到外交部长时，义愤填膺地转告给一些还记得我的老师。

¹⁴⁸ 赵京，“突破毕生难关的汉语文字设想”，2009年9月27日初稿。学校的月刊本来通知我发表，等我把自我介绍送去后就没了回音了。

而在毕业时取消我的预备党籍资格、发配兰州等见不得人的卑劣材料¹⁴⁹。所以，尽管可以进出中国了，我丝毫没有返校参加今年的毕业 30 周年纪念的兴趣。本来，我正好认识负责编辑《清华人》80 级 30 周年纪念专刊的另一个系的同学，也想为校方提提建议¹⁵⁰，但我还是没有投稿，免得又遇到被拒绝刊登的尴尬，伤害了难得的同学感情。



但是，我终于遇到了一件不得不捍卫自己思想信念的事件：以 80 级全体校友的名义，每班向校图书馆捐赠一个桌子。

我丝毫不质疑每一个组织、参与捐赠的同学的诚意¹⁵¹，问题在于：经历了 30 年的国内、国际政

治经济变迁和人性的悲喜丑剧，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清华同学热衷于无视、压制别的同学的意愿，非要以全体同学的名义向校方效忠呢？我很欣慰看到有一些在美国的同学理解我的人格原则，只能以个人（或得到全体同意的集体）的名义捐赠¹⁵²。既然不可能劝阻惯于



¹⁴⁹ 这些材料也被用于当年国家教委剥夺我的公派留学资格和外交部剥夺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资格，至今没有任何纸面说明。

¹⁵⁰ 例如，我们学校、特别是我们系（工物/物理）不应该接收败坏师道尊严来娶二十几岁女生的八十岁教授。

¹⁵¹ 尽管有些同学在捐赠宣传中，说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校方赐予的机会。因为我反对并拒绝捐款，导致我班负责捐款的同学为我额外捐出 1100 元，使我深感不安。幸好班上同学们对我非常理解，没有造成任何感情误会。

¹⁵² 大约十年前，硅谷的一位 80 级校友组织以个人名义捐助的“勤学金”帮助经济困难的在校同学，我响应了。毕竟，无论家庭背景都能考上清华的八十年代还值得

以全体名义行事的中国特色规则，我只好卑微地请求任何人用全体同学的名义行事时加上“（赵京除外）”的小注。经历过被开除预备党籍和国籍的精神历程，假如 2000 名 80 级同学中的 1999 名同学同意以全体的名义捐赠给校方，我宁愿请求被开除校籍。



遗憾的是，“清华大学 1980 级全体校友”最终还是被校方（见今日署名的“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荣誉证书）嘉奖了。这是清华教育的悲哀的一个缩影，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商业¹⁵³，清华什么都是，唯独不是一所大学；从学位¹⁵⁴、名誉到权力、资本¹⁵⁵，清华什么都不缺，唯独缺少

truth（真理/真实）和 freedom（思想与学术自由）。

赵京，2015 年 7 月 14 日，纪念倡导“自由平等博爱”原则的法国大革命 226 周年¹⁵⁶

7 月 16 日追记:此文发表后，几位 80 级工程物理/物理系的同学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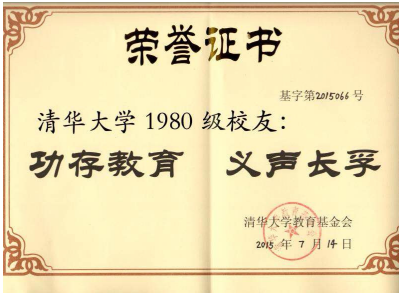
留念。

¹⁵³ 以“清华”打头的企业往往分文未出，只出售名称就可以与各种私营企业合办公司分成，无本万利，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

¹⁵⁴ 特别是那些以钱权交易发放的硕士、博士学位。

¹⁵⁵ 例如，今天的媒体广泛报道清华紫光准备以高达 230 亿美元的重金收购美国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如果收购成功，这将成为史上中国公司对美国公司实施的最大收购案。

¹⁵⁶ 虽然犹豫是否要写作并公开发表这篇随感，以在法庭上坦然面对五百名雅典公民的苏格拉底以及被革除出荷兰犹太教区的斯宾诺莎为人生楷模，我更有理由信任三十多年前两千名同窗五年的同学。



速联系有关方面，作废了7月14日发给“清华大学1980级全体校友”的证书，为“清华大学1980级校友”颁发了同样日期、号码的证书，朝 truth 和 freedom 接近了一些。我不由得联想起当年的一个美好梦想：理解万岁！